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讲义初稿

第三册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讲义初稿

第三册

(内部学习参考)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编

一九七二年十月

目 录

第七章 十月革命后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623)
第一节 十月革命后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欧洲革命风暴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和苏维埃俄国在克服恢复时期困难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623)
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德国1918年革命和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	(624)
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亚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646)
三、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布尔什维克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654)
第二节 共产国际前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伟大意义	(664)

- 一、第三国际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664)
 - 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669)
 - 三、共产国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思潮的斗争。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共产党人……………(674)
 - 四、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而斗争。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报告》的伟大意义……………(695)
 - 五、共产国际制定争取团结大多数群众的统一战线方针，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分裂活动……………(701)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毛主席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709)
-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709)
 - 二、毛主席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715)
 -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典范……………(723)

- 四、毛主席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733)

第八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毛主席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750)

第一节 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坚持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750)

- 一、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的革命。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等人利用列宁重病及逝世时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在捍卫列宁主义斗争中的伟大历史意义……(750)

- 二、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工业化而斗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再论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发表。托季联盟的被粉碎……(767)

- 三、共产国际和德、法等国共产党内反对托派集团的斗争……(786)

第二节 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794)

- 一、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反对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斗争。斯大林对布哈林的

- “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794)
- 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被击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胜利……………(806)
- 三、共产国际及德、美等国共产党反对布哈林集团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812)
- 四、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卖国贼、杀人匪帮的被消灭。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世界意义……………(818)
- 第三节 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825)
- 一、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毛主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所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及其伟大意义……………(825)
- 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反对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833)
- 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839)
- 四、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是革命政党和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842)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世界人民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	(850)
第一节 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战争危机的迫近。 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 争	(850)
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德、日法西斯上台，战争策源地形成	(850)
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建立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而斗争。右派社会党和托派第四 国际成为法西斯的帮凶	(857)
三、西班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法西 斯斗争。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教训	(868)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产国际的反 战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白劳德 修正主义的斗争	(874)
一、共产国际反对英、法、美帝国主义“绥靖 政策”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874)
二、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 争而斗争。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882)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 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	(888)
第三节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党内反对王明右 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 民主革命的伟大纲领——《新民主主义 论》的发表	(900)

-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制定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方针……………(900)
 - 二、毛主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907)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及其意义……………(913)
 - 四、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党的思想建设和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919)
 -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926)
- 第四节 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其伟大历史意义……………(930)
- 一、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930)
 - 二、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联红军的胜利反攻……………(935)
 - 三、欧亚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法西斯奴役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940)
 - 四、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其伟大历史意义……………(949)

第七章

十月革命后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第一节 十月革命后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欧洲革命风暴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和苏维埃俄国在克服恢复时期困难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①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沉重打击。俄、德、奥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8、631页。

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彻底瓦解了，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受了重伤，其余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千疮百孔，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建立，冲破了世界资本主义战线，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①，从而“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②。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苏维埃俄国经受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严峻考验巍然屹立，并在克服恢复时期困难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所有这些汇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洪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新的重大发展。

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德国 1918年革命和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

（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 风暴和美国、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之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修补其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制度，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进攻。这样就使在战争中倍受饥饿、贫困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9页。

② 毛主席：《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和死亡的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无以为生，无法忍受，因而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正当劳动人民挣扎在苦难线上，力图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大地，拨开乌云现出了光明，看到摆脱战争苦难，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迅速出现了无产阶级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风暴。

长期遭受沙俄统治的“芬兰大公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独立。为了回答芬兰资产阶级想要建立专政的企图，1917年11月13日，芬兰工人阶级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举行总罢工，在各大城市建立了工人赤卫队，争得了实际的民主自由权利。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聚集反革命力量，阴谋反扑扼杀革命。工人阶级奋起回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权利，1918年1月23日，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工会和赤卫队代表组成的工人执行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号召下，1月27日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1月28日，工人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1月29日组成了革命政府——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芬兰成为继俄国之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革命政府立即采取了许多对内对外的革命措施。逃往芬兰北部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反革命基地，组成了白军，挑起了内战，在全国各地进攻赤卫队，并乞求德帝国主义对芬兰进行武装干涉。4月初，德国军队在芬兰登陆。芬兰工人阶级和赤卫队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以唐纳为首的芬兰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在芬兰还没有建立，因而芬兰无产阶级革命在5月初便被芬兰白卫军和德国干涉军

的联合进攻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白色恐怖笼罩芬兰，成万革命工人惨遭杀害。

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斗争。1918年1月，奥地利无产阶级开始了总罢工，并建立了工人苏维埃和赤卫队。1918年夏季奥匈帝国军队的失败加速了国内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0月底，奥地利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先后建立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民族独立国家。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1920年意大利处在革命危机中。1919年，工业企业中发生了1663次罢工，有一百万工人参加；在农业中发生了208次罢工，有50万人参加。1920年，在工业中发生了1881次罢工，其中有16次是全国性的大罢工；在农业中发生了189次罢工，共有110余万人参加。工农革命运动发展到1920年9月达到最高峰，由米兰开始的工人夺取工厂的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强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但是，意大利业已形成的革命形势并没有转变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因为意大利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政党来领导，由于社会党和职工会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公开背叛，破坏了这次高涨的革命运动，帮助资产阶级渡过了危机，保住了政权。

由于战争的深重灾难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法国在1918—1920年间发生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示威游行、反战活动和支持苏维埃俄国的运动。法国广大工人和

士兵以实际行动支援苏维埃俄国，反对政府武装干涉苏俄。1919年4月，停泊在克里米亚和敖德萨的法国海军舰队爆发了起义。法国政府在红军和本国士兵的革命运动的夹击下，被迫从苏俄撤走了自己的干涉军。革命浪潮席卷法国本土。1919年约有100万巴黎工人群众参加了五一示威，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接着300万人举行了反政府示威。1920年3—5月，农民运动在法国20个省中迅猛发展起来。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工人运动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不断举行罢工和反对劳合·乔治政府的斗争。1919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工人组织全国会议上通过了“不准干涉苏俄”的口号，接着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名为“不准干涉苏俄”的委员会。9月，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不准干涉苏俄”的全国委员会。捍卫苏俄运动不仅席卷了工人，而且席卷了士兵和水手，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在1920年初撤回了自己的干涉军，以后又不断挫败英国政府干涉苏俄的种种阴谋。

美帝国主义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不断下降，日益恶化，这就导致了美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工人运动的高涨。美国工人运动把争取改善自己的处境的罢工斗争和保卫苏俄的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19年美国共有416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其中9月的钢铁工人大罢工是规模最大、最出色的罢工之一，约有37万名工人同钢铁托拉斯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顽强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加速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同时也就加剧了国内的

劳资对立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的工人运动发展了，1918年发生了392次罢工。8月3日，富山县发生了饥饿的老百姓反对地主资本家不断抬高米价的抢米运动。“米骚动”很快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延续了三个月之久，参加群众共达1000万人以上。日本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但是，“米骚动”加强了先进工人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和美国、日本的工人运动，都由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镇压，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叛卖和各国左派力量还很薄弱，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而先后失败了。列宁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①但是，这一时期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却有力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锻炼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18年开始的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把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推进到最高峰，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和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深受容克——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连绵不断的战争灾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6页。

难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斗争。1918年1月，柏林、汉堡等中心城市约有100万工人举行政治罢工，这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转折点。”^①10月17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斯巴达克派举行代表会议，确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号召劳动人民坚决反对战争，推翻威廉第二的君主政体，普遍建立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为把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而斗争。

1918年11月初，面临军事崩溃的德国统帅部，为了孤注一掷，命令驻在基尔港的德国舰队渡海袭击英国。基尔港八万水兵反对继续进行战争，拒绝执行这一反动命令，乃在11月3日举行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士兵代表苏维埃，揭开了德国11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地工人和士兵效法基尔水兵的榜样，纷纷建立了苏维埃，在许多地区实际上掌握了政权。在此暴风雨临头的危急时刻，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更死心踏地地为其主子效劳。11月6日，德国国防军军需总监威廉·格罗纳将军与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的六名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议，策划了以德皇退位来缓和革命，变相保存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反革命阴谋。8日夜，柏林工人起义一触即发的前夕，内阁首相马克斯·巴登致电德皇规劝德皇接受他和社会民主党策划的退位阴谋，并力陈不必想象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可憎的，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党人，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如果抹煞他们，我们

^② 列宁：《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3页。

将陷入一种军事专政之下，无论用何种手段，我们必须拿住他们。”①事实上，德国反动派没有用多大的手段就拿住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但是用尽一切手段都没有拿住群众。11月9日，柏林工人不顾列金集团的阻挠反对，根据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开始了总罢工，接着转为武装起义，迅速占领了柏林的各重要战略据点，德皇逃往荷兰，霍亨索伦王朝覆灭了。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从皇宫阳台向游行示威的工人士兵队伍发表演说，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当这一震动德国大地的消息传到当时还在国会里策划拯救君主政体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头目的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策划对策，三小时后，由谢德曼钻出来宣布成立“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这尖锐地反映了在政权问题上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以斯巴达克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德国工人士兵的要求，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右派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反映了德国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主张召开立宪会议，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德国11月革命的整个过程。

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估计到当时苏维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现实，所以就改变反革命策略，采取控制利用苏维埃的办法，妄图通过阉割苏维埃的革命内容来实现其机会主义路线。由于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不足，斯巴达克派还比较软弱，因此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轻易地夺取了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在11月10日召开的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

①引见马泽，《德意志革命史》，1929年中译本，第7—8页。

全体会议上批准了由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艾伯特、谢德曼、兰德斯别尔格和中派首领哈阿兹、狄特曼、巴尔特六人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以艾伯特为首的临时政府虽然形式上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口头上也不惜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府。它一上台就千方百计地策划拯救资本主义，扑灭革命。为此，它对内保留了容克——资产阶级的全部国家机器，与垄断资本和军阀头子建立反革命联盟，艾伯特与威廉·格罗纳签订了“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秘密协定，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列金与以施汀涅斯和西门子为首的德国企业家联盟签订了保护资本主义的“事务合作”协议。它对外奉行勾结协约国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政策，派遣军队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革命，拒绝与苏俄复交。

1918年12月16日，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开幕。当天，斯巴达克派在柏林组织了25万人的示威游行，示威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艾伯特政府辞职，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即解除反革命分子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操纵大会的多数代表非但拒绝了斯巴达克派和示威群众的革命要求，反而悍然通过了把全部立法和行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与选举国民会议的决议。决议规定随着国民会议的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职能就告结束。这无异承认资产阶级专政，宣告苏维埃的死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这一叛卖性的决议，大长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大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从此，德国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势力在“社会主义者”的政府的掩护下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开始了向全国革命力量的猖狂进攻。

在革命日益陷于危机的严重时刻，斯巴达克派认识到要推进革命运动就必须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于是斯巴达克派决定从组织上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并在1918年12月30日开幕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选出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皮克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纲规定德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政权转归苏维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德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全体德国人民历史的转折点。她的历史意义在于，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完成了同机会主义的完全决裂，从而为德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政党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惊慌不安。他们想趁无产阶级尚未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寻机挑动首都工人过早地出战，以便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1919年1月，艾伯特政府突然免除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赫戈伦的柏林警察局长的职务。这一挑衅行动是蓄谋激动无产阶级过早行动的诱饵。果然这一事件激起了德国共产党人和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怒抗议，在他们的联合号召下，1月5日柏林工人以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并转为武装起义，来回答艾伯特政府的挑衅。早有准备的屠夫国防部长诺斯克趁机对工人下毒手，指挥强大的反革命武装残酷镇压柏林工人的武装起义，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共有15000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的高峰是1月15日艾伯特政府唆使德国反动军官绑架

并杀害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噩耗传来激起了德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愤怒抗议和深切哀悼。俄共（布）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社会主义的叛徒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充当屠杀无产阶级领袖的刽子手的滔天罪行。列宁非常气愤地说：“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显然，历史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资本家阶级的工人耐官’的作用一定会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①

柏林工人一月战斗失败后，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向其他地区发展。1919年4月13日，慕尼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德国革命发展的最高峰。列宁曾拍电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并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的重要建议。但是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遂使苏维埃共和国于5月1日反革命军队的进攻中遭到覆灭。7月31日，在魏玛举行的国民议会通过了所谓“魏玛宪法”，成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魏玛共和国。德国11月革命失败了。

德国11月革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的，但是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于当时德国是容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存在着容克贵族大土地占有制和君主专制政体，加之帝国主义大战

^①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2页。

把人民推到了无以为生的绝境，因而首先提到革命日程上来的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封建要求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德国11月革命前后的情况和俄国1917年2月革命前后的情况大体相似，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是两个革命的结局完全不同。德国11月革命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而且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主观条件不同。德国11月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机会主义首领们的彻底背叛，已经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刽子手。而斯巴达克派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成立了共产党，但是这个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很软弱，对于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对议会道路还存有幻想，而且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决裂太迟，缺乏经验和准备。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共产党不能真正承担革命的领导重任，不能不使革命遭到失败。列宁指出：斯巴达克派与机会主义者“分裂过迟，由于与叛卖的（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毫无气节的（考茨基、希法亭之流）资本的奴仆集团强求‘统一’的这种咀咒的传统的压力，德国工人中间直到危机快来临时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①，因此，当11月革命爆发后，“德国的革命工人，被资产阶级和它的英雄诺斯克之流、它的公开的奴仆谢德曼等人……所屠杀和摧残。”^②这是德国11月

^{①②}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0—501、500页

革命给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极其沉痛而又富有教益的深刻教训。

(三) 匈牙利1919年革命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10月底奥匈帝国崩溃后，匈牙利获得了独立，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缺少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革命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人所篡夺。11月1日成立了以“国民委员会”主席卡罗伊·米哈伊尔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在革命群众要求建立共和国的强大压力下，11月16日，匈牙利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卡罗伊政府面对着遭到破坏和混乱的政治经济严重局势毫无作为，却竭力依靠国内地主资本家和国外协约国帝国主义与美国的支持，一心反对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卡罗伊供认他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革命，并奴颜婢膝地说：“匈牙利的希望可归结为三个词儿：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促进了革命运动的急速发展。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在由苏俄归国的以贝拉·库恩（1886—1939）为首的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1918年11月20日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确定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①的社会主义革

^①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5页。

命口号。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根据这一正确的革命路线，积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从战败的德国军队手里夺取了将近 35000 枝步枪，并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来武装工人和农民，在政府军队中和复员军人中进行争取工作，号召他们“保留着武器并利用这些武器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权进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武装起来的群众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规模不同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1918年12月12日，受共产党影响的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巴尔特的武装示威。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①1919年初，党还积极领导了席卷全国的武装工人夺取大企业的斗争和农民夺取大地产的斗争。随着武装起义、夺厂和夺地斗争的节节胜利，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工厂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工人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这些巨大的成就，大大促进了共产党影响的增长和革命危机的成熟。

被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吓得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决定采取阴险手段来镇压共产党。1919年2月20日，卡罗伊政府授命社会民主党人挑起警察与失业者游行队伍的流血冲突，把责任推卸给共产党，作为对共产党下毒手的借口。当晚，逮捕了77名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几乎

^① 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页。

所有中央委员都被捕入狱。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反革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暴力镇压更加暴露了反动派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血腥面孔，激发了工人的斗志，增加了革命的力量。被捕中央委员通过地下联系，从狱中照常领导着狱外的革命斗争。2月22日，匈牙利共产党发出了加速准备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号召。

3月初，高涨的革命形势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群众更加迅速地转到共产党立场上来。当时，党在军队中已经有了雄厚的可靠力量，并开始在首都和其它地方解除警察和效忠政府的军队的武装，党得到了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3月初，卡皮什瓦尔城附近的贫雇农在工人的领导下夺取了艾斯切加兹大公的44,000多霍尔特领地。3月18日，布达佩斯最大的工厂——切佩尔钢铁工厂的40,000名工人和赤卫队召开了纪念巴黎公社的盛大集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和要求立即释放共产党人的决议。许多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响应党的号召，解除了政府委员的职务，夺取了政权。从3月14—21日，联合政府在11个州的委员遭到驱逐。这一切表明，下层已经意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了，匈牙利的革命形势成熟了。

正当革命浪潮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趋于瓦解的危机关头，1919年3月20日，协约国政府向卡罗伊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要求匈牙利把将近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制造武装干涉的借口，以便通过肢解匈牙利来消灭匈牙利革命的阴谋狡诈计谋。但却首先使匈牙利政府陷于绝境。走投无路的卡罗

伊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公开接受丧权辱国的照会，于是被迫辞职，把政权交给了由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组成的所谓“工人”政府，妄图以此欺骗群众，缓和革命，拯救资产阶级的统治。当时新上台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头目供认他们面临两种抉择：“或者扮演诺斯克的角色，或者向共产党人投降。”^①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不想扮演诺斯克的角色，而是由于它早已威信扫地，根本没有扮演此角色的真实力量。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向共产党人投降。于是这批老奸巨滑的政客紧密策划，决定利用共产党人年轻缺乏经验的弱点，与共产党人谈判合并，共同执政，然后等待时机从内部破坏革命。3月21日，社会民主党的全权代表到狱中同被囚禁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们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下列纲领性协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共产党今天在双方领导联席会议上决定实行两党完全合并。合并的新政党在革命国际尚未为其最后命名之前，暂称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实行合并的基础是：两党共同领导党和政权。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将通过工兵农苏维埃来实现。必须立即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这支军队将解除资产阶级的全部武装。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权力，必须同苏俄政府缔结最紧密而真诚的军事和思想联盟。”^②与此同时，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的武装部队先后占据了首都的各重要战略据点，武装起义胜利了。

^① 转引自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4页。

^② 转引自马·法·列波夫，《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页。

当日召开的布达佩斯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赞同两党协议，宣布匈牙利为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贝拉·库恩担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1919年3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暴力革命的结果。共产党领导工人士兵在3月间实际上已经武装夺取了政权。当时就有一种谬论说，匈牙利革命是资产阶级自动辞职交出政权的。贝拉·库恩曾斥之为一种“虚伪的神话”。但是，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论证“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竟不择手段地拾起早已被匈牙利共产党人唾弃的谬论，大肆篡改匈牙利革命的历史，胡说什么：“在1919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①，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是“自愿地辞职”的^②。这是弥天大谎！卡罗伊曾清楚地辩解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③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出自阶级本性的辩白，无情地揭破了历史伪造者现代修正主义叛徒们的无耻伎俩。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共产党人的坚持，苏维埃政府不顾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阻挠和反对，立即采取了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1963年第15期。

^② 《苏维埃俄罗斯报》文章：《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1963年8月1日。

^③ 转引自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第38—39页。

从根本上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着手建立红军，解散旧军队，宣布工厂、矿山、铁路和银行信贷等的国有化，实行对外贸易垄断，采取了许多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工作。据统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一百天内，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机关就颁布了531个法令和命令。这反映了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巨大工作和英勇精神。列宁在5月27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这一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著名论文中，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忠告匈牙利共产党人：要在反对协约国的极端困难与艰苦的斗争中支持下去，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恐慌和仇视。协约国帝国主义大肆叫嚷要联合起来“消灭布尔什维克‘暴乱’的新策源地”，并急忙策划了从国外发动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相结合的颠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罪恶计划。4月16日，在协约国的指挥下，罗马尼亚侵略军首先发动全线进攻，开始了协约国对苏维埃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军队也参加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入侵。由于当时苏维埃匈牙利只有刚整编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却要对付从几方面入侵的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15万协约国军队，因而在5月1日侵略军已进至距布达佩斯80公里的地区。匈牙利陷于危险中。协约国帝国主义豺狼以为胜利在即，狂妄地要求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投降。钻入匈牙利党和苏维埃政府内部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实现其破坏革命的阴谋的时机已到，竟

公然提议向帝国主义缴械，取消苏维埃政权。以贝拉·库恩为首的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投降主义者的这一卑鄙建议，并向整个工人阶级呼吁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它的首都。十万工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加入红军，很快就粉碎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侵略军的进攻，并转入反攻，解放了匈牙利北部，6月初又解放了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6月16日，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了联邦同盟。这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时代”。

匈牙利红军的节节胜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给协约国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不甘心失败的协约国，由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亲自出马，在6月8日和13日两次向苏维埃匈牙利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胁迫匈牙利红军从斯洛伐克领土撤走，否则就要宣战，同时还狡诈地提出虚伪的诺言说，如果这项要求得到执行，那么罗马尼亚军队将从匈牙利领土上撤走。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列宁在6月18日致贝拉·库恩的电报中指出“……必须利用一切哪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它在欺骗你们，它只是为了赢得时间好更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①可是6月14日开幕的匈牙利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把持下，根本没有考虑列宁的这一及时的正确指示，就通过了决议，无条件地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匈牙利红军从6月24日开始向协约国通牒中所规定的界线撤退。这一严重的错误决定，大长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威风，大灭了工人、红军战士的

^① 列宁：《给贝拉·库恩》，《列宁全集》第36卷，第535页。

战斗志气。协约国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它不但指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军队利用匈牙利红军撤退的机会立即消灭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而且重新集结了军队，从7月初又开始了^对匈牙利的新的武装进攻。这时，社会民主党人公开背叛祖国，投靠帝国主义，配合协约国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加紧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掀起武装叛乱。7月30日，克雷孟梭又代表协约国发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的照会。8月1日，在苏维埃政府会议上，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遵从帝国主义的旨意，通过了苏维埃政府辞职的决定。至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133天的英勇搏斗后，终于被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颠覆了。接着，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1920年建立了由前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领导的法西斯专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大部分干部和党员横遭摧残。从革命失败到1921年间，约有五千多人被杀害，八万多人被投入监狱，14万人被迫逃亡国外。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是巴黎公社后又一个被帝国主义武装颠覆的无产阶级政权，因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一，国际帝国主义是武装绞杀无产阶级专政的剑子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协约国帝国主义一手用武力扼杀的。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存在的133天中，伟大的列宁曾多次忠告匈牙利无产阶级要提高警惕，充分准备应付协约国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艰苦斗争。但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对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和狡诈手段认识不足，因而既低估了

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和反对武装干涉斗争的艰巨性，备战工作抓得不紧，又轻信了帝国主义的虚伪诺言，放弃了既得阵地，结果导致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第二，右派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列宁指出：匈牙利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复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他们在口头上已转到了贝拉·库恩方面并且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不定，犹豫畏缩，甚至逃到资产阶级方面，有些则公然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①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对于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口是心非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认识不清，因而轻信了他们虚伪的口头声明，使他们得以施展其狡诈险毒的反革命阴谋，帮助帝国主义武装扼杀了苏维埃政权。

第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匈牙利共产党在革命中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丧失了独立性和领导权。当1919年3月21日两党决定合并时，匈牙利共产党只有四个月的历史，15,000名党员，既缺乏锻炼和经验，党内思想和组织又不够坚强统一，因而便无声无息地溶化在这个具有29年历史、拥有70万党员和数以千计的合法机构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泥坑中了。正如贝拉·库恩所说的：“这种情况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有组织的、进行领导的先锋队。”^②“我们共产党人既然没有了共产党，

①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1页。

② 转引自马·法·列波夫：《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14页。

就不得不对社会民主党人再三让步。”^①结果，当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勾结帝国主义公开叛变革命后，束手无策的共产党人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便被葬送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列宁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②

第四，坚持正确的革命政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既对正确处理革命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又被一种“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学理主义”思想所迷惑，因而苏维埃政府在生产资料国有化问题上和农民土地问题上都犯了政策性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短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这种过“左”的政策导致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使苏维埃政权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失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匈牙利革命失败的这一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而且必须在不同程度上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渴求，“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从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一定不能维持下去。”^③

① 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第13页。

②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③ 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8页。

第五，必须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保证革命的胜利。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剥夺剥削者的财产，而且要对他们的怠工、反抗的破坏活动实行镇压，不仅要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善于同暗藏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匈牙利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没有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很多旧官吏仍居政府要职，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甚至竟因照顾左派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面子，轻易地宽恕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罪行，并允许他们混入党和政府内部伺机破坏革命。这就种下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不能真正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动摇以致失败的祸根。列宁在谈到匈牙利革命的这一教训时说：“一个‘真诚地’宣布为共产党人的人，若不真正实行强硬无情、坚定不移和大无畏的英勇政策（只有这种政策才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相称），而是动摇不定和犹豫畏缩，那他就会由于自己的意志不坚、脚踏不决和优柔寡断，而象一个公开的叛徒一样犯下叛变的罪行。”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②

匈牙利1919年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而失败了，但是它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西方的传

①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1—322页。

②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播，推动了中欧的革命运动，鼓舞了正在争取自由解放的各国劳动人民，并牵制了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大批军事力量，打乱了它们武装干涉苏俄的罪恶计划，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正在孤军奋战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133天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经过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总结，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这些经验教训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再次，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失败，教育、锻炼了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更加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勇敢地投入了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重新建立，领导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坚持斗争，直至取得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亚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把亚洲各国人民卷入国际政治漩涡，既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深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也教育和锻炼了人民，进一步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习了军事技术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学识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①大战期间，西方帝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国主义国家为了战争的需要，驱使数百万亚洲国家的士兵和劳工背井离乡，充当炮灰和苦力，他们了解了俄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学会了现代军事技术，扩大了眼界，提高了觉醒，返回本国后积极宣传和投入了革命运动。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倾全力忙于大战，无暇东顾，因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在间隙中得到一定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相应地成长壮大起来，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给亚洲各国人民送来了解放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了学习的光辉榜样，架起了从西方无产阶级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的桥梁，因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五四运动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主要标志之一，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具有深刻的影响。此外，从1918年到1923年间，朝鲜、越南、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兴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19年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人民起义。朝鲜自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后，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残酷的恐怖统治和殖民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人民的奴役和剥削，使朝鲜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朝鲜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1919年3月1日，忍无可忍的汉城工人、农

民、学生、市民各阶层人民30多万人首先举行了罢工、罢市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等战斗口号，向日本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发起猛攻，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城的殖民统治一时陷于瘫痪状态。接着，朝鲜各地人民响应汉城人民的英勇斗争，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示威和起义，从3月到5月，全国218个府郡中有211个府郡卷入起义，参加斗争的群众达200万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极其野蛮的血腥手段残酷地镇压起义，朝鲜爱国者被屠杀的约8000人，受伤的将近16000人，被捕的达52000多人。朝鲜人民“三一”反日起义虽然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和资产阶级的叛卖而失败了，但是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显示了朝鲜人民的力量，锻炼和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以“三一”起义为分水岭，朝鲜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的时期宣告终结，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越南人民开始了反对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越南自19世纪80年代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长期遭受法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者为了弥补在战争中的严重损失，加紧对越南的压榨，因而使越南人民与法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都对越南发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促进了越南民族的觉醒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开始了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17年爆发了太原起义。1918年初在莱州地区爆发了巴柴领导的苗族起义，一直持续到1922年。

1923年在安南（中部）发生了农民运动。这些自发的工农运动虽然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都由于缺乏先锋队的领导而失败了。1921年，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阮爱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成为越南第一个共产党人。从此，他为在越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

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十月革命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突出事件。外蒙古（面积150万平方公里）原为中国的领土，长期遭受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和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封建王公、上层喇嘛的奴役和剥削，沦为一个十分落后的游牧封建神权的半殖民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苏俄的直接帮助下，1921年3月1日，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分别领导的两个革命小组合并成立了蒙古人民党（1925年后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中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温琴白匪军的武装斗争。1921年6月28日，苏俄红军开进外蒙古，帮助蒙古人民军于7月6日解放了首都库伦（现称乌兰巴托），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宣布独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一方面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温琴白匪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到1922年末全歼各地白匪，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反封建的民主改革措施，粉碎了封建主不断策划的反夺权阴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革命逐步深入发展。1924年6月13日，蒙古人民党作出了废除君主立宪制和在蒙古确立共和制度的决议，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1918年起，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高涨。印度在英帝国主义的长期压榨和剥削下，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把印度的物力和人力广泛地用于欧洲和近东的战争，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贫困和死亡，激化了呻吟于水深火热中的印度人民同英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印度人民反英民族解放斗争加强了。1918年爆发了纺织工人大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带动下，印度农民也掀起了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英国殖民压迫的斗争。

面临日益迫近的革命斗争高潮，英帝国主义企图实行某些政治上的欺骗措施，来阻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为首的资产阶级国大党开展了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不满，从英帝国主义那里乞取一些让步，从而把群众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国大党奉行的所谓甘地主义，表面上宣扬关于爱、温和、谦逊和刻苦生活，主张减轻农民负担，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印度教的特殊历史使命，实际上捍卫的却是社会的贫富区分不可避免、社会的不平等是永恒不变的等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甘地主义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一方面想要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摆脱，一方面力图摆脱英国的殖民压迫，自己掌握印度独立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害怕工农，惧怕革命，所以竭力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斗争。但是，即使这样，苦难深重的印度人民还是在甘地主义的影响下纷纷起来斗争，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迅速遍及全国。英帝国主义转

而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于1919年4月13日命令英国殖民军用机枪扫射在阿姆利则城广场集会的群众，打死379人，打伤1200人，制造了震动全印的“阿姆利则惨案”事件。英帝国主义的这一血腥暴行，更加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的怒潮，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罢工、暴动和武装起义，革命运动远远超过了非暴力范围。面对着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公开暴露出其害怕革命的动摇妥协本性。甘地把工农的暴力斗争咒骂为“心怀恶意的人”的“胡作非为”，并声称国大党没有能制止工农的暴力斗争是自己“最惨痛的耻辱”，是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大错误”。1922年2月，国大党借口“平民的惨无人道行为”，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同时从各方面限制运动的发展。从此，印度的反英民族解放运动暂时走向低潮。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人民掀起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民族独立斗争。印度尼西亚从17世纪初期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后，长期遭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压榨和奴役。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民族独立斗争。1918年11月，以资产阶级政党“伊斯兰联盟”为中心成立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激进中心”，进行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1919年，在托利拉利和芝马列莫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同年12月底，各工会代表在日惹成立了以“工人运动联盟”为名的总工会。1920年5月23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的成立对于印尼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从此，印尼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印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反对荷兰

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1年8月，泗水码头工人举行罢工。1923年5月爆发了铁路工人的群众性罢工。1926年1月爆发了席卷爪哇的人民起义。荷兰殖民者采取血腥手段镇压起义，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破坏革命工会。这一切导致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暂时低落。

1919年，土耳其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是德奥帝国主义集团的仆从，遭到了惨败。战后，英、法、意等协约国帝国主义瓜分占领了土耳其的各殖民地和本土的大部分，并唆使其附庸希腊大举入侵，土耳其面临亡国危险。土耳其的广大农民和士兵掀起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和希腊占领军的斗争风暴。到1919年5月，农民游击队的反侵略武装斗争席卷了西部地区。城市工人也积极参加支援农民的武装斗争。正当人民反侵略斗争高涨的时候，1920年9月，土耳其共产党宣告成立，号召人民同占领军进行武装斗争。但是，由于土耳其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民族资产阶级攫取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成立了以它的代表、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穆斯塔法·基马尔为首的政府。基马尔立即向苏俄发出呼吁要求援助。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基马尔政府依靠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英勇奋战，终于击溃了希腊侵略军，并迫使英、法、意撤退了占领军，粉碎了帝国主义宰割土耳其的色佛尔和约。1923年7月，协约国被迫同土耳其签订洛桑和约。承认土耳其民族独立。10月，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基马尔当选为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基马尔的政策反映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在民族独立运动开始时，基马尔曾向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号召工农

组织游击队反击侵略军，对左派、民主力量的活动采取容忍的态度，并强调同苏俄的友好关系，接受苏俄的援助，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他就不可能胜利。但是，当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特别是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后，基马尔就露出了反动原形，他对内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解散游击队，镇压工农运动，宣布共产党非法，屠杀大批共产党领袖，对外采取投靠帝国主义、反苏、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其结果，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①

1920年，伊朗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本国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侵入伊朗，1919年同伊朗封建王朝签订了奴役性的英伊条约。伊朗各地人民立即掀起了要求驱逐英军、反对英伊条约和卖国政府的群众运动。1920至1922年，在伊朗的阿塞尔拜疆、吉朗和呼罗珊等地爆发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1920年4月，大不里士人民起义，建立了民族政府，宣布阿塞尔拜疆为“阿扎吉斯坦”（自由之邦）。1920年成立的伊朗共产党同以库切克汗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结成了反英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吉朗共和国。1921年8月，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伊朗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地主阶级的代表惧怕革命深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政府军进攻时动摇叛变。1921年9月，吉朗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以伊达尔汗为首的共产党领袖遭到库切克

^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2页。

汗军队的杀害，吉朗发生内战。同年11月，政府军攻入，吉朗革命终告失败。

以上所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有力地支援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毛主席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①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因此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所不容。战后高涨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和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而失败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再不能担当革命的领导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三、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布尔什维克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年轻的苏维埃俄

^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8—629页。

国经历了同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殊死搏斗，终于保卫住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并且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的指引下，走上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苏维埃俄国的巩固和发展，是新时代的重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

1918年上半年，俄国苏维埃政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用赤卫队来攻击资本”的任务，并且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而取得了暂息时机。列宁预见到帝国主义豺狼不会放弃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罪恶企图，因此指示党必须最高限度地利用喘息时机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以便医治战争创伤，增强国防力量。列宁在1918年3—4月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著名论文中，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与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计划：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最严格的全民统计和监督，实行银行国有，粮食垄断，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节约开支；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加强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建设，杜绝官僚主义的毒害，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由剥夺资本家的简单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更困难得多的任务——组织任务，其目的在于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和新形势。如不解决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列宁满怀信心地说，布尔什维克党既已经说服了俄国，夺取了俄国，那么也一定能够学会管理俄国。但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爆发，暂时打断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计划

的实施。1921年，苏维埃俄国胜利地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转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时期，列宁又重新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当时，由于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严重破坏，苏俄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1920年大工业生产量几乎少于战前六倍，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加之燃料奇缺，运输破坏，各地的经济联系大为削弱，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处于同农民的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农民开始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工农军事政治联盟的基础动摇了。工人群众也由于工厂停工，流离失所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情况表明，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方针政策，领导工农群众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然而，阶级敌人并没有昏睡，他们企图利用经济的困难状况和工农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鉴于在公开斗争中遭到惨败，便开始改变自己的策略，提出了“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的新口号，来代替破了的“打倒苏维埃”的旧口号，妄图把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党分开，使苏维埃失去它的灵魂，利用苏维埃达到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1921年2、3月间爆发的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便是反革命分子采用新策略的典型表现。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立即反映到党内来。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也利用困难形势向党发动了进攻。他们力图迫使党进行公开争论，从而破坏党的统一，分裂党的队伍，转移党对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主要任务的注意力，瓦解工农联盟，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1921年11月，托洛茨基首先挑起关于职工会的

作用问题的争论。虽然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但是争论却远远超出了本身的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关于党对待职工会，对待群众的方法和态度等政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群众性组织——职工会在尽速恢复工业和克服经济破坏的工作中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采取发挥千百万工会会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办法。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①但是，托洛茨基却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所谓“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振刷一下”的口号，提出了立刻把“职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们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托洛茨基抛出这一反列宁主义的纲领的阴险目的，在于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从而瓦解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内持有各种机会主义观点的反对派，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缓冲集团”都聚集在托洛茨基的周围，联合起来反对列宁，反对党。列宁领导全党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首先，列宁分析了争论的性质和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下同），第204页。

指出，托洛茨基“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①

其次，列宁论证了工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②工会是党与工人阶级和群众联系的纽带，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蓄水池’”③。因此，“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④

再次，列宁痛斥了布哈林“缓冲集团”的折衷主义错误及其危害。在争论中，托洛茨基恶意歪曲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缓冲集团”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正确者，主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统一起来。列宁尖锐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⑤“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

①②③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5、2、3页。

④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

⑤ 同上，第71—72页。

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①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误错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②。列宁还无情地戳穿了布哈林“缓冲”的“公正”外衣，指斥他说的都是反对列宁的话，而没有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这表明布哈林集团的真正作用，“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③

在国内政治经济极度困难和党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作了关于职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的政纲，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党集团迫使党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企图。鉴于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险，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指出他们事实上帮助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决议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④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今后严格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和报告通过了从余粮收

①②③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80、58页。

④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0页。

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内容除粮食税外，还容许私人贸易自由和私人工业家开设小企业，以及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由战时共产主义对城乡资本实行直接冲击的手段，转向包围资本主义的策略，转向由社会主义成分逐渐排挤资本主义，以便积蓄力量再开始进攻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农业迅速恢复起来，建立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①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都不懂得列宁的这一英明政策的实质。一些“左”的假革命诬蔑新经济政策是放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则从右的方面歪曲新经济政策，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的让步，把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党及时揭露并回击了这些假革命和投降主义者的反党行径。列宁表示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①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②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

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工农业生产 and 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逐步巩固。但是，为了克服恢复时期的困难，加速国民经济的建设；为了组织坚固的国防，对付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新的侵犯的威胁，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各民族间的和睦与合作，必须把十月革命后诞生的各个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斯大林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选出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苏联的成立。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后又陆续有别的加盟共和国参加，发展到今天苏联共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

苏联的成立和新经济政策的初步胜利，这就使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为了解决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任务，列宁在病中所写的最后几篇重要论文中，根据几年来俄国革命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其基本要点是：发展大工业；实行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开展文化革命；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列宁特别注意发展大工业的问题，因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①。列宁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根本途径是厉行节约，自力更生。他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②列宁关于发展大工业的指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列宁非常重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合作社计划。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困难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根据恩格斯的教导提出，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作社的作用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合作社是个体农民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形式。所以列宁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③“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成为党所制定的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基础。

文化革命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

①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9页。

②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4页。

③④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6、429页。

而同时要加强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纲领。

列宁特别关心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问题。他指出，没有工作得准确而有条理的国家机关，便不能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复杂问题。可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国家机关仍然保留着旧思想旧作风，直接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列宁认为，要改革国家机关，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就必须把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扩大工人成分的比例，改善国家机构，使之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清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加强党对政权机关的监督作用。总之，要不断革新，才能使苏维埃国家机关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列宁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计划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的情况去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节 共产国际前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伟大意义

一、第三国际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国际破产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团结各国左派，帮助促进他们同社会帝国主义者从组织上决裂，为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没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参加的新的革命国际（共产国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列宁领导下，经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国际主义者的会议上反对考茨基中派的斗争，各国左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为建立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础。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又明确提出了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来代替破了的第二国际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批准了列宁的这一倡议，决议说：“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国中革命较早的国家的政党，我们有责任着手创立第三国际”。但是，创立第三国际的工作由于世界大战仍在进行和布尔什维克党忙于争取和巩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未能实现。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第三国际就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而提上1919年的日程。这是由于：

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苏维埃俄国，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提出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夺取政权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增强国际主义的团结，解决革命所面临的新问题，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有必要成立新的国际领导中心。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联盟”的形式下勾结起来，它高举反革命的白旗，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为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扼杀苏维埃政权而疯狂活动。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在新的国际的革命红旗下统一步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联盟而斗争。

再次，早已破了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叛徒党，为了对抗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十月革命，阻挠第三国际的建立，破坏高涨的革命运动，在大战结束后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并力图使第二国际的僵尸复活。1919年2月3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以前曾加入第二国际的26个国家的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尽管协约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德国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会上多次发生争吵，然而他们在投靠帝国主义，反对革命，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会议通过了承认和支持“国际联盟”的决议，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决议，选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个恢复起来的第二国际被称为伯尔尼国际。列宁指出：“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①，

“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②。为了抵制第二国际僵尸的复活，争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必须迅速建立革命的第三国际。

基于上述历史原因，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因此，列宁在百忙中亲自领导筹建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1919年1月间，列宁和俄共（布）召集在莫斯科的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美国社会工党的代表举行了筹备会议，讨论有关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并以八党的名义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邀请欧美亚三大洲的39个共产党和左派团体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

1919年3月2日，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54名代表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观察员云集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亦即第三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开幕。列宁亲自领导了这次大会，并就大会的主要议程——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报告。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已经尖锐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叛徒们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拚命找来一个主要论据，即“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列宁在报告中根据马克思主

①②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7、459页。

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运用具体事实，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痛斥了修正主义叛徒们借宣扬一般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卑鄙伎俩。列宁指出，不能抽象地谈论“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而必须明确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修正主义者“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①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②根据这条阶级斗争的根本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所绝对必需的”③。列宁同时指出，苏维埃是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统治的最好形式。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的报告提纲，完全接受了列宁提出的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作为共产国际纲领的基本原则。这就为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制定了统一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议和建立第三国际的决议。决议指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要求全世界所有接受这一纲领的共产主义者，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坚决的国际组织”。在有人试图恢复旧的机会主义国际的情况下，“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同社会主义的反叛分

①②③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6、435、440页。

子断然分裂。”①大会选出由每个党派一名代表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了列宁等五人组成的执行局。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宣言》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②

第三国际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而直接受它的领导。第三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国际的唯一继承者。它的成立标志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的最终破产。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③“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

① 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21页。

②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83、93页。

③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275页。

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第三国际的建立，使世界无产阶级有了团结的中心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②。它领导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自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竖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继续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国际革命运动进一步得到重大发展。共产国际在各国劳动人民中的威望不断增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完全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全心全意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正在成功地实现着。除了在共产国际建立前已经成立的芬兰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波兰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立陶宛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外，1919年建党的有，保加利亚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等；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5页。

②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4页。

1920年建党的有：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丹麦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据统计，到1920年，全世界共有27个共产党。

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险。由于群众革命情绪的压力和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原来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为了欺骗群众，继续充当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and 帮凶，乃改变策略，纷纷退出伯尔尼黄色国际，申请加入第三国际，阴谋钻进共产国际，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内部进行分裂、瓦解与破坏活动。曾经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原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福罗萨尔后来供称：“留下来同工人阶级在一起，从内部反对莫斯科，是我当时最得意的算盘。”^①另外，在大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里，如意大利、瑞典社会党，还存在相当大的改良主义与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仍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抬头，积极破坏第三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这些情况表明，“第三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动摇的、不彻底的集团削弱的危险。”^②列宁指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

① 转引自弗莱威尔：《法国共产党的延生》，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4页

②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1页。

直接危险的错误”。①

为了防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混入革命的第三国际，使第三国际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武装各国共产党人，去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胜利，列宁领导刚刚诞生的第三国际展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这成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先在彼得格勒、后移到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41个国家的217名代表。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列宁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②，“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③，右倾机会主义有深厚的经济根源，所以是一种缠人的顽症，要战胜它，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费时得多，艰巨得多；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在克服右倾顽症的斗争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远没有肃清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列宁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在离开大会的时该，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把各个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④

①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1页。

②③④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列宁认为，为了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捍卫第三国际的纯洁性，促进各国共产党健康地成长，除了必须制定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纲领、政策外，还必须在组织原则上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彻底决裂。为此，列宁在会前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提交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列宁提出的这一重要文件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克里斯平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塞拉蒂等人竭力反对这些条件，恶毒攻击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诬蔑布尔什维克党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俄国特有的形式抬高到成了适用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原则。”列宁7月30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中，逐点驳斥了克里斯平的反革命谬论，指出他的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讲话”，“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①最后大会在两票反对下一致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规定：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更改党的名称为共产党，制定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纲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全部实际活动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无情地斥责各种机会主义者，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彻底决裂，有计划有步骤地撤消机会主义者所担任的重要职务，选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掌握各级领导；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党，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必须深入群众，

^① 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5页。

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不懈地在军队、普通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绝不能信赖资产阶级的法制，要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在工会、合作社、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革命工作，以便揭露反动派及其代理人，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周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全力支援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在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问题上奉行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无情地揭露本国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罪恶勾当，真心实意地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等等。列宁指出：这些条件不但规定了“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而且“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①这就堵塞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混入第三国际的通道，捍卫了共产国际的纯洁性。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文献，是区分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强大武器。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拥护这一纲领性文献，例如，1920年12月底在都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不顾右派和“中派”分子的反对，毅然决然表示接受国际规定的条件，赞成加入第三国际。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共产主义派的代表们也冲破机会主义分子的阻挠，在1921年1月单独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宣布加入第三国际。但是，一切机会主义者都

^①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激烈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百般诋毁它是“新的宗教信条”，是实行“莫斯科专政”的野蛮方法。想混进第三国际而没有得逞的“中派”头目，不但在会上猖狂地反对这些条件，而且在会后还进行了新的分裂活动，妄图诱使广大工人群众离开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阻止他们转向第三国际。1921年2月，以考茨基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派”各党在维也纳召开了自己的国际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维也纳国际”。在它通过的会章中宣布：凡未参加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一切社会党均得为该联合会会员。因此工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第二半国际。第二半国际的成立，自我戳穿了各“中派”政党的伪善面目，促进了许多国家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巩固了第三国际。

三、共产国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思潮的斗争。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同时，又面临刚刚露头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的危险。

当时，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灾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的可耻背叛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继续贩卖革命的罪恶勾当，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满腔义愤；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鼓舞和影响，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觉悟，因此在欧美各国工人群众中普

遍存在着向左转的革命情绪和要求。在这种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迅速扩大，其中有一部分要求革命而又缺乏锻炼的年轻共产党人，他们一方面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的议会政客丑行和工会官僚的贩卖勾当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没有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和战略策略，不了解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的正确关系，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转向“左”倾教条主义。另外也拥进来不少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参加革命有的是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是为了贪图禄位。这些革命的同路人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带入革命队伍，提出极端革命的形“左”实右口号，混淆视听，制造混乱。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条件，所以当时在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一批所谓共产主义“左派”，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英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意大利的“抵制派”共产党人、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瑞士海尔佐格派共产党、荷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等，形成了一股“左”倾教条主义思潮。

这种“左”倾教条主义思潮，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列宁指出，这些“左派”“往往因为对第二国际政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完全合理的憎恨，而拥护无政府主义”^①。这是由于他们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①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6页。

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政府主义观点去进行批判，因而陷入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泥坑。他们反对“议会迷”、“合法迷”，竟然提出议会制度已经“过时了”的论调，反对参加“议会斗争”，标榜要作“原则上的反对派”、“抵制派”。他们反对旧工会官僚的改良主义政策和叛卖勾当，竟然提出退出保守工会的口号，主张建立清一色的革命工会来代替旧工会。他们反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妥协叛卖政策，竟然提出反对任何妥协，否认革命的曲折性、复杂性，幻想径直地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官僚政客作风，竟然提出“打倒领袖”，取消党或者另建一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的荒谬口号。列宁说，这种“极端的革命性”①，“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②。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③

这种“左”倾教条主义思潮虽然是作为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但同样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的“左”的策略使党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妨碍正确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破坏党的建设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如当时英国有四个左派工人组织正在酝酿成立共产党，由于这些“左派”的过“左”政策，在对待议会斗争和英国工党的策略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从而使建党工作受到阻碍。这说明

①②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188、189页。

“左”倾教条主义同样也是机会主义的，是为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在客观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所以它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①

列宁指出，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比较起来，还“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②，同时犯“左”倾错误的人中，除了少数“觊觎领袖职位”的、缺乏“光明正大”态度的、坚持错误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外，绝大多数是抱有革命热情的、年轻幼稚的同志，是认识问题。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左”倾教条主义，并认为“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③，否则，错误就会发展，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对革命事业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因此，当时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思潮，正是为了把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和发展大好革命形势之必需；也是为了团结、教育大多数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更好地领导广大群众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之必需。正如列宁在阐述共产国际对待英国“左派”的态度时所说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加拉赫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出色的新的革命运动，纳入共产党的轨道，纳入运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即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共产党的轨道。”④这就是共产国际当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

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6页。

①②③ 列宁：《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256页。

务，也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

列宁认为，要医治这种“左派”幼稚病，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略策略的思想原则和“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现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实行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①，传授给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人，帮助他们深入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认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列宁在1920年4—5月间写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光辉著作，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出版，并译成了德文、英文和法文，分赠给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成为指导大会的纲领性文件。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共产党人对待工会和议会的策略问题，以及加入英国工党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左派”继续鼓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就这些问题提出的提纲草案。英国代表加拉赫指责提纲草案带有机会主义性质。意大利代表波尔迪加提出一个对立的提纲，主张抵制议会。英国代表潘克赫斯特几次在委员会上发言重复说：英国需要“左”。列宁当即回答说：需要左“当然这是完全对的，不过不要过‘左’。”^②一语道破了“左派”幼稚病的通病。为了捍卫共产国际的正确策略，批驳“左派”的错误观点，列宁在大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3页。

^② 列宁：《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6页。

会上就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关于议会斗争问题、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大会经过热烈讨论，接受了列宁的意见，通过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与议会制”、“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提纲，确定了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策略路线。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痛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叛卖行为，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敌人的同时，锋芒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潮。为了纠正“左派”幼稚病，科学地阐明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新型革命政党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思想。

（一）党是在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针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史上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个“左”倾机会主义“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①。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②“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

^{①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8页。

然是主要敌人。”①但是鉴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另一个敌人”——“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②，而“左”倾教条主义当时已成为危害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思潮，因此列宁集中剖析了“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实质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列宁指出：“左”倾机会主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③，是由它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小私有者，即小业主……，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④。

“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对问题不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而常常醉心于“‘简单’否定的策略”⑤。由于这些根源决定“左”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主观片面，在政治上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它“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⑥

列宁进一步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这一切特征虽然

①②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8页。

④⑤⑥ 同上，第188—189、260、189页。

“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总是会以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①列宁的这段精辟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教导我们要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善于识破其外衣和伪装，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列宁还分析了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其中一种人表面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是阶级敌人派遣打入党内的暗藏特务，如混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就是特务。列宁警告各国共产党人说：“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②，必须严防这种危险。另一种人是那些“品质不好”③“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会长期坚持错误”④，施展阴谋诡计，必须警惕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上述两种人都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必须对之进行坚决斗争，无情打击。另一类人是由于年轻幼稚而犯了“左”倾错误的好人。这些人或者“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讨过革命史”⑤，也就是说，缺乏革命斗争的锻

①②④⑤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9、202、259、217页。

③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1页

炼，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因而说了一些蠢话，做了一些蠢事，犯了“左”的错误。列宁认为当时犯“左派”幼稚病的共产主义“左派”大多数是属于这一类主观上真正想革命的同志。对于这一类人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哪些哪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①

列宁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时指出，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经历“首先而且主要是同本国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②。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和实现党的统一和领导，才能捍卫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③“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

①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34、244、245页。

③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经验》（1971年12月1日）。

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二）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思潮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关系问题上的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把党与阶级对立起来、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这一套胡说八道“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②，“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③

列宁针对“左派”的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确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完整学说。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④列宁说，这些都是简单明了的起码的常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是“不学会把领袖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0页。

②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9、197页。

④ 同上，第197页。

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①

德国“左派”把党与阶级对立起来的谬论，在理论上是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和代表者，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实践上必然导致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②

德国“左派”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谬论，在理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实践上必然导致否定革命领袖的作用。关于对待领袖和群众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对立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而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但是又丝毫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早已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③历史证明，哪些来自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善于集中群众意

①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6、200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2页。

志、代表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人民群众热爱这些革命领袖，把看他们作整个党和阶级的宝贵财富和胜利象征。所以列宁说：如果党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革命领袖，那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①一切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信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英雄们创造的，而英雄领袖又都是天生的“天才”，理应居人之上，统治人民。因此他们无限地夸大个人的作用，野心勃勃地“覬覦领袖的职位”，不择手段地攻击、诬蔑、中伤，甚至谋害革命领袖，妄图取而代之，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列宁揭露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曾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跳出来攻击党的领导是“领袖专政”、“寡头政治”；而那些可笑的“左派”中也有一小撮野心家，他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②这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对革命领袖的真实卑鄙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以便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①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9页。

毛主席总结了中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尖锐地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①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贼心不死，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不仅用心险恶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公开跳出来肆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完整学说。他们顽固地兜售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妄图树立自己的个人“绝对权威”；但为了掩饰其极右面目，有时也别有用心地鼓吹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充分证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地地道道的“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②

（三）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指出，“左派”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实质上是“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③

^{①②}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针对“左派”的这一严重错误，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

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就是加强党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与党的根本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没有纪律严明的、百炼成钢的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仍旧存在，阶级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小生产经常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包围、浸染、腐蚀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土壤。这些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因此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②；“**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③

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所以能够坚持并不断加强，主要是依靠三个条件：第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度阶级觉悟，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第二，密切联系群众，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第三，先

^{①②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201页。

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即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列宁还强调说，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可是“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①。列宁的这些教导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铁的纪律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是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密切联系的，是自觉的，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成的。共产党人要提高纪律性，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长期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努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一贯重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的严格纪律，强调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②毛主席深刻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③；“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粉碎党内十次机会主义路线，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再一次充分证明：革命纪律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2页。

②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③ 转引自196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④ 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8期。

(四) 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左派”在议会、工会和妥协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战略和策略路线。列宁根据俄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详细论述了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原则，批判了“左派”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路线。

列宁教导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领导广大的群众共同战斗，因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①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是：争取群众，壮大自己，利用矛盾，孤立敌人，战而胜之。

列宁指出，为了争取群众，战胜敌人，共产党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②。列宁批评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③。当时的“左派”正是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借口拒腐蚀而反对参加保守的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实质上就是拒绝利用一切机会和敌人的一切矛盾去争取同盟军，就是要使党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这种孤家寡人的策略，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④

^{①②③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225、246页。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争取群众，实现自己的革命任务，第一，“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①只有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才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复杂变化的情况，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②因此列宁说，那种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的做法是极端幼稚和愚蠢的，

“不善于把不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③列宁教导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态度是“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④“左派”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走狗的影响之下，“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⑤

“左派”借口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而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⑥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议会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议会迷”根本不同，“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展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⑦而“左派”反对参加工会和议会斗争的荒谬“理论”，恰恰最清楚不过

①②③④⑤⑥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249—250、250、209、208、213、214页。

地说明他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了客观现实，说明他们“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在如何滥用这个字眼。”①列宁说：“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②

列宁指出，为了争取群众，壮大自己，战胜强大的敌人，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③。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同自然界和社会一切事物一样，都有其矛盾斗争发展的曲折过程，特别是推翻国际资本这个强大的敌人的斗争，就象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一样，绝对不可能走一条笔直的大道，一定要通过许多迂回、曲折和中间站，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列宁教导共产党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④。列宁斥责“左派”反对任何妥协的谬论时指出，进行推翻国际资本的顽强斗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而幻想不停顿、不转折，走一条笔直的顺利大道，实在是愚蠢可笑到了极点！这样的“革命”家是“毫无用处的人”。

针对“左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革命的妥协的幼稚谬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恶意歪曲布尔什维克党所作的妥协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的可耻行径，列宁明确地阐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即革命者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革命者的

①②③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8、213、229、248—249页。

妥协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作的局部的、非根本问题上的、暂时的妥协，其目的是为了造成有利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①，以便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对敌人实行坚决的进攻，夺取革命的更大胜利。叛徒的妥协是为了贪图私利，甘愿向资产阶级讨好，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威胁，而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叛卖行为。今天世界上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会谈，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妥协。苏修社会叛徒集团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冒充为革命者的妥协，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大叛徒。

(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左派”共产党人的上述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的态度问题。当时“左派”虽然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原则上承认俄国革命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实际上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经验是什么，以及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如何得来的。为了医治“左派”幼稚病，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②

^{①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9、226页。

列宁指出：“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①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③。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否认这一点或夸大这一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党所以能成功，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所以具有国际意义，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列宁指出，俄国先进分子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历尽半个世纪的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④，并把它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于1903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又经历了十五年的艰苦卓绝、曲折复杂、多种形式的斗争实践，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才获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积累了举世闻名的丰富经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教导各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时，必须同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历史等具体特点相结合；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列

^{①②③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7、178、179、182页。

宁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统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加以具体运用。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共同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①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明确告诫共产党人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可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②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教导。毛主席正是一贯遵循这一革命原则，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我党的正确的革命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由于背离了这一革命原则，而陷入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泥坑，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1962年，毛主席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在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题词中重申：“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光辉指示指明了世界革命胜利的航向，鼓舞了正在斗争中的日本和世界革命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经典文献。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共产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十分重视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经典著作，从1942年整风运动时起一直规定为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之一。今天，在世界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国际关系正在进行着新的调整和变动的时刻，在国内形势大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批修整风运动更加深入进行的时候，我们学习列宁的这本光辉著作，对于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而斗争。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报告》的伟大意义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把历来居于附属地位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推上了历史舞台。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奴役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进一步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占全世界总人口70%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是一支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力量。共产国际面临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制订新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成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

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列宁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写成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并提交大会讨论。大会专门委员会就列宁的提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列宁在7月26日就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向大会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补充提纲》。这是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光辉思想，为共产国际制订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革命战略方针和路线。

（一）必须把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明确区分开来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提纲初稿》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区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这个贯穿整个提纲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分水岭，是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列宁指出：“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

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的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①这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帝国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埋葬帝国主义制度。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竭力利用虚伪的民主词句来掩盖少数压迫民族对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实行的殖民奴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替本国资产阶级效劳，也制造了种种谬论卖力地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辩护，拒不承认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分，以便掩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尖锐矛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他们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启发被压迫民族觉醒，调动这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强调这个区别，并由此出发，确定自己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态度。

（二）必须努力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②因此“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0页。

^②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8页。

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①由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有共同的敌人，他们都遭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他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他们必然联合起来的共同基础。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必须坚决揭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贯推行的欺骗政策，什么“各民族一律平等”、什么“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以及什么在殖民地“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列宁写道：“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②这充分估计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两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意义。

（三）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列宁指出，是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任务，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③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

①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128页。

②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

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是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有坚决履行这种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列宁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工人政党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和工人贵族影响的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根子很深，所以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用市侩民族主义代替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①列宁的这个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评，在今天仍然适用。

（四）关于无产阶级在殖民地革命斗争中的策略

在列宁的《提纲初稿》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补充提纲》中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大众贫困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因此，革命的第一步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这些国家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②，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大多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页。

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①，针对这种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支持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的民主运动，并可以同他们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是绝对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②，并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报告》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促进和加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推动殖民地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列宁的这一思想的号召下，有不少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使这次大会成为一次世界性的盛会。列宁对此极为高兴并满怀激情地说，“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们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③

为了实现列宁的这一指示，进一步加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1920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俄国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共有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等国的32个民族的1891名代表出席。大会发表了对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

③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

东方民族的宣言，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大会通过了对欧洲、美洲和日本工人的宣言，说明东西方反帝斗争的相互依存关系。大会决定设立“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共产国际为这个刊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一振奋人心的口号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集中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和新的战略方针。

五、共产国际制定争取团结大多数群众的统一战线方针，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分裂活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维埃俄国到1920年年底已经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并已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苏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巍然屹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计划彻底破产了。但是，从十月革命后掀起的西欧各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风暴却先后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和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是失败的主要原因。1920年9月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和1921年3月德国工人起义的失败，标志着直接进攻的革命时期暂时过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暂时度过了政治经济危机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大举向工人阶级进攻，一方面指使其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政党，继续欺骗各国无产阶级，对抗第三国际，分裂国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策动法

西斯主义，妄图借助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血腥镇压工人运动。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首先上台，欧洲许多国家都滋长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新建立的大多数年轻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①，不善于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的领导之下。上述情况表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以势均力敌出现了“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②而暂时停顿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积蓄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准备的阶段。在此新形势下，共产国际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认真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制定争取团结大多数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正如列宁指出的，第三国际的第一步是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原则，坚决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在新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各国左派建立革命的共产党。这第一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已经做到。“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③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是要解决“怎样准备革命”的问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

①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1页。

② 列宁：《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6页。

③ 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2页。

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48个国家的509名代表。列宁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和“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规定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①，以便“为新的、日益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无论是防御战或是进攻战）作更周密、更切实的准备。”

^②大会认为，在世界革命出现了曲折，国际阶级力量对比暂时处于均势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策略应该从进攻的策略转为包围的策略，即共产党必须加强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大多数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决战，而不是针对直接准备内战的工作。因此大会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同他们一起参加斗争，以便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大会讨论中，这个新的策略方针遭到以意大利的特拉契尼为代表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代表团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反对“中派”为借口，采取了过“左”的不正确立场，对由俄共（布）代表团草拟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提出了27条修正意见，坚持“进攻理论”，说什么“为了从事革命斗争，共产党没有必要联合工人群众大多数。重要的只是能够在斗争的时刻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③为了不让这种“左”倾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引向错误的方向，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严厉地批评了特拉契尼的错误观点。列宁说：“要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你们无论在

^{①②}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7—508、509页。

^③ 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纪录》，俄文版，第239页。

一个国家内都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①列宁还指出：“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末，整个运动就会注定垮台。”②大会否决了特拉契尼的修正案，通过了“论策略”提纲。提纲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处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吸引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斗争”。各国共产党人必须“直接参加工人群众的斗争，对这一斗争实行共产主义的领导，并且在斗争过程中建立强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共产党。”③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为了贯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12月发出了关于制定工人统一战线的指示，要求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有的党（如法共）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1922年2月又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进一步讨论并制定了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全会决议指出，工人统一战线应被理解为实现一切愿意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人的统一。“统一战线策略丝毫也不意味着同改良主义对抗的立场有所削弱，而只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各个支部所遵循的那一策略的继续和进一步发

①② 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4、455页。

③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261页。

展。”^①

为了贯彻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在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第三国际的代表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4月2日至5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三个国际的会议。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所以参加这次会议，一方面是想利用统一战线使工人群众相信改良主义政策是正确的。柏林会议经过四天的激烈斗争，最后发表了一个《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的联合宣言》。《宣言》同意建立九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准备召开三个国际的代表大会；还决定在1922年4月20日或5月1日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但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毫无诚意执行这些联合行动的决议。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假联合真分裂的叛徒面目。共产国际的代表遂于5月底退出九人委员会，并发表声明揭露他们的破坏行为，提出“争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万岁”^②的口号。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8个国家的408名代表。列宁在给大会的书面贺词中指出：“尽管在各国共产党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共产国际还是在成长着和壮大着。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③大会进一步讨论、制定和贯彻团结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方针，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提纲”指出，

^{①②} 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375—376、445页。

^③ 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页。

“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起作用”，“现时只有这个策略才能够向共产主义者指出争取劳动人民多数的正确途径。”^①“提纲”批判了从右面和“左”面来的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指出“统一战线不是别的，而是共产党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保卫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向所有属于其他各党派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提出的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②“提纲”要求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完全支持工人统一战线口号，并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主动权。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当然必须根据本国的条件和情况把共产党的策略加以具体化。”^③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东方问题。这不但是因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首要的作用”^④，而且当时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东方各国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诞生并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东方大好的革命形势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支援了正处于低潮时期的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促进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成为共产国际所面临的另一重要任务。正如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力量的过渡时期，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而

^{①②}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17、418页。

^{③④}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26、451页。

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提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这种口号之所以合乎时宜，是由于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而曲折的斗争的这一前景，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①“提纲”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努力实现自己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支援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西方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则应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揭露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推行的血腥的殖民主义政策，努力加强在殖民地的工作，积极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列宁在11月13日向大会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谆谆教导各国共产党人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再学习，要善于互相学习和利用别国的革命经验，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列宁说：“如果这一点作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②这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中给全世界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遗训。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为贯彻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反击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竭力破坏工人统一战线，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1923年5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汉堡召开了合并

①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48页。

②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0页。

大会。“中派”集团所以撕掉伪装同右派合并，是为了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际，进一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破坏无产阶级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还指使由其操纵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建立）向革命工会运动发动了有组织的进攻，采取一切手段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瓦解革命工会，甚至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

当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右派分子对革命工会展开进攻的时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开始了分裂活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虽然在1920年正式加入过共产国际，但这时也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并提出了工会运动脱离共产党而“独立”的反动口号。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为了贯彻工人统一战线方针，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同这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 *

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共产国际前期一共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做了很多工作，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推进世界革命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局面。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毛主席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自从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使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它们的半殖民地。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厂矿，控制了中国的通商港口、海岸、交通线，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工业，相应地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利用军事和财政经济力量扶植中国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伙同

^①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买办资本和封建地主以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超额地租等方式残酷地剥削中国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广大贫农群众，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不得不允许中国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样就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其中除少数民族败类和洋奴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要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既使中国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苦难境地，又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中国人民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强大的敌人，从1840年反对英国的鸦片战争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整整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都先后失败了。在这段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外御列强、内建民国，历尽千辛万苦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这些努力，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以及资产阶级思想武器的软弱不中用，而宣告失败了。惨痛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华民族要解放，必须有新的思想武器，即马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4页。

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走新的革命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化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促进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随着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迅速壮大起来，到1919年已增至200万人左右。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1914—1919年间，工人罢工斗争达100多次，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中国广大农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给他们造成的极度贫困和灾难，不断掀起抗捐抗粮，打富济贫的斗争。1912—1919年间，农民斗争事件约有200起，从南到北遍及全国。在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身受失学失业痛苦、目睹民族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组织学生团体，介绍各种新思潮，发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

毛主席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毛主席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压迫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年代，从小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目睹社会的黑暗、劳动人民的疾苦、国家的不幸和民族的危机，深受长时间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精神的陶冶，立下了指点江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革命理想。从1913年到1918年，毛主席就学于湖南长沙第一

师范。在这里，毛主席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批判地博览古今中外的名著，勤奋地刻苦钻研革命理论，研究世界大势，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毛主席十分重视理论结合实际，深入群众，对中国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组织群众，参加实际斗争。1917年夏天，毛主席步行千余里，历时40多天到湘中五县进行社会调查，虚心向农民学习，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17年11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工人夜校，向工人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毛主席满怀革命激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并号召革命人民起而仿效。毛主席极其重视革命的组织工作，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于1918年4月正式成立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9月，毛主席为组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革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毛主席为革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播革命真理。从此以后，毛主席就确信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这期间，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上经常有人撰文介绍或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外，全国各地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的影响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

地即将到来，中国革命必然要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个革命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五四运动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真相的大暴露和中国外交的失败，则是这次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1月，由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主持召开的巴黎和会蛮横地拒绝中国关于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利等项正义要求，反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革命口号，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这个爱国运动，6月3日大规模逮捕学生，妄图扑灭人民的革命怒火。6月5日，学联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救援被捕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紧张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中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唐山、长辛店、武汉、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在工人阶级的带领下，各地的学生、店员、商人也纷纷举行罢课、罢市。三罢斗争迅速形成了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席卷了全国20多个省、大小100多个城市。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使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惊，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亲日派卖

国贼的职务，并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五四运动期间，毛主席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成为正确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立即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领导建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发动了长沙学生实行总罢课，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毛主席积极引导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组织长沙等地的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与工农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毛主席还积极发起和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湖南的革命斗争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五四运动给予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革命意志。毛主席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力量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因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9—660页。

播、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在五四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下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二、毛主席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在逐步深入。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它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象雨后春笋似地日益增多。除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继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上海、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都积极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伟大旗手。

为了大造革命舆论，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研究革命实践中的问题结合起来，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毛主席于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横扫千军的革命气势，向旧世界宣战，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的罪恶，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以及其它许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现实的犀利文章。在《民众的大联合》等论文中，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外历史，总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有压迫，必有反抗，只要被压迫人民以贵族资本家之道还治其身，实行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大联合，走马克思所指明的革命道路，世界一切反动派都可以被打倒。毛主席还指出：由十月革命所引起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是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各国“阶级战争”兴起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劳动人民做天下的主人。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怀疑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联合起来解放自己的错误观点，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着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已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只要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民实行大联合，中国大革命必将先告成功，中国的社会革命必将更为彻底，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坚定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前途，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革命意志，对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十月革命后国际上的各种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

动思潮在中国都有一定的反映，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会遭到各种敌对社会思潮的反对，而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了深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同当时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首先起来激烈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五四运动中的右翼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他在1919年7月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贩卖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猖狂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积极鼓吹一点一滴地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对胡适派反对革命、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毛主席指出，改良主义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修修补补是不成的，要达到成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主义指导，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还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必须有许多人来做促进的运动，必须形成一个广大群众的运动。此外，其他人也发表文章驳斥了胡适派的谬论。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感到惊恐万状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和反动帮闲文人张东荪之流，也继胡适之后跳出来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12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现在与将来》二文。1921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在这三篇文章中，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似乎是懂得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者”来恶毒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胡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断言中国不会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主张依靠绅商阶级和军阀的帮助来发展资本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对梁启超、张东荪之流坚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予以迎头痛击。毛主席坚决斥责了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诬蔑，热情歌颂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毛主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党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中国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也撰文指出，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要求极为强烈，因而在广大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共产党，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

当时混在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竭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大肆贩卖西方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反动学说，鼓吹所谓个人绝对自由，否认一切国家、政党，集中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对在中国建立集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1920年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就对严重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威，反对国家和政党，提倡个人绝对自由，事实上是永远做不到的，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掌握着

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政党，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由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才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恶劣影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先进分子中的优势地位。

经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反动思潮的激烈斗争，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思想条件。这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提上了革命的日程。从1920年夏天起，中国共产主义者积极投入了建党的准备工作。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毛主席集中主要精力为建党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0年7月，毛主席在长沙公开创办了“文化书社”，大量销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同年9月，毛主席以“新民学会”左翼为骨干，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引导会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工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同年10月，毛主席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党的预备队伍——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在长沙、水口山、平江等地工矿区建立了团的组织。这就为建党准备了组织条件。

与此同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巴黎、东京的留学生中先后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都积极开展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会，物色发展对象。1920年11月，

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半秘密的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大力宣传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大量报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第三国际的历史，转载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和美国共产党的纲领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许多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通过这些问题的宣传和讨论，帮助各地的共产主义者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了建党的决心和信心，促进了建党的准备工作。

在加紧筹建党的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和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中，对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多数人坚决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组织共产党作为指挥作战的“神经中枢”。少数人竭力主张中国革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反对建立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种意见分歧，反映了建党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建立第三国际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呢？还是建立第二国际式的修正主义政党呢？毛主席坚决赞同革命派的观点。毛主席在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两次写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志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指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反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于党的革命道路，毛主席提出

要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改良主义与温和革命论。他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指望他们回心向善，那是幻想，非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毛主席主张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入党条件必须严格，要发展真正同志，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同时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关于党的奋斗目标，毛主席认为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党必须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毛主席的这条建党路线完全符合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所规定的原则。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规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的基础上，完全摒弃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传统与影响。

这时，新生的第三国际在全世界竖立起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许多国家中纷纷建立。共产国际对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十分关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为了贯彻执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共产国际东方局曾先后派代表来到中国访问，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对外政策和第三国际的宗旨，建议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国内外革命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的指引

下，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举行。湖南、湖北、山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参加了大会，代表70名党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等同志。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讨论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少数代表主张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否认建立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建议把党办成一个知识分子自由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另一些以刘仁静为代表，反对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在会上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同多数代表一道反对了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大会决定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中央领导工作。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著名，五四运动以后伪装“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实际上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革命派。陈独秀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然而由于他当时的名声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把他选进了中央领导机关。这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的指引下诞生

的，党将在成长过程的斗争实践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选择真正的革命领袖，坚决清除一切假革命真叛徒出党。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因此，“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②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英勇奋斗，终于战胜国内外、党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阴谋与破坏，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生的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

^① 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3页。

^② 毛主席：《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①。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长期进行思想理论准备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也无法完成列宁所指出的这一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任务。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最杰出的代表毛主席最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中外历史和革命的经验，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这个**“特别崇高的任务”**。毛主席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论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经典文献。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94页。

②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页，第138页。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总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的丰富经验，分析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道路、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科学回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官僚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国内毫无民主可言；由于身受三重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而且拥有广大的农民作为自己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和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最有利的革命活动场所，因此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还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

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这条道路发展和胜利的。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又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针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大的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相结合，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主席进一步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①，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验。毛主席还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

^① 毛主席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①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这样，毛主席就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的革命真理，是当代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所以诞生在中国，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在1949年驳斥艾奇逊对中国革命的诬蔑时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毛主席的这段精辟的论述，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的回答。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产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① 毛主席在1968年10月的一次谈话。

② 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4页。

的世界革命。这一伟大的世界革命所提出的历史任务，是把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汇合成为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共产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战略口号。要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口号，就必须把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运用到东方各民族国家的具体环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必然要大大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列宁、斯大林瞩目于东方，特别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定将给整个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打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胜利终究要以这些国家的斗争为转移。

20世纪初的中国，既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又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都把魔爪伸入中国，妄图独吞或合伙瓜分中国，使中国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还在中国各自扶植封建军阀买办作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些傀儡代表主子的利益，连年展开不断的激烈争夺战。因此，帝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封建军阀买办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在中国表现为极端尖锐的不可调和性。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实行无比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反抗斗争。因此，世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尖锐和不可调和。中国人民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同时也反过来支援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样一个世界矛盾集中点的大国发生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不但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而且直接影响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处在这样重要地位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道路和基本经验，必然大大地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完整、最科学的总结。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和深重灾难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更面临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强烈反对、破坏和围剿。敌人之多，敌人之猖狂，敌人之阴险狡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不但中国民主革命需要独创地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特点，运用别国的革命经验，创造性地摸索自

己的道路，制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的方针和政策。

中国革命的斗争是激烈的、曲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解决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斗争是极其尖锐、激烈的，也是非常残酷、曲折的。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的封建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又经历了多次的来潮与退潮，发展与挫折，进攻与退却，经历过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破裂，发展变化与重新组合，以及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也经历过党内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多次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大的、这样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一系列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给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完整总结，必然会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长期深入革命斗争实践，总结中外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谬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毛主席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

^① 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3页。

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这样。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亲自参加和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率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英勇斗争，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②毛主席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一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坚决反对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毛主席总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中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正确地提出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在不断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①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②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毛主席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最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最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则，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外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之上升成为理论，再回到群众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②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路线斗争问题，因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③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既反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各种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也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僵死的东西的教条主义。毛主席十分重视总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用于教育全党，指导革命，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我们党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背离

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②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③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 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1971年12月1日）。

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我们必须永远记取这个真理，同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四、毛主席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立即投入了伟大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反映在党内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期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全国热火朝天。1922年1月香港六万海员工人为反对英国资本的压迫而举行的大罢工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的序幕。党的“一大”以后回到湖南担任党的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主席亲

自领导了湖南和江西安源地区的工人运动，粉碎了窜到安源进行破坏活动的工贼刘少奇的叛卖勾当，于1922年9月成功地发动了安源路矿一万多工人的大罢工。1923年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一年来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罢工人数达30万人以上。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推动革命运动深入发展，1923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了陈独秀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深陷绝望中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帮助他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我党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迅猛发展。1925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人民奋起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给英帝国主义打击最严重的是6月19日开始的、持续了16个月的香港、广州工人的大罢工，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毛主席亲自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并于1924年冬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韶山党支部。1926年，

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骨干。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1926年下半年就兴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并于1926年7月开始了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出发，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打垮了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把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旗帜插遍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加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一小撮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地主买办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惊恐不已，加紧了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加深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尖锐对立。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与陈独秀在1923年抛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机会主义代表作，针锋相对地反映了这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根本分歧：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领导权问题。

毛主席在两篇光辉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领导权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回答。毛主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

真正目标。”^①这就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是，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②的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中国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不可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③，而必然是社会主义。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必然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工业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④。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借口中国产业落后，诬蔑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胡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公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他提出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认为，革命的结果和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不过获得一些自由权利，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万里长城”论的翻版，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言，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

①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5页。

②③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4页。

④ 同上，第8页。

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①，而且又集中，经济地位又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毛主席对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毛主席指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③，有赞成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形势下，他们“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④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⑤“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⑥。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毛主席得出了如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⑦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①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8页。

②③④ 同上，第4页。

⑤⑥ 同上，第5页。

⑦ 同上，第9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思想，不但在当时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都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关于农民问题。

毛主席在两篇光辉著作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最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结论，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诬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反对农民运动，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等反革命谬论。毛主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①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生活极为艰苦，“**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②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③，“**最听共产党的领导**”④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⑤，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⑥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高

①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9页。

②③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6、7页。

④⑤⑥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20、21、14页。

度赞扬了农民运动的革命先锋作用，欢呼由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从中国中部兴起的急风暴雨的农民运动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①，完成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②这实在是好得很！而不是什么糟得很。毛主席还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③，“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④，也无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毛主席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⑤的革命口号，并明确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⑥。这明显地是把农民协会看作农村革命政权的最初形式，毛主席还把农民掌权后几个月中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总结为十四件大事，热情地歌颂了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成就。这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反对农民运动的最有力的驳斥。

第三，关于武装斗争问题。

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不要掌握和领导武装力量，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领导权和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⑦可是陈独秀右倾机

①②③④⑤⑥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5—16、17、14页。

⑦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9页。

会主义者却一贯否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忽视掌握军队的重要意义，听任蒋介石轻易篡夺军权，并且对于在革命斗争中新诞生的农民武装百般刁难，并加以限制和取消，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得进行武装斗争”“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而要保留地主的武装。毛主席对于陈独秀否认武装斗争、不抓军权、放弃军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十分重视军事工作，特别对于在农民运动中出现的农民武装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真正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①，并提出了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农民常备武装组织，把非常备的梭标队普及于全体革命农民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针对陈独秀之流反对武装农民的反革命叫嚣，坚定地说：“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②

总之，当时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还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农民同盟军，要枪杆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要农民，不要枪杆子。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

^{①②}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28、29页。

(二) 毛主席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以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激化，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日趋尖锐。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被革命的迅猛发展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活动吓破了胆，顽固地推行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一味妥协退让，同时利用职权，实行政治专制统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千方百计地压制排斥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毛主席坚持革命路线，对陈独秀牺牲无产阶级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极右派于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反革命黑会，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这是混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篡权的反革命信号。毛主席不但及时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的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本质，并且成功地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革命的新三民主义，通过了斥责右派的决议，处分了西山会议派。但是，陈独秀非但不反击右派的进攻，反而在上海与西山会议派的骨干戴季陶密谋，急忙把右派分子护送到广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竭力使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些右派分子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职务，致使右派日趋嚣张。

1926年3月，蒋介石阴险地一手制造了所谓中山舰“撞入黄埔”的“中山舰事件”，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并以此为借口扣留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从而实现了他篡夺第一军军权的预谋。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坚决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但是，陈独秀却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公然胡说中山舰事件是我们“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并百般地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到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接着，他又在5月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各部，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等，并迫使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一反共议案，趁机窃取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非但不抵抗，反而无耻声称：“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解决，他党无权赞否。”陈独秀的妥协投降使革命面临危机。毛主席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引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1926年3月发表了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1926年7月以后，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风暴迅猛发展。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好得很！”吓破了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却恶毒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并阴谋对农民运动进行破坏和镇压。陈独秀紧跟地主买办阶级，充当反对农民大革命运动的帮凶。他在1926年9月召开

的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一手炮制了一个反对发动农民、反对武装农民、反对农民夺取政权的决议案。这是迎合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需要，压制农民革命的投降主义纲领。为了驳斥地主资产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引导全党坚决地依靠农民来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于1927年1—2月用了32天的时间亲自调查了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并于3月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伟大经典文献，热情歌颂了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提出了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还深刻地阐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光辉思想，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范例，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陈独秀顽固地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拒绝接受毛主席的英明意见，并利用职权禁止党中央刊物发表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论文。

1927年春，北伐军进占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一方面加紧收买怂恿其新代理人蒋介石公开叛变，反共灭共，另一方面亲自出马，制造了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的严重事件，这是帝国主义公开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面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反革命严重威胁，毛主席挺身而出，在1927年3月16日武昌追悼被蒋介石杀害的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烈士大会上坚决指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进行反攻，以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可是陈独秀却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镇压革命的血腥罪行熟视无睹，不仅不去揭露蒋介石正在加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反而于4月5日和

国民党另一右派头目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胡说什么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革命人民“不听信任何谣言”等等。就在这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反革命宣言的掩护下，一周之后，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其势力所及的地区，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遭到血腥屠杀。在革命陷入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又一次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提出迅速加强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进攻等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但是，陈独秀实行“家长统治”，独断专横，拒绝讨论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并把毛主席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毛主席的表决权。大会经过斗争，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通过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但是仍旧选他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使挽救革命的努力归于失败。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区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游行示威，誓与此叛党叛国的奸贼斗争到底。但是，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假左派真右派汪精卫之流，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下，正在与蒋介石举行秘密谈判，遥相呼应，准备公开叛变革命。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相继叛变，预示了汪蒋的反革命合流迫在眉睫。5月底，湖南10多万农民武装高呼：“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革命

口号，包围了长沙。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正义行动。但是，陈独秀却叫嚷：农民攻城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下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结果，使反革命更加嚣张，20几天内，长沙附近一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屠杀，把革命力量最雄厚的湖南断送了。这时，一贯追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刘少奇，利用他窃踞的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身分，与汪精卫集团秘密勾结，加紧叛卖活动，于6月28日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都拱手交给了国民党，充分暴露了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嘴脸。为了挽救陷于十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对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毛主席在6月底召集被迫转移到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明确指出，许克祥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地区，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然而已病入膏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慑于反革命的气焰，根本听不进任何革命意见。他不但再一次蛮横地拒绝了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为挽救革命而提出的正确主张，并且死心踏地地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在6月30日操纵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向国民党公开投降的“国共合作十一条”，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说什么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病假”的名义退出政府，甚至提出工农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叛卖革命的彻底投降书。就在他

的这个可耻的投降书抛出以后半个月，武汉国民党头目汪精卫公开叛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法西斯口号下，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资产阶级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叛卖遭到了失败。但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以前一切革命所不能比拟的，因而提供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对这些经验教训曾经作过科学的总结。

第一，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党必须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②但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因此“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③“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②③ 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573页。

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第二，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巩固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②因此，虽然当时已经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由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还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辨别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致使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没有为全党所接受，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在后期统治了全党。这样，“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③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由

①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2—143页。

②③ 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573、573、574页。

于党还不成熟，还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毛主席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的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①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②

第三，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必须坚持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③，“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④，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以后，才“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⑤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⑥，因而“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⑦，北伐军八个军10万人中，大部分未经认真地改造，只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的一支军队，党又不善于掌握和领导它。结果造成“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8页。

②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61页。

③④⑤⑦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9、512、509页。

⑥ 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53页。

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①遂使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大革命在外敌与内奸的联合进攻下遭到了失败。“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②

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它教育了党，锻炼了党，使全党更加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航向的光辉灯塔。它鼓舞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继续革命的决心。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又继续战斗了。”③

①②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3页。

③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第 八 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对托洛茨基、
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毛主席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一节 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坚持列宁
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的革命。
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等人利用列宁
重病及逝世时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在捍卫
列宁主义斗争中的伟大历史意义

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终结。列宁指出，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击败以后，还会出现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列宁的英明论断。在列宁病重的时候，托洛茨基等人就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列宁逝世以后反党野心家托洛茨基的反革

命活动更加猖獗。其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接连进行反党活动，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场新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继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之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论战。

斗争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不仅扼杀了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的革命而且处心积虑地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企图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瓦解苏维埃政权。

1923年欧洲爆发了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的革命。1月，法国、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德国鲁尔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德国帝国主义者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企图使法国垄断资本家和他们签订协定。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妥协退让，引起了德国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失业工人达数十万，工人纷纷起来，要求占领者滚开，要求政府辞职，要求按照和平时期的水平规定实际工资。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组成了“无产阶级百人团”、“工厂委员会”，革命开始了。

革命危机的到来，迫切要求德国共产党团结大多数工农群众，组织武装战斗队，准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工农

政府。但是，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却竭力阻止日益成长的群众运动，丝毫不打算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他们歪曲统一战线政策，用私下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订立协定来代替建立广泛的以革命群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当他们参加了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工人政府”以后，不是代表革命群众制定自己的独立政策，而是和资产阶级政客一样，以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麻痹工人。布兰德勒分子的投降主义立场和社会民主党首领的背叛行为，大大便利了资产阶级，不久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就被资产阶级所解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只有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显示出德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汉堡工人由于没有得到国内其他地区无产阶级的支援，在英勇战斗之后被迫退却了。布兰德勒分子的投降政策，引起了党内的普遍愤怒。因此，在1924年4月的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布兰德勒等人被解除党内的领导职务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除了德国以外，保加利亚和波兰也发生了革命运动。1923年6月9日，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支持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反动政变，斯丹保里斯基政府（农业联盟的首领）被推翻，赞科夫为首的法西斯分子上了台。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有40,000党员，在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但当赞科夫发动法西斯政变之时，保加利亚共产党却低估了事变的意义，错误地认为这次政变是城市的与乡村的两个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采取了宗派主义立场而未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与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致使保加利亚反动派轻易获得了胜

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时指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和农业联盟组成了统一战线并准备武装起义的力量,但是,由于党内意见并不统一,起义没有同时发动,无产阶级集聚的各大工业中心也没有发动起来。结果,虽然由季米特洛夫和柯拉罗夫领导起义运动的西北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表现了无产阶级无比的英雄气概,但掌握优势力量的政府,还是把起义运动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当时惨遭杀害的工人和农民有20,000人以上,被捕并交付审判的则达50,000多人。

1923年在波兰也掀起了强大的罢工运动浪潮。同年11月爆发了克拉科夫武装起义,工人解除了军队和警察的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使这个城市在36小时内转到工人掌握之中。但是,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掌握在叛徒手中,他们用欺骗手法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把他们交给施行血腥镇压的政府军队,从此革命转向低潮。

在国际上德、保、波革命运动横遭镇压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遭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当时苏联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工、农业的恢复工作顺利发展,但还存在很大困难,比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还低于战前水平,卢布贬值,由于工业品昂贵,商品滞销,造成大量商品积压。有的企业因开工不足、资金短缺,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甚至发生了罢工现象。

国际国内的形势都要求苏联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以争取新的胜利。但是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却乘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纠合了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

派”、“民主集中派”，发表了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即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底声明书），反对党的政策与党的领导机关。他们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预言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他们要求党内要有派别活动自由。随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矛头指向党的领导机关的信，在信中他把党员群众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青年和老干部对立起来，借口要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把老干部一概诬蔑为已经“官僚”化了，“僵化”了“蜕化”了，应反对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同时对青年学生和年轻党员却进行无原则的吹捧，说什么“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锐”，煽动他们起来推翻领导，撤换现有的领导干部。其目的是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竟采用非组织手段将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政纲直接印发各区组织和各支部，要求党员们去讨论，这实质上是托派向党发出的挑战书。

联共（布）当时虽然忙于更为紧迫的经济工作，但还是在全党开展了大辩论，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工厂和高等学校到处发表演说，攻击党的领导机关，嚣张一时。但是，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乌拉尔、巴库以及其他大工业中心的党组织，工人党员给了托洛茨基的进攻以毁灭性的回击。争论的结果，在全苏各地拥护托洛茨基分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托派分子在这次辩论中彻底失败了，全党进一步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1924年1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托派分子的反党派别活动，指出它“意在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代表会议并且提醒全党说：“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唯一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大坚定的共产党员有时会受非无产阶级势力的支配，乃是必不可免的。整个党应看到这种危险，并密切注意保护党的无产阶级路线”。①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向党进攻的一系列两面派手法。斯大林指出：反对派与其说是维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来损害中央委员会，反对派不是一些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正是他们，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了关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大搞宗派活动。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口口声声说托洛茨基受到了攻击和欺负。事实上正是托洛茨基曾经两次拒绝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要求他担任苏维埃中央机关负责工作的决议。他有时长期称病拒不工作，但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拉拢私党，大搞派别活动。

斯大林还揭露了他们称“天才”的诡计。托派分子一面伪善地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一面却狠毒地咒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斯大林尖锐地指

①《关于党内争论总结与小资产阶级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第207页。

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①

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对托派集团是极沉重的打击。托派分子反党篡权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他们的猖狂进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反对派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有重新挑起争论的危险，代表大会也注意到，俄国共产党反对派得到了波兰、德国、法国等党内某些集团的支持，代表大会对此提出了谴责。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列宁同志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了，这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大损失。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不仅是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创始人，而且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为伟大导师的逝世而感到无比的悲痛。

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写道：“工人阶级的命运痛

①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苦不堪。劳动者备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治。”“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各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各字。”①

在这样的时刻，俄共（布）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来弥补因列宁逝世而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把列宁的事业推向前进，成千累万的群众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的时间里，有24万多名先进工人被吸收入党。

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则以为时机到来，他们乘党和国家处在困难关头，又再次向党发动了更

①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44页。

加猖狂的进攻。他们在进攻党的领导机关以篡权的图谋遭到失败以后，便改换了手法，企图篡改党的指导思想，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从而为他们彻底更换党的领导制造舆论，以改变党的路线。

同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底教训》、《论列宁》等著作。他采用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伪造和歪曲革命历史，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同时却肆意歪曲列宁的形象，恶毒地破坏革命领袖的威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为了揭穿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捏造，保卫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保卫列宁主义，斯大林在《论列宁》的演说及《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中，把托洛茨基一伙的谎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就把托洛茨基这一伙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及其罪恶目的充分揭露出来。

托洛茨基贪天之功为已有，硬说：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从1917年起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武装起来之后才成为一个彻底革命派别的。说他（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2、3月间就制定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定的路线。斯大林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①。事实上，1917年4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划清界线。

托派还捏造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

^①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

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起义的唯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痛斥了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只是执行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决不是什么唯一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十月革命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①

托派胡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组织者。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革命处于不利形势下，张皇失措，畏缩退却的事实，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列宁领导下，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在列宁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

在《论列宁》一书中，托洛茨基阴险地把列宁描述成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吏，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卑劣的诬蔑。斯大林说：“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解决问题。”②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③“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

①②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307页。

③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①，“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邃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②

斯大林还深刻而鲜明地刻划出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他说，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在斗争中从不畏缩，大胆地引导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在斗争遭到挫折的时候，从不灰心，而是精神百倍地鼓舞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战斗；在处于胜利者的地位的时候，决不骄傲，而是更加冷静地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为巩固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而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列宁总是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决不随波逐流。“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的级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个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③

在保卫列宁的同时，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所以要破坏列宁的威信，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④

由于列宁主义在苏联和全世界日益深入人心，托洛茨基

①②④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7、308、301页。

③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3页。

在“偷运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不得不“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①。因此，在托洛茨基的言论和著作中大量出现歪曲列宁主义的东西。1924年，托洛茨基在其出版的《新方针》这本小册子中，他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所谓的定义，“这些话都很漂亮，很象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②

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后来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附和。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胡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否定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挑战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进攻前后配合的。季诺维也夫的谬论实际上是第二国际反列宁主义谬论的翻版。因此，当时在苏联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具有国际斗争的性质。

①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

②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5页。

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为了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影响，斯大林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1924年4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以后又继续写了《列宁主义几个问题》等著作，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粉碎了托洛茨基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进攻。特别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对教育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和群众起了巨大作用。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又说：“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①季诺维也夫的定义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季诺维也夫否认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硬说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这就无异说列宁主义对那些农民较少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适用的。斯大林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谬论，指出：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派生问题，即农民问题。季诺维也夫之流就是这样用解释和歪曲列宁主义来贬低列宁主义的。

第二、论证了革命理论对革命斗争的巨大意义。

斯大林说：“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②斯大林对机会主义的自发论进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4页。

^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6—80页。

行了批判，指出：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斯大林说：“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①

第三、捍卫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

斯大林指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个别国家胜利的理论不仅是阐明了胜利的可能性，而且阐明了胜利的必然性。这个理论早已为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所证明了。托洛茨基一贯用他的“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列宁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四、进一步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斯大林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平过渡的谬论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②斯大林还深刻地论述了列宁关于必须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斯大林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这就是：打破地主、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复辟行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起

^{①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101页。

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消灭阶级，组织革命军队和国外敌人、帝国主义作斗争。这三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历史经验证明，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就会导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歪曲。

为了要完成上述各项专政的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斯大林说：“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①

第五、论述了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

斯大林驳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农民问题上的谬论，他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谁想要去夺取政权并准备去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没有农民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样，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摆脱贫穷。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他说：“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

^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①

斯大林对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因而就具体地证明了农民的革命性，农民是可能而且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同时也就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会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的反动谬论，斯大林说：“……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②

第六、深入地阐述了列宁的建党学说。

斯大林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③斯大林根据列宁对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的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党应有的特点，这就是：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是团结统一并具有铁的纪律的组织，它是靠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成长，靠清除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还就民族问题、战略策略问题、工作作风问题、方法问题等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①②③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1、121、149页。

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实质上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明了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点，从思想上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广大党员和群众，划清了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界限，对于埋葬托洛茨基主义思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斯大林所阐明的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还武装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它至今仍然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武器。

二、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工业化而斗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再论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发表。托季联盟的被粉碎

在联共（布）胜利地击退了托派进攻的同时，苏联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25年底，全国农业产值已经达到战前产值的87%。农业合作社有了显著的发展：从1924年1月1日到1925年7月1日，加入各种合作社的农户总数，由174万户增加到500万户左右，几乎增加32倍。

大工业的生产已达到战前产值的3/4。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业的产值已占总产值的81%，而私营工业的产值只占19%。消费品的总产值已达到战前水平的2/3以上。铁路运输业正在恢复，货物周转量已经达到1918年的80%。职工人数也迅速增加，一年当中增加了150万。到1925年底，全国的工人（包括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超过了600万人。

国内贸易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商品流转总额达到战前的

70%。其中国营商品流转额占50%，合作社商品流转额占25%，私营商品流转额占25%。私商已逐步从市场上被排挤出去。

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营工业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超过了战前水平。全国文盲的数字已大为减少，1920年全体居民中识字的人只占32%，到1926年年底已经提高到40%。农村成立了22,000多个农村阅览室，广播和电影开始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告终结。

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随着德、保等国革命被镇压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

斯大林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析道：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

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都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苏联今后的发展方向问题就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而技术上经济上又很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

俄共（布）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白确切的回答。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

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够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末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①。十四次代表会议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

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方针，并为对抗这一方针而再次搬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布哈林分子当时还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暗中已开始用自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和党的方针对立，并用“发财吧！”的口号来补充这个“理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声言：苏联因技术上经济上落后而不能达到社会主义胜利。这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立场就在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取得胜利的孟什维主义观点上结合起来。

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革命越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就越来越多地排挤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越要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结成了“新反对派”来向党进攻，这就是反党的“托季联盟”。

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1925年12月）是作为国家工业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②代表大会的

① 《苏共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3分册，第48页。

②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决议写道：“争取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取得胜利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①代表大会指出，经济建设应该朝着下面这个方向发展：使我国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国家。苏联应该成为一个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独立经济单位。

“新反对派”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都反对党的方针。季诺维也夫等人曾经假装拥护党的路线，以骗取列宁格勒党员的信任，取得了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格勒这一最大党中心组织的代表团，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操纵下竟以独立集团的姿态在会上煽风点火，企图推翻党中央，篡夺党的领导权。

“新反对派”集中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党的国家工业化方针，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方针。他们硬说苏联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硬说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退却——向资本主义退却；硬说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等等。按照他们的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主要是出产原料和粮食以输出国外，并从国外输入它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不应生产的机器。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新反对派”分子所提出的投降主义计划，通过了国家工业化方针。同时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同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论这种企图来自什么地方，是由谁策划的。”②但是“新反对

① 《苏共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77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84页。

派”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央委员会却投了不信任票，甚至声称他们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在返回列宁格勒后，就按自己的方针在党员中进行活动。

为了揭穿“新反对派”的头目，代表大会在告列宁格勒党组织书中把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罪恶活动一一加以揭露，并在大会以后派莫洛托夫、基洛夫等人到列宁格勒去解释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揭发了“新反对派”的反党活动。列宁格勒党员的集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对“新反对派”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97%以上的党员都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谴责“新反对派”。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一个月举行了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撤消了季诺维也夫的领导，选举了以谢·米·基洛夫为首的新的省党委会。

1926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即所谓托季联盟。他们不顾党中央的屡次警告和广大党员的反对，继续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进行分裂活动，强迫全党进行新的争论。

托季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的时候，对斯大林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他们把斯大林说成是“庸人”、“苏联的独裁者”、“亚细亚暴君”，说什么“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等等。

托洛茨基之流所以刻骨地仇恨斯大林，疯狂地攻击党的领袖，是因为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反对党的领袖，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把党和国家引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在苏联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

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因此对游击战必须从战略地位来考虑，以制定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队必须建立根据地，随着根据地逐步扩大，直至最后收复全部失地。随着战略反攻阶段到来，游击部队将逐步发展为正规军，使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毛主席还制定了具体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①

《论持久战》是马列主义宝库的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它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规律，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军事上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彻底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舞鼓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毛主席所阐明的关于战争发展的规律、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对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毛主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

^① 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76页。

家共产党内肃清其影响。

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主义，是联共（布）党内的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石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修正和否定。

1850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理论，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①。他要求世界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完成民主革命之后，不停顿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国际的叛徒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宣扬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否定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妄图以此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列宁说：**“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②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革命不停顿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无比正确性。

托洛茨基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而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他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即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第一，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胡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

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退到了次要地位，农民成了没有革命性的“落后的一帮”。因此，同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要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第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无产阶级“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定，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愈不稳”。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有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去，才是出路。第三，所谓国际革命的“不断性”，他说“在一国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取消主义。它借口革命的不断发展来否认革命的阶段性，借口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来否认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工农联盟”，用混淆不同革命阶段的手法，达到取消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不断革农民的命，破坏工农联盟，散布在

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取消主义论调，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他要求各国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各国都不要革命。因此，斯大林把这个理论归结为“‘不断’绝望的思想”，“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①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党为实现工业化而斗争的关键时期，不粉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派分子反党篡权的活动就不能被揭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就不可能被彻底识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坚持和巩固。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时期他写的一系列著作和一些演说，如《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对打退托派的进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26年12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对于粉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捍卫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进行了批判：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7—328页。

(一) 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托派硬说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剧烈，那时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尚且不可能，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把均衡趋势与这个规律对立起来，因而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斯大林指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其差别在于：“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庞大的垄断联合的发展代替了通过自由竞争的发展；财政资本、‘腐朽的’资本代替了旧的、‘文明的’、‘进步的’资本；跃进式的发展，通过各资本主义集团以军事冲突来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发展，代替了资本‘和平的’扩大和向‘自由’土地的伸展；因此，垂死的资本主义，整个向下没落的资本主义，代替了旧的整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①由此就产生了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问题。托派集团把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于是就得出

^①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1页。

垄断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代更厉害的极为荒谬的结论。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无疑是在缩小的，均衡化是在上升的，正因为落后国家在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因此，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便尖锐起来。所以，均衡化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加强的条件之一。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要点：“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①托派集团既然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就否认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剧，这样，他们就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泥潭里去了，滚到反对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列宁主义立场上去了。

（二）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问题

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6页，

建设，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部条件。托派集团却胡说：农民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不但会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冲突，而且会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样，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会因没有同盟军而陷于失败。斯大林充分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农民生活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劳动农民可能而且必然和无产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说：“**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①。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就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托派集团的“敌对冲突”论是毫无根据的。由于不相信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们在政策上就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所谓“超工业化”计划。他们要求对农民实行最大限度的捐税压榨，要求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斯大林痛斥了这种政策上的冒险主义，指出它实质上是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22页。

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①

（三）技术经济落后的苏联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一向认为：“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②。托派集团则认为，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决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斯大林坚决驳斥了这种无耻谰言，他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③斯大林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3页。

②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168页。

③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8页。

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有强大的工农联盟作为基础，必定能战胜资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充分地估价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于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

托派荒谬地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因此，他们说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否则“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同时，他们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理论，大肆进行攻击，诬蔑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等等。

斯大林针对这些论调早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内矛盾，一种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下，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本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矛盾依靠一国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内取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要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页。

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同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也必将促进世界革命。斯大林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社会主义在一国内的最后胜利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民族狭隘性”。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同时这一切任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用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帮助全世界无产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手段”。①

托派集团把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把苏联无产阶级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忱诬蔑为“民族狭隘性”，其实质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取消革命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一贯宣扬落后的俄国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苏联无产阶级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在等待西方革命的过程中使党蜕化，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五）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托派集团还把联共（布）党的关于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路线攻击为“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并提出“世界分工”来证明自己的谬论。他胡说由于世界分工，苏联经济正在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3页。

“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隐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机器”，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托洛茨基的门徒就主张向外国借钱，发展农产品输出，输入工业品设备和机器来发展工业化。

斯大林彻底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需要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而且这种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是两回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虽然有贸易关系，但并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工农联盟走内部积累的道路，自力更生进行工业化，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托洛茨基所谓“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苏联经济“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就是否认在一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他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独立的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及国有化的运输、信贷、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领导，就会使社会主义工业化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但事实不是这样，由于苏联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如果按照托派的主张来发展工业化，就会把苏联经济“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①

①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页。

由上可见，托洛茨基以其“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攻击党的工业化路线，是以“左”的词句为掩护，包藏它右的实质。是为了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不仅对托派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批判，而且还总结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指出党内斗争矛盾的根源，从而就把托派分子的面目彻底地揭露出来，给予托派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①这些反对派分子的队伍基本上是以以前各式各样反党派别的骨干，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就结成联盟来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由于反对派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他们知道，依靠他们单个的力量是不可能动摇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于是就乞灵于联合起来的力量。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②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有较高的革命觉悟，他们仇视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争取群众信任的钓饵。斯大林强调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③。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④。

^{①②③④}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18页。

他们是一些毫无原则的家伙，象变形虫一样善变，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使人捉摸不定，因此成了“不被了解的人们”。斯大林认为这是一般机会主义者最常见的特点。

斯大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分析了党内矛盾的根源。他认为：第一，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使用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第二，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个阶层，有血统工人，也有出身于其他阶级而后来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作风、习惯带到工人队伍中来；还有工人贵族，这是机会主义生长的最好的土壤。后两个阶层是培养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因此，“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①

斯大林所阐明的党内发展的规律，教育了广大联共（布）党员，使全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掌握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彻底粉碎反党集团而斗争。

斯大林的《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是反对托派集团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它不仅在思想上击破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保卫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而且它还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人以

^①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页。

思想武装，对肃清各国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都起了重大作用。

当托洛茨基之流的进攻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的痛击之后，他们不得不改变手法，一面要求停止争论实现“党内和平”，一面又准备实行新的进攻。斯大林及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指出在他们坚持错误的情况下要停止对他们的批判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们真正愿意停止公开论战就应当公开承认错误，解散派别组织。为了欺骗群众，他们便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面向中央递交假检讨，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对党忠诚，一面却继续秘密保持他们的联盟，并在党羽中征收党费，散布政纲，私建印刷所。

1927年，托季联盟经过准备以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的政纲”。他们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同年10月到11月，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联共（布）中央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辩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有724,000个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4,000人，即不满百分之一。绝大多数党员都一致否决了联盟所提出的政纲。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11月7日，他们集合了一小群人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结果被声势浩大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队伍赶走了。此时，反党联盟已走上反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在举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

中央的，而现在，当他们举行示威时，却已走上向敌人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他们已把自己置身于党外。

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1927年末联共（布）召开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农业集体化方针，并讨论了托季联盟的问题。代表大会指出：“反对派在思想上已与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势力的工具”。

代表大会认为党与反对派间的意见分歧已经转变成了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公开反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资格不能相容的。

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入党籍的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中的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加米涅夫、依·斯米尔诺夫等反党分子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开除出党，从而宣告了托季联盟的被粉碎。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在国外仍然贼心不死，继续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三、共产国际和德、法等国共产党内反 对托派集团的斗争

联共（布）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

条路线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在联共（布）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托派反党集团进行胜利斗争的同时，共产国际和德、法等国共产党内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托派集团的斗争。

共产国际反托派斗争贯穿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几次全会中。在共产国际的第五、六、七、八、九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讨论了有关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各支部的各项问题。通过这些会议，共产国际对存在于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托派和托派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保证了共产国际及各国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派以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托派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实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方针，要取消英俄统一委员会这一国际工人统一战线组织，这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方针。

第三，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问题。托派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硬要给民族解放运动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

第四，关于党的领导作用问题。托派口头上叫喊“党的统一”，而实际上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要求党内要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成立第二党，从而破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坚决支持联共（布）党内及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同时也支持了德、法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胜利进行的反托派斗争。

共产国际内反托派斗争是从1924年6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开始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在大会通过的《策略问题》决议里，就专门批判了当时德共党内的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领导集团的托派观点，主要是他们关于党退出工会的极“左”路线。决议指出：“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的运动本身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极大的危险。对那种想使共产党人退出工会从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倾向，如果共产国际不一再给以坚决回击，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

①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谴责了联共（布）党的托派。第五次代表大会应法国共产党的请求开除了托派分子苏瓦林。法共内托派分子鲍里斯·苏瓦林是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公报》的编辑。他自托洛茨基开始向党进攻时起，就公开站在托派一边，把托洛茨基向党进攻的《新方针》一书用法文出版，并为它写了一篇别有用心序言。他反对联共（布）党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吹捧托洛茨基，说他是一个国际人物，对世界无产阶级说来，他的名字就是革命的同义语，攻击他的语调是不恰当的。苏瓦林在党内大搞分裂活动，纠集党内右翼支持俄国托派和德国党布兰德勒右翼集团，赞成并且支持英国工党政府。他甚至给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页。

《共产党人公报》订阅者写信，攻击党中央委员会，他的所作所为给法国共产党带来严重损失。法共中央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开除他的请求。苏瓦林被开除以后，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反对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他利用《共产党人公报》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罗斯梅·莫纳特主编）来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俄国的托派也千方百计地想恢复他在法共的地位。季诺维也夫曾建议法共中央委员会恢复苏瓦林在《人道报》中的编辑职务并建议派遣他到中国作通讯员，托洛茨基也建议恢复苏瓦林的党籍，但都遭到法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拒绝。由于苏瓦林坚持托派立场，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根据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动议把他最后开除出党。托派分子罗斯梅·莫纳特主编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宣布为反革命报刊。

1925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五次扩大全会，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提纲指出：“许多党内所存在的不重视理论的现象，是共产国际所属各政党实现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巨大障碍。在对理论偏差等采取‘容忍’态度的情况下，也就谈不到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掌握列宁主义理论，是党胜利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特别危险的一种脱离列宁主义的倾向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是孟什维主义的一种变形，它是‘欧洲’机会主义和常常掩盖着政治消极性的‘左派急进’词句的结合。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单单倾向于孟什维主义，它是多年来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体系，它也不单单是俄国仅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共产国际中实现列宁主义，意味着揭露各党内的

托洛茨基主义，并且消灭这个流派。”^①

1926年2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扩大全会，主要讨论了各国党如何运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统一问题，同时也审查了各国党内问题。为了批判德共内托派马斯洛夫——路特·费舍，共产国际专门作了《德国问题》的决议。

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国外的最有力的支柱。马斯洛夫、路特·费舍和德国的“极左派”肖列姆、乌尔邦斯、舒马赫等人勾结在一起，进行反德共、反共产国际的活动。

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发表以后，1924年11月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就在德共的报刊上发表评论对它进行赞扬。1926年在共产国际对他们的一系列反党方针进行批判时，他们公开表示，在联共（布）所有党内争论的问题上，他们都同意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想法。

德国的托派集团，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国际三大、四大所制定的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认为：群众是被动消极的，而共产国际竟提出更争取群众，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把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污蔑为“俄国外交的棋步”，是“想与麦克唐纳社会民主党接近的企图。”这个集团非但不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反而公开号召党员退出工会，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力量。这个集团

^①《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26页。

还污蔑共产国际要把德共推向右倾。

德国共产党坚决粉碎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的进攻。1925年8月19日把他们开除出德共中央委员会，并于9月在德共机关报《红旗》发表了共产国际给德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详尽地揭发和分析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的错误，并为德共的整顿和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指示。同年11月1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举行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清算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的错误，并选出了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对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个集团的思想基础是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所反映的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没落思想”，“路特·费舍实际上如此地支持反共宣传，同时却在口头上‘拥护’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和德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她这种无原则的做法和危害党的外交手腕，不仅破坏了党员群众对领导的信任，而且也破坏了领导干部间的互相信任和党内一部分人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就这样，路特·费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和道义上终于破产了。”^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讨论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等人的问题，决定开除他们出德国共产党。这些人被清洗以后，组织了“列宁社”，更加公开地策应托洛茨基分子，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59—261页。

对共产国际、苏联和德国共产党进行疯狂进攻。但是，这个小集团已从思想上被粉碎，他们再也不能欺骗群众了。

“列宁社”很快就由于内部倾轧而分崩离析。

1926年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扩大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在他们的党羽支持下都起来发言，攻击联共（布）中央，攻击列宁的在一国社会主义首先胜利的理论。但是，经过讨论，大多数与会代表同意了斯大林的报告。会议在《俄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按其思想内容，实质上是联共（布）党内的一种有时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危险”^①，是对联共（布）党统一的威胁。会议决定把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布）党内反对派联盟的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展开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反对联共（布）党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党内的追随者企图破坏共产国际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阴谋，另一方面，要消除我们的敌人利用反对派的宣传可能对各国党争取国际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到革命和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工作造成的极端有害的后果和影响。”^②会议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八次全会。托派分子在

^{①②}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91页、第393—364页。

会上进行了垂死挣扎，对共产国际进行了最激烈的攻击，他们敌视和毁谤共产国际反对战争危险的方针，胡说什么世界政党（共产国际）变节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堕落了等等。他们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提出的反对纲领，当即遭到到会代表的坚决反击。全会提出如果托洛茨基不停止其派别活动，就要把他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且责成联共（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粉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进行的派别活动。

1928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完全赞同联共（布）十五大把托派清洗出党，并且宣布“凡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赞同它的观点，是同今后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队伍内不相容的”^①。同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又严正拒绝了托洛茨基、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等托派头目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的申请。

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坚决斗争下，托派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其追随者也越来越少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托洛茨基已因反革命罪而被苏联政府流放，托洛茨基向大会呼吁，要求大会撤消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决定，大会驳斥了这一要求，但是托洛茨基的呼吁却受到美共代表詹姆斯·坎农的支持。坎农回国之后就立即纠集一部分人进行托派宣传，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并在党内大搞宗派活动。当时，毕特曼、福斯特等人发觉这种情况之后，就对坎农、沙赫特曼和阿勃思进行揭发，三个托派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84页。

分子很快就被清除出党了。被清除在共产国际之外的一小撮托派破坏分子，在托洛茨基的纠集下，于1938年9月3日成立了一个包括欧美一些国家托派分子的国际组织，即所谓“第四国际”（又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企图与共产国际相对抗。但是，这一小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分子虽然在国际舞台上猖狂活动，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反革命组织终于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第二节 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一、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反对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斗争。斯大林对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被粉碎以后，联共（布）党内又出现了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1927年12月2日开幕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农业集体化方针。斯大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苏联由于工业化方针而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却由于小农经济而生产率很低，粮食缺乏，富农趁机破坏，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制造危机。这种情况使国民经

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斯大林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①这是党提出的当时农村的基本任务。同时，十五大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抗。在农村中，大批大批的富农拒绝把他们囤积的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暗害集体农民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放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谷仓。在工业部门，1928年在顿涅茨矿区沙赫特区发现了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矿山的事件，他们秉承外国军事侦探机关的旨意，在矿山中采用错误的方法采煤，减少煤炭产量，损坏机器，设法使矿井塌陷，甚至爆炸和放火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在机关中，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实行怠工和破坏。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反映到党内来，联共（布）党内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布哈林早在1925年就提出过支持富农经济的“发财吧”的口号。但是，在党还未向富农实行进攻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援助

^①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

托洛茨基分子，有时甚至还“反对”过托派，当展开对富农的进攻时，作为富农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布哈林和李可夫便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他们集中攻击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企图使社会主义建设迁就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如果不粉碎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就不能实现党向富农进攻的路线，农业集体化就不能在农村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为了打退富农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破坏粮食供应等进攻，1928年春，联共（布）党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打击富农。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并没收其全部剩余粮食，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长期贷给贫农。此外，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促进了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

党对富农的进攻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疯狂反抗，他们叫嚷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吓跑中农使工农联盟破裂。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是停止对富农的进攻和发展富农经济，提高粮价，使市场“常态化”。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张，斯大林指出，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会使国内政治状况恶化，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苏维埃失去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工人阶级决裂。他说：“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

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①

斯大林还批判了所谓市场“常态化”的自由贸易政策，指出这种主张要求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放弃价格政策，跟在投机商后面，“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②这样，国家和投机商在提高价格上越是实行竞赛，粮食持有者就越要把粮食囤积起来，国家仍然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而富农、资本家的经济力量却不断增涨。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放弃价格政策就意味着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斯大林说：“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耐普曼即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③

为了维护富农的利益，布哈林还制造了一套抹杀农村阶级对立的理论，为富农的剥削开脱。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我国的中农难道象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① 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

^{②③}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3页。

斯大林指出：“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斯大林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需要，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正因为这样，1929年年底，联共（布）中央颁布了由限制富农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由于农村中农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斯大林说：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的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③

布哈林对待工农联盟问题的主张，实质和托洛茨基主义一样，其结果都是破坏工农联盟。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从极“左”方面出发只看到贫农和富农的对立，看不到农村中广大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页。

②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页。

③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页。

的中农群众，反对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布哈林则从右的方面出发，抹杀农村阶级对立，要求无产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结盟。“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①

从经济上剥夺富农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际，彻底批判了这些右倾谬论，充分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指出，没有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富农的盘剥，摆脱贫困和落后。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他针对那种认为小农能吃苦耐劳、小农经济优越于大经济的小农经济“稳固论”说：“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②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它时刻受到破产的威胁、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③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8页。

^{②③}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7、133页。

斯大林指出，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使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会没有立足之点，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陷于失败。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大生产基础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说：“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①

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为了反对集体化，制造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可以沿着不同轨道和平的平行发展，小农经济会自流地随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而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阶级斗争也就愈来愈缓和，阶级敌人将会不经抵抗而让出一切阵地。富农经济也会通过合作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将很快完全熄灭。布哈林就曾在其《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这样宣扬道：“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

①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219页。

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对布哈林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列宁曾经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①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这一点上，而布哈林的理论却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末，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末，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

^①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的协调”^①。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就是社会改良主义者所宣传的阶级利益调和论。

布哈林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便采用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歪曲革命导师的话。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说过：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布哈林公然把这些话说成是容许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揭穿了他的欺骗手法，斯大林指出，列宁这一段话一句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而只是说也容许“耐普曼”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所谓“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基的。列宁的这段话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而布哈林的理论却是，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可见，布哈林的理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的。这个理论已成了“党内右倾的旗帜”，“机会主义的旗帜”，必须粉碎它。

从“阶级斗争熄灭论”出发，布哈林不是把城乡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归之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而是归之于“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因此，他在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9页。

《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说：“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按照他的逻辑，只要苏维埃机关改善了，阶级斗争就会熄灭。斯大林分析了当时存在于苏联城乡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本原因。他说：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①。因此，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而布哈林的理论却只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的斗志，便利资本主义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

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布哈林分子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十五大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①。“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②因此，他要求全党和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到底。

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虽然在党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并未完全肃清，产生这种理论的阶级根源并未消灭。因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平衡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平衡论”把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资本主义成分），说成是好象两个木桶，沿着不同的轨道平行地和平地向前挪动，一旦他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平衡论”的鼓吹者，幻想在发展大农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外，走第三条道路。

斯大林批判这种谬论说，两种经济后面存在着两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两种经济是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激烈较量的，决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②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页。

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①。“平衡论”表面上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的阵地，把富农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

“自流论”同样是布哈林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既然自发地跟着城市走，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要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和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私有制经济，因此，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小私有经济和城市的社会主义企业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农村决不会自发地跟着城市走，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②“自流论”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是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开路的理论。

斯大林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对粉碎机会主义的进攻、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都起了重大作用。

^①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能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苏修叛徒集团以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其反革命的理论基础，抹煞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在我国，长期以来刘少奇叛徒集团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刘少奇一类骗子早在1959年就鼓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彻底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乃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被击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胜利

联共（布）党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布哈林分子日益孤立，于是他们就更多地采用两面派手法进行活动。从1928年7月到11月，布哈林曾经两次声明他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分歧，但事实上就在这时，布哈林等人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阴谋同托派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成员，改变党的路线。7月以后，布哈林公然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攻击党的政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拿辞职来要挟中央，中央斥责了这种怠工主义的辞职政策。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发表演说，揭露了布哈林所谓不存在分歧的虚伪声明，指出了分歧的实质。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①联共（布）中央11月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宣传右派机会主义者观点的行为与党员资格不能相容，并决定把右派投降主义者的首领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右倾反对派参加者提出了严重警告。

处于不利形势下的机会主义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实行暂时退却，并呈递承认错误的声明书。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仍在暗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在1930年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了。

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联共（布）加强了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党对农民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广泛地发展了各种合作社，包括把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联合起来组成共同劳动的共耕社，通过已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使农民根据切身体验相信集体经济比个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体经济优越，对富农进行坚决斗争，割断了富农对劳动农民的影响，从财政上支持农庄，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为供给农庄机器准备了条件。由于作了这些准备工作，因此，1929年，在苏联出现了群众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广大农民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整村、整乡、甚至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高潮中，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这个事实表明，实行全盘集体化和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0年1月，联共（布）党中央通过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决议规定了由限制富农剥削转为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1929年以前对富农限制其土地使用权和对雇工的剥削，征收高额税，责令富农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1929年秋季，在农业集体化高潮中，广大劳动农民要求把全部土地交给集体农庄，并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苏维埃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迅速成长，也为剥夺富农阶级奠定了物质基础。于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消灭富农（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的剥削，政府允许农民没收富农所有的耕畜、土地、农具并转交集体农庄）。决议还规定了当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坚持自愿原则，反对从上面用发号施令的办法领导这个运动。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30年2月已有50%的农户参加集体农庄。

由于集体化运动迅猛发展，一些工作人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要中农加入农庄，在好几个区

里，用剥夺农民财产、递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自愿原则；有的地方错误地提出“一切公共化”的口号，要求农民的生活资料如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也实行公有化。为了追求集体农庄发展的数字，在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要求马上完成集体化。

富农分子趁机利用了这种情况，挑拨性的提出组织公社来代替农业劳动组合，立刻把住房、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共化；同时，又煽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宰杀牲畜，企图引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满。个别地方，由于富农及其走狗的煽动竟然出现了反苏维埃的活动。

联共（布）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一违反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1930年3月公布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指出了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集体化运动中贯彻自愿原则的重要性。斯大林指出：

“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①同时，斯大林还强调，在当时，苏联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这种形式只是基本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它是当时广大农民易于了解并能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形式。此外还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帮助党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给阶级敌人

^①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9页。

以沉重打击。随着党的政策的贯彻，为集体化运动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剥夺了苏联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的生产资料，使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劳动农民，脱离了个体经济，走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为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前途。

到1932年底，苏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拥有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到1934年，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发展较快，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在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上还存在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劳动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劳动收入分配得不合理。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在新形势下变换了手法，钻入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因此，如何使新生的集体农庄巩固起来是当时的迫切任务。

加强党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是巩固集体农庄的根本保证。1933年1月党中央决定在农业机器站成立政治部，并派遣了17000名优秀党员担任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帮助集体农庄清除了暗藏的富农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整顿了劳动纪律，提高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对农民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并培养了许多新的农庄干部。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严厉地打击和制裁了富农分子及其它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33年至1934年间，斯大林同志对如何巩固集体农庄这

一重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他指出：富农阶级被打倒了，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在集体化以后，他们采取了新的隐蔽的斗争方式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①。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要巩固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②

斯大林还提醒全党注意阶级敌人利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他说：“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③他提出要运用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来防止敌人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

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集体农庄在二、三年内逐渐巩固起来。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使千百万贫农上升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苏维埃政

^① 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5页。

^②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9页。

^③ 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1—202页。

权在农村中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三、共产国际及德、美等国共产党反对布哈林集团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24年到1928年间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表现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上，发生了英国的同盟大罢工、奥地利工人的武装斗争、中国的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的革命发动等。

同时，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秉承资本家的意旨，推行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政策，不断开除工会中的革命分子。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日益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结合起来，实行反苏反共镇压人民的政策。它们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因此，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增长了，党的内部团结加强了。

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共产国际纲领》，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为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奠定了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然而，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出现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他们反对“六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进行派别和分裂活动。

共产国际六大指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已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加深、相对稳定局面动摇、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增长的时期，各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可是布哈林在他提交给“六大”的提纲中却否认当时有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六大”以后，布哈林

又发表《有组织的经营不善论》一文（1929年6月30日《真理报》），进一步论证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趋于缓和的谬论，以此否定工人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趋势。同时，布哈林坚决反对联共（布）党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否认这一进攻乃是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布哈林还违背“六大”关于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积极支持德共党内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篡夺党的领导的阴谋。

于是，共产国际展开了反对布哈林右倾集团的斗争。在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上批判了布哈林的右倾错误，并且肯定联共（布）所通过的关于撤除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的决议的正确性，决定解除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此外，第十次全会还清算了以调和派面目出现的布哈林的支持者谢拉（意大利）、洪别尔-德罗（瑞士）等人的错误。他们反对“六大”关于资本主义稳定性正趋于动摇和瓦解的论断，说什么当前的斗争已经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时期，相反地，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时期”（洪别尔-德罗）。他们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事实。洪别尔-德罗在一次演说中把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说成是自发的，基本上只带有防御的性质。因此，他们主张党只应在现有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领导这一斗争。他们反对德国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要求改组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的政治局，以改变正确的领导。谢拉还竭力为布哈林的右倾观点辩护，说“富农的危险不是什么致命的危险”，他认为目前对富农还没有

一个真正科学的定义，因为“俄国大部分富农的收入，还不超过我国（指意大利）中农的收入。”

由于这些布哈林分子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第十次全会决定把他们跟布哈林一道开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和布哈林一起反对“六大”路线的还有德国的布兰德勒、捷克的伊列克、美国的洛夫斯顿、法国的薛列、瑞典的启尔明等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然而，这些集团先后都被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所粉碎。

在德国，以布兰德勒、塔尔海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肆意攻击“六大”的政治路线。他们反对“六大”关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已开始动摇的论断，鼓吹德国“经济上资本主义稳定基础的巩固，政治上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是犯了“超时代”的错误。他们主张不必经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必经过工农革命政府，而只要实现监督生产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

布兰德勒、塔尔海麦反党集团曾在1923年秋犯过严重的右倾错误，当时广大的党员群众要求开除他们的党籍。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争取教育他们，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意他们转入联共（布）。但是，布兰德勒等人并无悔改表现。1927年在爱森举行的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又暴露了机会主义观点，并对共产国际和德共中央的政策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期间，他们扩大了派别活动，攻击德共中央的整个路线，并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共产国际六大以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尤其是利用维托夫事件，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维托夫原是汉堡党组织书记，曾因滥用党内经费被开除

党籍。右倾机会主义者借此造谣中伤，硬说台尔曼与维托夫一起乱用了党费，德共中央大多数委员由于受了反党分子的蒙骗，没有调查清楚此事，即于1928年9月做出了解除台尔曼同志领导职务的错误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的支持。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追随者，德共中央候补委员加仑和豪森随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宗派活动，他们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民权报》、《逆流》，并把这些报和其他宗派活动的材料寄到全国各党组织。豪森还发表了一封致布勒斯劳区党组成员的公开信，在信中对德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进行恶毒攻击。加仑背着党组织把布兰德勒请到他负责的党组织发表宗派性的演说。事实证明，在德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宗派，它有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自己的政纲，自己的纪律，以及自己的报纸。他们的政纲是反对红色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德国党内建立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使党陷于分裂。他们的政纲越来越接近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们这一伙也越来越堕落成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客了。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与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因维托夫事件所造成的德共中央对台尔曼同志的错误决定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予以纠正。全国各地区的党组织对共产国际关于德国共产党内右翼危险致党的公开信进行了讨论，提高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危害的认识，并揭发出了一些隐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28年12月德共中央开除了布兰德勒、塔尔海麦等人的党籍，同时共产国际也决定开除他们。从此确立了以台尔曼

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捷共内部也经历了严重的斗争。早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前，捷共领导中的多数派——伊列克集团就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经济繁荣期间夸大资本主义稳定的稳固性和持久性，贬低工人阶级基本群众革命化的程度，和工会中的改良主义头子妥协，放弃从下面发动群众的工作，把党的组织工作缩小为行政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反对派起而反对伊列克集团。共产国际六大开会期间，布拉格党的积极分子送来了一个谴责伊列克集团的《布拉格备忘录》。但是，布拉格党的领导也搞了一个支持伊列克集团的《反备忘录》，送交“六大”，进行反扑。“六大”专门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小组讨论会，会上严厉批评了伊列克集团。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讨论的结论归纳起来，发出了一封告捷共党员的公开信。

“六大”后，捷共中央委员会于1928年9月28日至30日在布拉格举行了会议。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草案完全同意“六大”的结论和公开信，并明确指出，捷共目前的领导伊列克集团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并决定在党的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

在公开讨论中，哥特瓦尔德等宣传了共产国际“六大”的指示和《公开信》，并且揭露了伊列克集团实际上已变成取消派联盟。

伊列克的观点和布哈林的观点相近似。这时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集团的斗争的胜利也大大促进了捷共党内反对伊列克集团的斗争的胜利。

1929年2月18—23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捷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对捷克党内的争论作了总结，清算了伊列克集团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制定了新的革命路线。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是坚持正确革命路线的人，哥特瓦尔德任党的总书记。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捷共反对伊列克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捷共五大后，由于伊列克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于1929年6月被开除出党。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在美国共产党内进行了反对洛夫斯顿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洛夫斯顿是当时美国共产党的执行书记，曾出席过“六大”。“六大”以后，他激烈地反对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估计，他说“六大”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估计对美国不适用；美国的资本主义是正在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它已经不受一般资本主义规律的限制，在美国，阶级斗争尖锐化没有指望。这就是洛夫斯顿的“美国例外论”。洛夫斯顿这种机会主义谬论得到了布哈林和美共党内佩帕尔、沃尔夫等人的支持。当时洛夫斯顿是党内的多数派，气焰很嚣张。1929年3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共六大上，党内斗争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致使大会形成僵局，最后只好提交共产国际讨论决定。

共产国际尖锐地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就美国问题发言说：“现在许多人以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不会涉及到美国。这自然是不对的。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正加速地发展着，它也不能不涉及到美国资本主义。现在美国国内有三百

万失业工人，这就是说明危机在美国也正在成熟的第一个标志。美国与英国之间对抗关系的尖锐化，争夺市场与原料的斗争，最后，军备的大量扩充，这就是预示我们，危机正在迫近的第二标志。”①

洛夫斯顿等人拒绝共产国际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就策划分裂美国共产党的罪恶活动。美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洛夫斯顿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29年6月把洛夫斯顿集团约200人开除党籍。

共产国际及各国党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充分证明了列宁的论断：“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②因此，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才能战胜内部的敌人，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

四、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卖国贼、杀人匪帮的 被消灭。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成就及其世界意义

苏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胜利地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进攻以后，苏联建设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1933年初，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九个月完成了。

① 斯大林：《论美国共产党党内的右派分子》，1930年俄文版，第16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页。

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都已获得决定意义的胜利，党的总路线已达到全面胜利。十七次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已占全国工业99%。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已占全国全部播种面积90%。贸易方面资本主义成分已被全部排挤出商业范围。由于集体农庄巩固发展，农业经济高涨，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废除食品配给制，而规定一切食品都可自由购买。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的敌人则更加仇恨。联共（布）党内被击败的阶级敌人，在人民的胜利面前更加疯狂了，但慑于人民力量的强大，他们又不得不更变本加厉地玩弄两面派手法。

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被开除党籍的反列宁主义分子曾经呈递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申明书，并请求恢复党籍。为了考查这些人呈递申明书的诚意，联共（布）提出了如下几条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公开指斥托洛茨基主义为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苏维埃的思想体系；

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无条件地服从党及其各个机关的决议；

要经过一个考察期限，使党能对这些递申明书者实行考察，然后根据考察结果按个别原则来提出恢复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问题。

大多数托季联盟的分子都表示了悔改并在报上公布了申明书。联共（布）党为了挽救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可

是，后来他们的表现证明，这是他们使用孙行者钻进肚皮的战术，他们写声明书完全是为了再度钻进党内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党的骗人伎俩。他们戴上一副忠诚于党的假面具，而暗中却在各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炸毁矿井，放火焚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中进行暗害勾当。他们是些政治上的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斯大林指出：“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开始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然而，决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看作单只是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伙毫无宗旨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方面的信任，于是就采用欺骗的方法，采用蜥蜴变色的方法，采用拐骗的方法——随便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来企图重新博得信任，只求为自己保持着政治活动家的资格。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甘愿依靠随便什么人，甚至依靠盗匪分子，甚至依靠社会败类，甚至依靠人民死敌，以便在‘适当时机’来重新爬上政治舞台，来骑在人民颈上充当人民底统治者。”①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了悔过的演说，并虚伪地颂扬党所取得的成就；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了言，一方面责骂自己，一方面颂扬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他们用尽各种形容词来颂扬党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暗杀联共（布）党列宁格勒党组织负责人基洛夫同志。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同志被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织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出版局版，第358页。

的反革命秘密恐怖团体杀害了。从对就地捕获的凶手的预审中得知，1933年至1934年间，从前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专干暗杀联共（布）党的领导人的勾当。首先是企图暗杀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很快又查明还有另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等人都是这些暗杀团体的后台，布哈林与他们都有勾结。然而这些无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却公然在基洛夫死后写了颂扬死者的祭文，还要求把祭文公开发表。

一年以后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的直接指使者和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就是执行的托洛茨基的指令。这个集团已经卖身给德日法西斯，从法西斯的侦探机关领取金钱，从而堕落成为间谍、卖国贼、杀人犯匪帮。

托洛茨基曾同德国法西斯国社党代表格斯订立密约，根据这个密约托洛茨基匪帮必须在法西斯侵略者向苏联开战以前与开战时进行破坏苏联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破坏活动。法西斯则允诺援助和支持托洛茨基取得政权，但必须以割让苏联领土乌克兰、并将各种企业交还资本家、解散集体农庄以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交换条件。托洛茨基又与日本订立了相同的“协定”，允许除苏联库页岛北部外，还将滨海省与黑龙江沿岸一带领土全部割让给日本。

为此，托匪在苏联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如在国防工业及铁路运输方面破坏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烧毁或炸毁工厂，制造翻车事件与破坏车头车厢与轨道。为了配合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他们还准备烧毁军队仓库及军队食品

站，制造兵车翻车事件，在红军兵车中、食品站及卫生处，散布传染病细菌以及收集情报等等。

联共（布）及时破获了托匪组织，对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进行了审判，并先后处以极刑。托洛茨基则早已被驱逐苏联国境（1940年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这伙杀人犯、卖国贼都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联共（布）总结了反托、布集团的教训，提出了加强政治警惕性的办法。党中央在其为基洛夫被刺事件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信上指示说：

“必须铲除从一种错误想法出发的机会主义淡漠疏忽态度，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我们的力量愈增长，敌人也就会变成愈驯服，愈良善。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种想法是右倾思想底残余，因为右倾分子硬说敌人将会无声无响地渐渐爬进社会主义社会，硬说敌人终究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应持淡漠疏忽态度，而应提起警觉精神，提起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觉精神。必须记着，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也就愈乐于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最后挣扎手段。应该记着这一点，并保持着警觉精神。”

“必须把党员中教授党史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研究我们党史中所有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路线的斗争手段，研究他们的策略，同时要特别努力研究我们党同一切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研究那些保证我们党克服并彻底打破了这些反党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应该时刻记着，通晓和了解我党历史是为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觉精神所

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①

联共（布）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意义。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是尖锐复杂的。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党内就会出现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甚至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他们代表被打倒的阶级，隔几年就要跳出来一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这些反动分子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他们之所以要信奉和鼓吹唯心论，是因为他们是极其腐朽的反动派，只有唯心论才能欺骗别人和他们自己，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人民的力量，因而必然灭亡；他们的共同手法是耍两面派，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用歪曲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用歌颂领袖来掩盖阴谋诡计，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反马列主义的本质，用拥护社会主义之名来行反社会主义之实。因此，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很好地研究他们的策略，才能战而胜之。

托派匪帮的消灭使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快。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时在苏联形成的波澜壮阔的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出版社版，第401—402页。

斯达哈诺夫运动就是这一伟大积极性创造性的体现。广大劳动群众在先进工作者斯达哈诺夫的发起下，迅速形成了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这种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的热潮，推动了苏联工农业的发展。1937年4月1日，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总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120%，成为工业强国。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到1937年已有93%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多。实行了普及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增加到2,800万人，大学生有55万人。在科学、艺术、民族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使苏维埃国家拥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对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胜利具有极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榜样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比如，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经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实行自力更生、厉行节约的方针的经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国际团结，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经验等。

第三节 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同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党领 导地位的确立

一、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的开辟。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毛主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等著作所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光辉思想及其伟大意义

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激烈地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反复较量的时候，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托洛茨基乘机对共产国际进行攻击，无耻地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一向主张，“在中国，从1911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化学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他别有用心地歪曲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说：“落后的中国”没有可能“在自己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

党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理论，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在全国建立了新军阀的反革命军事专政，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中国依然处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从正反两方面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在象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何才能正确地开展武装斗争呢？中国革命究竟应该通过怎样一条道路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呢？这是摆在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这个新课题只有毛主席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毛主席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

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率领了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部队三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起义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鲜明旗帜。但是，这次起义仍然是采取城市中心、依赖外援的路线，因而遭致了失败。

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局，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

9月8日，毛主席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19日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集合了起义部队，决定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时，毛主席领导起义部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10间这支部队进入井冈

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军也到达了井冈山，在毛主席领导下组成了红军第四军。

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进军，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相结合的典范，这是全党最有计划、最有秩序和最少损失的退却。这同时也是新的进攻，是向反革命力量较弱、矛盾较多、革命基础较深厚的农村进攻。井冈山进军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但是，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不是平安地发展起来的。为了使全党认识并接受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毛主席在党内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与国际上托派相勾结，在托洛茨基的操纵下，鼓吹取消主义，变成了“托陈取消派”。他们把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建立说成是“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之残余”，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取得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等待将来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组织上，陈独秀、彭述之组织反党小集团，攻击党，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攻击游击战争是所谓“流寇运动”，竭力反对武装斗争，妄图取消革命。党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9年11月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但他们仍然死不悔改，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最后和世界上其他托派分子一样，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八七”会议后，窃据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职务的瞿秋白，利用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慨而产生的“左”倾情绪，推行一条“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通过1927年11月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使这条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左”倾机会主义当时成为党内主要危险。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性的革命”。他否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过分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幻想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因而他们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冒险主义的同时，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甚至滥用职权，撤销了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但由于毛主席及其他同志的正确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4月即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瞿秋白由于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1935年2月，当他被国民党逮捕后，写了《多余的话》变节自首，叛变革命。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布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指出了国内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因而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次

大会还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方针。这都是“六大”的主要功绩。但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党在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及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正确认识。这就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

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把某种只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夺取政权赢得胜利的方法绝对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起义，拒绝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拒绝积蓄力量的艰苦工作。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内部以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代表的右倾悲观论者，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被敌人一时的表面强大吓破了胆，把时局说得一团漆黑，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他们从悲观主义的估计形势出发，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实质上就是流寇主义、逃跑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由扩大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正确路线，而主张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错误路线。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流寇主义思想，是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如果依了他们的主张，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不能创造真正的人民军队，其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挫折和失败，断送中国革命。“左”倾教条主义与流寇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其实质都是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反对进行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红色政权究竟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不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毛主席在1928年到1930年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毛主席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条件，阐明了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客观规律。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这种不平衡更突出地表现在“地方农业经济”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上面。因此，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依然在封建制度的惨重的剥削之下。农民问题、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这就是建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割据，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加以“地方的农业经济”对城市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这就为坚持长期的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农村根据地有可能不依赖城市，而长期地独立存在下来。同时，广大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革命就可能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在敌人力量较弱的地区中、在乡村中首先胜利，而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这种情况与城市相比就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因为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易于集中和统治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在那里革命力量是不易发展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农村

革命斗争的支持，就不能够获得胜利。所以，毛主席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上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而且又是一个政治上极不统一的国家。它又是与经济上的不平衡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着的。因为在中国，是“地方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就形成了以地方经济为依据的许多地方势力和大小不同的无数军阀。这些军阀分别与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结合，成为各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间接统治中国、实行“分裂剥削政策”的重要工具。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形成相互矛盾，相互争夺，长期的分裂，长期的战争。白色统治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分裂，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革命力量可能充分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得到发展。只要“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①

除此以外，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有相当数量的足以支持红色政权的红军；以及党组织的有力量 and 政策的不错误等，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倘若这些条件不具备，红色政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了起来，也有被推翻的危险。

① 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9页。

党的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党的政策正确才能使红色政权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毛主席还具体规定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正确政策。这就是依靠群众，巩固阵地，利用矛盾，发展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①，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最后，毛主席充分估计了这条道路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他认为：放手发展红军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②，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③，“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④

^① 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51页。

^{②③④} 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5页。

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实践中的新结论，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新发展，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反对王明等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主席建立红色政权理论的指导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发展，土地革命也普遍地发动起来。但是这时，在党的面前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主要是，如何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真正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及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正确地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这是当时推动革命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主席都作了创造性的解决。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以后，党和红军中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因此反映出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纠正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在毛主席主持下，在福建西部的古田，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尖锐地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出了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办法，并号召全党为肃清这些错误思想而斗争。这个决议是我党我军进行建设的光辉历史文献。

毛主席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①，“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②毛主席一贯坚持军队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是党指挥枪，而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概括了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我军建设的根本。

毛主席还深刻阐明了思想教育对执行路线的重大意义。毛主席说：“红军第四军在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③。在这里毛主席指出了思想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正确路线能否贯彻执行，指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武装军队的重大意义。只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党的正确路线才能得到全面执行。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毛主席还指出，各种错误思想的产生，除了它的社会根源以外，“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为我党指出坚持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是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了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毛主席在建军过程中还亲自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和达到高度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重要保证。

^{①②} 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84页。

^③ 同上，第86页。

^④ 同上，第83页。

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总结了建党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是党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路线。它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建设，同样具有普遍意义。

为了胜利的进行土地革命，毛主席反对了根据地土地革命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1930年，毛主席根据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个阶级作了正确分析，总结了历年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

毛主席关于建党、建军问题的指示，关于土地革命路线的确立，为革命根据地建设，指出了正确方向，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扩大到13个军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10余省的300多个县份，建立了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左右江区等15个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的恢复。到1930年，在各大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由一年以前的98个增加到229个。

正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的时候，国内外的形势也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化。在国外，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内，1930年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军阀战争，从而削弱了反动势力对革命的压力。红军利用这个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在这种形势下，党内一些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自以为了不得。1930年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错误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立三路线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严重破坏，丧失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前后不到四个月。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蒙受损失，广大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主席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耐心纠正了红一和红三军团的“左”倾错误。这样，就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得到发展，并在1930年底到1931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0年9月，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立三路线。但在1931年1月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新“左”倾派别，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形成了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新的“左”倾路线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胡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王明抛出一个政治纲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不

顾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观地急于超过民主革命，这实质上是鼓吹托洛茨基的超阶段论，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忽视敌人内部的矛盾，“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问题上，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继续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在军事上反对毛主席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要求阵地战，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1931年11月召开的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上与1932年8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然对与他们坚决斗争的毛主席进行打击，夺了毛主席的权，排斥了毛主席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从1931年至1934年，毛主席在中央毫无发言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民族运动迅速高涨。如果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为核心，充分发动群众，联合全国抗日反蒋力量，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就能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但是，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差不多全部遭到破坏，临时中央也不得不迁入中央根据地。由于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使得红军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高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复兴被破坏了。

当党遭到“左”倾机会主义侵袭的时候，以罗章龙为首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公开拥护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革命的主张，坚决反对党进行革命斗争，反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诬蔑“六大”的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要求让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重新回到党的的领导机关，以便贯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并且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活动。党对罗章龙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1月以罗章龙为首的叛党分子被开除出党。右倾分裂主义遭到了彻底失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以100万兵力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福建发生了十九路军反蒋的事变，这对于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十分有利。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然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疯狂推行王明的军事路线，搞什么“短促突击”拚消耗，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广昌战役之后，敌人深入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王明路线越益遭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反对。在此情况下，刘少奇一类骗子，于1934年6月抛出了《论短促突击》一文，大肆吹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以挽救其破产，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

推行王明路线的结果，红军节节失利，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可走了。

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粉碎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粉碎第二次“围剿”只用了半个月；粉碎第三次“围剿”也只用了三个月。可是对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在王明路线统治下，搞了一年“短促突击”，使红军遭到重大失败，不得不退出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长征开始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遭到更大损失，当红军到达贵州的遵义时，只剩下30,000多人了。

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攻战争中的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开始觉悟。于是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1935年1月，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下，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在军事上，会议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分析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领导

上所犯的一系列的根本性质的错误，肯定了毛主席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组织上，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由于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从而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变，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由于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从而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彻底贯彻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和军事上能逐步达到高度的巩固和统一。在以后的中国革命长期发展过程中，尽管也出现过一些局部的错误，但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就及时地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使其没有发展成为全局的错误。

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中央在领导红军继续北上的进程中，进行了反对张国

焘逃跑主义路线的斗争。张国焘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革命形势完全做了悲观的估计。因而他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红军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向川康边境实行退却。他还从军阀主义和个人野心家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他的退却逃跑路线，来实现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张国焘的罪恶阴谋活动，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是由于毛主席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完全破产了。

对于张国焘事件的历史教训，毛主席曾作了深刻总结。毛主席指出，必须增强党的观念，“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①“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②毛主席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③。毛主席还指出，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成为叛徒、特务，这是一个大教训。

红军长征途中，毛主席还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夺权的阴谋，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①②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2、511页。

③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下，克服千难万险，达到胜利。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全体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分与中央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毛主席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①红军长征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无比的英雄气概。

四、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是革命政党和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1937年7月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统一战线的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党内一些人

^①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5—136页。

的头脑，王明之流从极“左”又跳到极右，因此又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种极为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下，急需全党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另一方面，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来，中国革命得到了蓬勃发展，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巩固。但是这并不是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完全解决，并不是说党内思想上已经不存在问题。这时，党内存在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的贯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就不能从根本上肃清。为了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了揭穿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以便在政治上与机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就必须在哲学战线上击败机会主义，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此，毛主席在1937年夏，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首先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毛主席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出发，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①“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②

①②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1、265页。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认识论的根源都是唯心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它们否认理论对实践、主观对客观的依赖关系，或表现为主观认识不能随客观事物变化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表现为主观认识超越客观过程一定发展阶段的冒险主义。它们从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一切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认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而不能不使革命遭到失败。

其次，毛主席还深刻地论证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提出了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毛主席指出认识发展的过程是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它解决物质转化为精神，存在转化为思想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在认真实践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方针、政策、计划的过程。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他们把自己封为“天才”，天生的“超人”，而把人民群众看成“群氓”、“愚昧”、“落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他们是瞧不起的。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自以为客观事物在他们的“天才”指挥下一切都会改变，他们的方针、政策、计划，不是从对客观实践进行周

①②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2、273页。

密的调查研究而来的，而是从书本上、从想当然出发来的，因此，他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大，只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把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它来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精神转化为物质，理想变为现实，检验和发展认识的问题。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既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又把理性认识绝对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应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而是将理论变成万应药方，到处搬用，从而使理论不能真正发挥指导革命实践的作用，理论也不可能获得发展。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事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崇拜自发性，这样就很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当，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只有不断地深入实践，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再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也才能使我们遵循正确的路线前进并抵制各种机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还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这就是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人们的认识是无穷尽的，只有不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方向前进，认识

^①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才能发展。“左”倾盲动，以及右倾保守都是违反了认识的规律的。

最后，毛主席还强调了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党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必要性。“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及它之所以在党内能有市场，就是由于大量参加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者、共产党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才能完成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

在《矛盾论》一书中，毛主席阐明和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一开始就指出，在哲学上存在着对世界发展问题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二者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事物矛盾的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乃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只有深刻掌握了这个规律，才能真正懂得唯物辩证法。毛主席曾用简洁而明确的语言，概括了这一规律的实质，即一分为二。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过程的始终，推动事物的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承认不承认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试金石，是区别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标志。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阐明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关于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矛盾普遍性或绝对性的两方面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同时，为了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毛主席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他把中国革命特别是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提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作出了新的贡献。毛主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②“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③，“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④毛主席这一分析，揭示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他们阉割了“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拒绝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具体事物作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而是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所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这样，他们总是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就是如此。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毛主席研究了中国革命矛盾的特殊性，才出色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还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所谓矛盾的同一性，即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

^{①②③④}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80、279、292、286页。

又互相转化。矛盾的斗争性，即矛盾双方始终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促进了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毛主席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完全违反这一法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承认同一性，在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中大搞“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因而成为投降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表现为关门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还提出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理论以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原理。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④因此，我们处理问题，要善于全力找出主要矛盾。在革命斗争中，只有抓住了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的阶级矛盾，才能明确打击方向和应该依靠、团结的社会力量，从而执行正确的路线。毛主席还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⑤这对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有极

①②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7、295页。

③④⑤ 同上，第297页。

重要的意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把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大搞折衷主义以蒙蔽群众，掩盖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混淆本质与现象以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这是他们主要的手法之一。我们看问题只有分清矛盾的主、次方面，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事物的本质，才不致于犯错误。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还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他说：“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的，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对抗与非对抗性矛盾依一定条件而互相转化这一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可能性。一些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以便于壮大自己，孤立主要敌人。

《矛盾论》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丰富了关于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可能和现实等辩证法诸范畴。

《实践论》、《矛盾论》是完整的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文献，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比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类丰富的先进文化遗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革命政党和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9页。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战争危机的迫近。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德、日法西斯上台，战争策源地形成

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下降了42%，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下降了53%，贸易额下降了66%，失业人口达到4,000—5,000万。这次危机首先打击了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其工业产品总额缩减了1/2左右，钢的熔铸量降低了76%，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工人的工资减少了1/2左右。危机波及日本，某些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达到其生产实力的一半，1930年到1931年间，输出额缩减了53%，输入额缩减了57%。由于危机对德国的袭击，德国工业产品1932年与1929年相比较

下降了48%，对外贸易减少了60%。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下降幅度也很大，英国降到86%，法国降到77%。危机也严重地袭击到远东出产原料的殖民地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

危机的出现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超帝国主义论”的全部虚伪性。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都空前尖锐化起来。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都爆发了工人运动。法国在1930年爆发了1,700次罢工。1930年3月6日美国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达125万人以上，在旧金山爆发了有35万工人的罢工。在危机年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发生了军队的斗争，如1931年9月英国海军在英维奈斯罢工，1931年9月智利海军举行自发的起义，1933年2月荷兰海军哗变。1931年爆发了西班牙革命。世界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往往采用欺骗和战争两种手法。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便施行了罗斯福的“新政”，所谓罗斯福的新政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重建动摇了的财政银行制度；2、以大量的贷款和津贴挽救资本家摇摇欲坠的企业；3、刺激私人资本的投资；4、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提高下跌的价格；5、通过减少耕地面积和毁坏谷物来克服农产品的生产过剩；6、通过设立公共事业来创造就业条件并刺激群众购买力；7、为陷于饥馑的失业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新政的实质是用欺骗的方法，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抑制工农运动来为垄断资本效劳。美国由于第一

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经济实力比德日等国雄厚，因此得以采用“新政”以逃脱危机。而德国、日本等国垄断资产阶级则乞灵于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专政，加紧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和对外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于是，日本和德国便在远东和中欧逐渐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

在日本，由于经济危机，失业者到1931年就达到300万。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在经济危机的三年里，罢工的次数增加了。1932年有10万人举行罢工。罢工者堵住了地下铁道的入口，敷设了铁丝网通上了高压电流，使警察无法潜入地下铁道。由于失业人数猛烈地增加，失业者要求免费发给储存的大米，免缴房租，实行失业保险（由企业主负担费用）。经济危机也引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农民烧毁了地主的庄园，痛打司法人员，甚至发展到武装反抗警察。1931年农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农村中农民与当局、地主的冲突1923年时曾发生了1,210多次，而1931年冲突事件就增加到3,320次左右。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工农运动的发展，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以反动的军阀集团“少壮军人派”为核心的军人独裁制度。在国内加强了法西斯恐怖，许多革命者和进步分子被关进监狱。仅1928至1932年间，日本就有三万多人以“危险思想”而被逮捕。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加速进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府以巨额投资发展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到1935年间就达到占工业产品总值的30,7%。与此同时，日本人民被施以军国主义教育，整个日本变成了一座兵营。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纵容政策的鼓励下，1931年日本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北，

1933年进占热河，并成立了伪满洲国。为了便于侵略，日本在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①，加紧扩大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并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祟，就在远东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德国，由于担负了巨额的赔款和大量外债，危机就更加尖锐了。1932年危机达到了顶峰，工业与1913年相比，减少了40.6%，钢产量减少了69%，铁减少了70%，汽车生产从1929年的114,700辆，下降48,000辆。在危机年代，德国的对外贸易减少了60%。持续的经济危机引起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到1932年年底，失业人口达到700万人以上，占全国工人的43.8%。失业者和其家属，组成了1,500—2,000万人的一支饥饿大军，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还有达100万的半失业者和140万生活没有保障的手工业者，由于物价飞涨和捐税提高，处于饥饿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930年10月，13万柏林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全部冶金工人，包括童工和女工都卷入了罢工，1931年1月爆发了30万鲁尔矿工大罢工，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也加入了斗争。由于德国共产党积极地站在群众斗争的前列，德共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增涨，1932年11月初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共产党人的选票增加了60多

^①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19年4月28日成立的，有44个国家参加。国际联盟形式是作为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机构而创立的，但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奴役世界的工具。它规定了对侵略国采取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等原则，但无具体办法，等于一纸空文。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万张。这一年内，共产党员的数目由 245,000 人增加到 36 万人。1930 年 8 月和 1931 年 5 月德共发表的两个纲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土地纲领”对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严重动摇了垄断资本的统治，1930 年到 1933 年间更换了四届内阁。工人阶级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德国垄断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统治，决定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希特勒这个法西斯的头目便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

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慕尼黑参加德军，战后做间谍工作，他所在的间谍小组后来成为德国纳粹党的核心。1923 年希特勒曾率党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举行暴动，企图夺取政权遭到失败。这时他写了臭名远扬的《我的奋斗》作为纳粹党的理论基础，肆意宣扬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思想。他叫嚣：“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有全世界。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我们就应当首先排除和歼灭斯拉夫人——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作。”“为争取生存的空间向东方进攻”。他利用反动血统论来毒害人民，宣扬大日耳曼人（即德国人）是“优等”民族，是天生的“领袖”、“超人”，注定要统治全世界，以此动员舆论，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希特勒还无耻地宣称：“人生下来就是坏的，只能用暴力管理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他们。如果政策需要，就应当撒谎、出卖以至屠杀”。他叫嚷“我要把人从所谓良心这个屈辱人的怪物下解放出来。良心也象教育一样，是摧毁人的。我的优点是：我不受任何理论上或道

德上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希特勒在疯狂宣扬其反动理论的同时，又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欺骗群众，他把他的纳粹党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提出“消除失业”，“取消金奴役”等口号以骗取落后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希特勒所宣扬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代表了当时德国垄断资本对内摆脱危机、巩固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1933年1月，德国垄断资本巨头聚集在科伦附近银行家什列迭尔的别墅里计议，决定立即扶植希特勒上台。希特勒提出了法西斯纲领，其内容包括镇压工人阶级，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同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秉承垄断资本家的旨意，命令史莱彻将军辞职而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于是在德国就建立了公开恐怖的法西斯专政。

关于法西斯在德国取得政权的原因，斯大林曾指出：“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做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①

希特勒一上台，立即炮制了“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8日夜，法西斯头子戈林密令其匪徒烧毁了柏林国会大厦，并大造舆论反而诬指是共产党干的，借以制造镇压工人运动的口实。与此同时，法西斯匪徒冲进了工人区，逮捕了

^①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261页。

数千名工人，成千的德国工人的优秀代表被枪杀，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台尔曼同志也被捕入狱（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在狱中被法西斯匪徒所杀害）。当时正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同志也被诬告为国会纵火犯而被捕。季米特洛夫（1882—1949）生于保加利亚一个革命工人的家庭，是个排字工人，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杰出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莱比锡法庭上，变被告为原告，在全世界面前出色地揭露了法西斯罪行，宣传了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法西斯法庭面前的不无畏的英勇行动，极大地舞鼓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宣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刑或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一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①由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坚决斗争，法庭被迫宣告季米特洛夫同志无罪。

法西斯分子在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宣布共产党非法的同时，又禁止了其他党派的活动，杀害了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反政府人士，如史莱彻将军、天主教党的某些领导人等，并依靠军事力量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独裁体制。为了发动新战争，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下，希特勒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活动，以数十亿马克发展军事工业，将一切企业都转上军事轨道。法西斯德国于1933年10月退出裁军会议，随后又退出了国际联盟；1935年3月恢复义务兵役法，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取消了限制建立空军的规定。希特勒还在全国拚

^① 季米特洛夫，《控诉法西斯》，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48页。

命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煽动反犹太主义，鼓吹德国人由于“生存空间”不够，必须“用剑刃来赢得土地”。1936年3月，纳粹政府声明停止实施凡尔赛条约，并进兵莱茵区（为不设防地区）。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作祟，就在欧洲的中部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世界大战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

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右派社会党和托派第四国际成为法西斯的帮凶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的上台和疯狂扩军备战，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战争危机的迫近，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加强，使国际局势面临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共产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了决议。

季米特洛夫针对当时对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各种混乱看法，充分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实质。他指出：“掌握政权的法西斯主义，乃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侵略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家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①“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急先锋，是挑拨帝国主义战争的祸首，是发动各国帝国主义者来向全世界劳动者伟大祖国苏联进攻的罪魁。”^②

^{①②}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75页。

季米特洛夫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民主党人所谓法西斯主义是“暴动起来夺取了国家机器的小资产阶级”政权、是“超阶级的政权”、是“中产阶级革命”等等谬论。这一切都是贩运法西斯宣传机器为了欺骗群众所制造的反革命谬论而已。法西斯政权，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政权曾经制造了大量的舆论，提出了大量蛊惑人心的口号来混淆视听，掩盖他们的本质。季米特洛夫具体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欺骗伎俩。法西斯主义者明明是残酷地剥削群众的，他们却假装拥护群众的迫切要求和需要；明明是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却假装成反侵略的民族主义者，利用群众的爱国雪耻心理来欺骗群众；明明是放纵贪官污吏任意蹂躏人民，却假装要求“廉洁政府”；明明是代表的垄断资本家利益，却假装反对财政资本家，提出什么“公益高出私利”的口号；明明是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冒充“全民”的代表来反对资产阶级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所以，季米特洛夫总结道：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就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底死敌”①。

季米特洛夫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所作的科学分析，澄清了工人运动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混乱看法，有利于动员群众起来去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季米特洛夫还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及共产党应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79—80页。

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法西斯之所以取得暂时胜利，首先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取得政权的道路。同时，由于无产阶级没有与农民结成联盟，广大农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农村政策感到失望，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又没有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因而农民误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欺骗，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国社党”。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还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在青年中间进行必要的工作，广大青年受了法西斯的欺骗宣传，以为只要法西斯胜利了，他们就会有美妙前途。最后，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还由于党本身存在轻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机会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因此，季米特洛夫指出：防止法西斯上台是完全可能的，这全靠我们自己，——全靠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要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第一，就要靠工人阶级本身的战斗积极性，要靠他们把自己力量团结成为反对资本进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的战斗军队”，“第二，就要有强大的革命政党正确领导劳动群众去作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第三，就要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第四，就要革命无产阶级富有警觉性和及时行动”①。

季米特洛夫指出：“资产阶级底法西斯专政，是残暴的，但同时却又是稳固的政权”②。因为法西斯的政治垄断必然引起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甚至使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加剧。法西斯的言行不一，使它的反动面目在群众中日益暴

①②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91、92页。

露。法西斯的基础日益动摇和缩小。作为法西斯的支持者和纵容者的各国社会党内部也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继续维持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部分开始转到革命的阶级斗争方面来，主张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切都将要造成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瓦解。

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了战争危机的迫近，指出：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并努力使德国帝国主义成为欧洲的盟主。他们正在组织一次战争以向法国报仇，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奥地利。他们想破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把这些国家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并想把乌克兰从苏联夺去。他们的目的是发动世界大战以重新瓜分世界。

大会认为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列宁曾经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次战争或任何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世界人民一致行动，是有力量制止战争的，全世界共产党都应以一切力量来制止战争的爆发。

大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内的人民阵线问题，这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季米特洛夫指出：为了要阻止法西斯上台执政，或者推翻已经建立的法西斯政权，第一件应当做的事，就是：“在每个企业里，在每个区域里，在每个省份里，在每个国家里，在全世界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实行工人行动统一。”^①同时，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就必须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为使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97页。

无产阶级底整个斗争得到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劳动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成立战斗的联盟。因为，甚至就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也占人口底大多数。”①

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基础，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本身的行动统一，就决不能真正实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指出：“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行动统一，这就是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使工人不仅有能力去作顺利的防御，而且有能力去顺利地反攻法西斯主义，反攻阶级敌人”②。因此，这种统一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统一，更不是无原则的融合，行动统一的目标必须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战争危险，反对阶级敌人。这样就要求各种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政党、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等等建立联系，订立短期或长期的斗争协定，共同反对阶级敌人。同时，在广大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共产党人必须进行工作，建立党外的阶级的机关，这是扩大并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方式。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中的工人也必须建立联系，对他们也要进行工作。

为了要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有决定意义的“就是革命无产阶级坚决起来拥护这些阶层底要求，特别是劳动农民底要求，这些要求是与无产阶级底根本利益相符的，在斗争过程中把工人阶级底要求与这些要求配合起来”③。因此，正确对待那些有一大部分劳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参加的组织和政党，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政党和组织，

①②③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05、97、106—107页。

大多数处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社会成份很复杂，领导权掌握在大资本家走狗的手中。但是，“应该分别对待这个组织”①，“我们的策略都应当把这些政党和组织里的小农及手工业者等等吸收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来”。②

季米特洛夫强调指出：在解决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时候，不能对于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给一个万应的药方，而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制订出适合于本国情况的具体形式。所以，“对于一切国家都采用同样的药方，就等于愚昧无知”。③

季米特洛夫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特色，保持批判同盟者的权利，决不能在广泛的统一行动中丧失立场。党要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壮大自身的力量。任何企图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调和起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季米特洛夫尖锐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指出与右倾机会主义继续作斗争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根本铲除我们队伍中的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首先就阻塞住我们接近群众的道路，妨碍我们进行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群众政策”④。季米特洛夫当即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声明道：“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决意与第二国际及其支部谈判共同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问题，以便共同进行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⑤

①②③④⑤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06—107、107、173、161、159页。

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他要求共产党人应毫不调和地反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不应当做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批判了那些不把目前的斗争与该民族过去的革命传统联系起来的现象。同时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和一切劳动者，是各国共产党基本任务之一”。①

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统一，它所制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对各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帝国主义战争一向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主要方面之一。早在1932年共产国际在其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就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以后又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由于右派社会党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政策而不断遭到破坏。他们的口号是，主要的敌人是在左方，把矛头对准共产国际，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意大利是第一个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国家。由于右派社会党执行叛卖政策，为法西斯上台扫清了道路。

1920年意大利城乡工农群众掀起了革命斗争。许多城市工人占领了企业，许多地区农民占领了整片的农业地区。工人组织了赤卫队，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占据了热那亚港口。社会党的领袖们眼看这个斗争将要演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46页。

便急忙出面诱骗工人以所谓“工人监督”的名义复工。当时社会党的工贼们还要求工人不要触怒了法西斯分子，禁止工人与法西斯作斗争。工人满心希望通过“工人监督”会成为工厂的主人，然而企业主在收回工厂以后不久，就展开了向工人阶级的进攻，致使革命转入低潮。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扼杀了工农的革命斗争以后便积极扶植法西斯组织，把它们武装起来，派军官训练他们。法西斯分子开始有计划地袭击工人俱乐部和社会党的俱乐部，并组织了法西斯工会，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组织的领导者。工人阶级起而反击，自发地组织起“黑色百人团”式的反法西斯组织。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但是，工人阶级被社会党领袖出卖了。1921年间，以屠拉梯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和法西斯匪徒签订了“绥靖公约”，给了法西斯组织更大的行动自由，却限制了工人的反法西斯斗争。在这个“公约”的掩护下，法西斯分子的恐怖活动扩大到了全国。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公开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不久就宣布解散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而社会党的领袖却在法西斯政权宣布解散“全国总工会”以前就自动解散了其控制下的工人组织。就这样，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法西斯斗争被葬送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得到了巩固。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奉行贩卖性政策。1928年，德国工人革命运动高涨，在资产阶级政府里担任警察局长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方面给予法西斯军事组织如“钢盔队”、“冲锋队”以充分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工人的“五一”节示威游行进行血腥镇压，并查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刊物。在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纵容和支持下，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1932年兴

登堡任期已满，反动派提出了兴登堡和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建议联合提出候选人以便打败反动派的候选人，但遭到拒绝。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取小害”“避大害”的“较小祸害论”，竟认为兴登堡是“较小的恶魔”而投了他的票。当时共产党严正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点，兴登堡恰恰是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方便工具。当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时，德共中央曾三次向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建议共同行动以总罢工来抗议希特勒执政，但他们不仅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他们的工会首领还向希特勒呈递宣言书说：“工会不应妄想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在这方面，工会的任务只能够是，传达工人对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措施上的正义的愿望，以及用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来为政府及国会尽忠效劳。”柏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1933年2月2日这样无耻地宣称：“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的话”，象希特勒这样一个普通人是从来也不可能成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尔士，为了抗议外国谴责纳粹暴行，而辞去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的职务。一个工会的头目甚至把希特勒上台当作“1918年革命的继续”，并号召工人参加希特勒的五一节庆祝。由于社会民主党实行叛卖政策的结果，德国法西斯便在全国畅行无阻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所以斯大林说：“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在这方面帮了法西斯党不少的忙，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妥协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①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4页。

1933年3月，奥地利发生了法西斯分子举行的政变。法西斯分子仿照希特勒的榜样，突然解散了国会并宣布用命令来进行统治，从而确立了法西斯“强力统治制度”。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六百万人口中拥有党员六十万人，控制着近九十万会员的职工会，并在国会中有一个很大的国会党团，只要进行坚决斗争，法西斯专政是可以制止的。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不仅不领导人民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还尽一切力量与之合作，直到法西斯政权宣布社会民主党非法为止。

在日本也是这样。右翼社会党一贯宣扬阶级合作，却把日共列为最大的敌人，在他们的纵容下，日本法西斯上了台，并挑起了侵略战争。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向社会民主党发出的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呼吁，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左翼社会党人的响应，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右翼社会党人不仅对共产党提出的这一建议置之不理，甚至竭力破坏人民阵线的建立，他们口头上也讲反对法西斯，实际上却帮助法西斯进行战争。

德国社会党首领斯坦弗在法西斯上台以后跑到纽约，公然主张与希特勒成立联盟，以便“所有的枪口可以转而对付苏联”。丹麦在被希特勒占领以后，以社会党首相史陶宁为首的联合内阁，执行与德国侵略者合作的政策，禁止共产党活动，使丹麦日益法西斯化。芬兰社会党则公开站在希特勒一方作战。

法国社会党首领在1937年借口整顿人民阵线来削弱人民阵线，同时却帮助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进行反动活动。

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洛茨基分子在法西斯威胁越益严重的形势下，不仅继续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而且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托洛茨基疯狂叫嚷：“眼看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社会爱国主义组织已经在人民阵线的标签下同资产阶级左翼实行合作，而人民阵线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企图象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使无产阶级受其支配那样再度使无产阶级就范的努力而已。”他还无耻地诬蔑：“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表明共产国际传统的最后残余已被完全抛弃”，并说共产国际已经“蜕化变质”。托洛茨基的诽谤宣传完全适应法西斯帝国主义的需要，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法西斯所不能起的作用。因此，法西斯政府便千方百计拉拢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为其效劳。

托洛茨基分子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以前就卖身给法西斯侦探机关，遵照法西斯侦探机关的旨命，混入人民阵线和工人运动内部，进行破坏工作。

苏联托派匪帮很早就与德国法西斯侦察机关勾结，在苏联作军事破坏工作、侦探工作、暗杀工作，叛卖祖国，成为法西斯的走狗。西班牙内战时期，托派分子钻入人民阵线内部，与法西斯里应外合颠覆共和国，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的第五纵队。

中国的托匪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即投靠日本侦探机关，“托匪中央”每月领取津贴三百元。托匪在日寇的操纵及托洛茨基本人“帮助日本”的指示下，大肆宣传日寇侵略东三省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此后，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个关键性时刻都疯狂进行破坏活动，提出

所谓“联日反蒋”、“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来掩护日寇进攻中国。他们叫嚷要进行内战，对共产党加以“围剿”，诬蔑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出卖阶级”，“没有诚意”，企图破坏统一战线。他们勾结反动政府的偵探用绑架手段对付罢工领袖以破坏工人运动。对抗日的共产党员和将领，他们则勾结日探加以逮捕枪毙或进行暗杀。因此，中国托派被日寇称为“暗探局的脑筋托拉斯”，他们是一群卖国贼，是日寇的走狗。

对于第二国际右翼社会党和托派分子的破坏分裂活动，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如此，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和战争进行过程中，各国党内还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西班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教训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工业、农业和财政都陷入紊乱状态。1931年，失业工人达五十万人，农民濒于破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许多地方爆发了共和党人与社会党人共同组织的武装起义。1931年4月12日君主制度被推翻，组成了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权在人民的压力下，颁布了宪法，实行了有限的一点民主改革，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给予加泰罗尼亚族以有限的自治权，宣布天主教与国家政权分离。但是，联合政府并未解决民主革命的根

本问题，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只略微降低了点地租，工人的问题和民族问题都没有解决，社会矛盾继续发展，工人和农民加强了斗争。1932年1月爆发了百万人的罢工，2月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人。在农村，则爆发了农民武装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并成立了农民和雇农委员会。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1933年，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组织“西班牙长枪党”，到处猖狂活动。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由于害怕群众运动的高涨，便极力纵容和包庇右派反动势力，因此，右派反动势力得以联合起来组成“西达党”（“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简称）。同年秋，各反动政党对选民采用欺骗和威胁恐怖手段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勒鲁斯的反动政府。在勒鲁斯政府支持下，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各地进行疯狂的挑衅活动。1934年10月，勒鲁斯政府公然邀请三名法西斯分子加入内阁，更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反击反动势力的进攻，一百万工人参加了总罢工，马德里等城市的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北部阿斯杜里亚矿区工人的起义是全国革命起义的中心，起义工人占领了主要城市奥维叶多的一部分，建立了苏维埃和赤卫队，没收了商店和仓库。政府动用了大批军队和飞机大炮，残酷镇压矿工的起义，由于强敌我弱，起义终于失败，被杀害的革命者三千人，被捕者三万。起义失败后，共产党重新转入地下。

西班牙共产党在秘密条件下领导建立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由于革命形势的到来，以及普通党员的压力，社会党的首领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统一行动的建议，1936年1月，人民阵线终于成立了。参加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有社会党、资

产阶级自由派的左翼和产党、少数民族（巴斯克族和加泰隆族）的各资产阶级民族党等等。人民阵线的纲领包括大赦政治犯，恢复民主权利，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消灭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减低农民捐税和地租，实现军队和国家机关民主化等。1935年末——1936年初，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2月16日举行了国会选举，人民阵线各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左翼共和党人阿森尼亚组织政府，并于不久被选为总统。共产党也已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

新政府在人民阵线的督促下，实现了一些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释放了政治犯，恢复了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利，解散了许多法西斯组织，把法西斯头目逮捕，分配给近十万农民以土地。但是，由于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并未掌握领导权，人民阵线的纲领未能完全实现，人民阵线在国会中虽然占多数，但法西斯反动势力仍然控制着军队、银行、企业以及大部分政府机构。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措施粉碎军队和国家机构中的反动势力，以稳固人民政权，完全现实人民阵线纲领的要求，但都未被采纳，而对此，共产党也未及时进行斗争。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疯狂反抗。1936年7月17日，以弗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驻摩洛哥的殖民军队中，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德、意法西斯不仅想摧毁西班牙共和国、建立法西斯的政权，而且想占据西班牙这个战略要地，因而大力支持叛乱。叛乱很快蔓延到西班牙本土各地驻军，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迎击，在马德里等地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于是，德、意

法西斯便于1936年8月开始了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他们派大量飞机、舰艇、甚至于军队，直接向西班牙共和国进攻。

由此，西班牙的内战已经越出了一国的范围，而具有国际民主、进步力量与法西斯侵略势力直接交锋的民族战争的性质。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直接打击了德、意法西斯侵略势力，体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世界人民支持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义务，因此世界各地都热烈展开了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的运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织成国际纵队（约三、四万人）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在抗击法西斯军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行动中充当了可耻的帮凶角色。根据法国总理——社会党人勃鲁姆的狡猾建议，英、法政府表面上提出“不干涉”西班牙内政的原则，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实际上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封锁，英、法联合舰队把持了西班牙海岸线，宣布对西班牙禁运军火。美国政府在1937年通过的所谓“中立法”补充法案，禁止西班牙政府在美购买武器。同时，法西斯叛乱者还得到了经由法西斯葡萄牙的领土运来的大批军用物资。

苏联坚决谴责了“不干涉”政策，给予西班牙共和国以相当的物资援助。

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法西斯分子多次想占领首都马德里，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而未得逞。叛军在德、意军队的援助下，于1937年逐渐加强了攻势。人民阵线内部的无政府主

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右翼共和党、右翼社会党人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也加强了破坏活动，他们制造分裂，反对建立正规军，拒绝统一作战指挥，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于5月一度发动了武装叛乱。1938年3月弗朗哥军队攻陷德鲁尔城，把共和国分割成两部分，因而共和国的军事和政治情势显著恶化。12月，德、意和弗朗哥集中了三十万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工业重地加泰罗尼亚的进攻。1939年1—2月间，共和国军总参谋部里的卖国贼，把共和国的重要据点巴塞罗那送给了敌人，整个加泰罗尼亚失陷。同时，英、法政府正式承认弗朗哥政权，并要求共和国政府无条件投降。3月，右翼社会党领袖贝斯泰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普利安诺·麦拉在马德里成立了所谓“全国防御委员会”，开始公开反叛共和国，他们发动政变夺取了马德里的政权。18日，所谓“全国防御委员会”就向法西斯头子弗朗哥呼吁“光荣和体面的和平”，从监狱里放出法西斯分子，让英国间谍把战斗的共产党员及爱国志士枪杀或交给弗朗哥，并为法西斯叛军进入马德里打开大门。因此，当时指挥进攻马德里的叛军首领吹嘘说：“我们四个纵队进攻马德里。我们的第五纵队就在首都等待我们”。（自此以后，“第五纵队”就成为帝国主义派遣到别国进行颠覆活动的特务专用名词。）在这样艰危的情况下，西班牙共产党仍然竭尽全力领导人民为保卫马德里而战斗，但是，由于叛军的巨大优势和共和国内部叛徒的出卖，马德里终于在3月陷落，弗朗哥在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政权。

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是由于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结果，是英法帝国主义执行虚伪的“不干涉”政策的结果，

也是右翼共和党人、右翼社会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叛卖的结果。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了人民阵线，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并坚持武装斗争，所以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坚持三年之久。西班牙共和国虽然失败了，但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1、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西班牙革命由于共产党没有树立人民阵线中的领导权，把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致使革命遭到失败。

2、在人民阵线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西班牙共产党对人民阵线内部的妥协分子，动摇分子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人民阵线不能巩固发展，一旦革命遭到困难，人民阵线就要破裂，这是西班牙共和国革命战争失败的又一原因。

3、对人民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揭露，坚决镇压和清洗。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坚决与人民阵线内反革命分子斗争，没有发动群众镇压和清洗反革命分子，隐患未除，因而反革命分子与叛军里应外合颠覆了共和国。

西班牙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牵制了希特勒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帮助了德、意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是西班牙人民反对反动势力和争取民主权利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西班牙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同财富。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产国际的反战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共产国际反对英、法、美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1936年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扼杀了西班牙的民主运动以后，法西斯国家加强了侵略活动，从而把世界拖入帝国主义大战的深渊。

对于法西斯的侵略，在国际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方针。苏联和世界人民实行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方针。英法美帝国主义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姑息养奸，纵虎为患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即“绥靖政策”其实质是借用法西斯力量镇压各国革命，并唆使法西斯国家进攻苏联以便使双方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们坐收渔人之利，趁机争霸世界。

在美英法反动政策的纵容下，德意日法西斯进一步勾结起来，并加紧实现扩大侵略的计划。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定协定结成军事同盟，形成了从柏林到罗马的法西斯轴心，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定了臭名远扬的“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于是就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即所谓“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法西斯侵略集团形成后，加紧扩大侵略，希特勒公开表示要侵占奥地利时，负有

保护奥独立责任的英法帝国主义，却以出卖奥作为鼓励德国进攻苏联的诱饵，声明在保障奥独立方面不负任何义务。1938年3月11日德军进占奥地利，奥地利就这样被英法帝国主义出卖了。受到鼓励的德帝国主义，在侵占奥地利以后，即将军队调到捷克边境，企图先占捷克的苏台德区然后再占领捷克全境。

共产国际对美英法的“绥靖政策”曾经这样揭露道：“意大利法西斯被允许大胆地进攻埃塞俄比亚。它不仅奴役了埃塞俄比亚，并且猛攻西班牙。德国法西斯被允许毫无阻碍地武装莱茵地区。它利用这点来袭击西班牙。然后它侵入奥地利并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海盗能够占领满洲和华北各省。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横霸，发动了奴役全中国的战争。西方民主强国在法西斯强盗面前一步步地撤退。法西斯强盗则一步步地加强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侵略行动，采取新的暴力行动，同时，利用所有这些来使他们自己的人民更加陷入困境。”^①为了制止法西斯的侵略，苏联建议美英法等国采取联合行动，但是，美英法等国根本就置之不理。美国总统罗斯福口头上说要“孤立这些侵略者”，但实际上却将大量的废铁运到日本去。

美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发展到顶点就演出了慕尼黑大叛卖的丑剧。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以后，法国作为捷克的盟国却不去反对法西斯侵略，相反，却和英国一

^① 《共产国际宣言》（1938年11月7日），转引自福斯特：
《三个国际的历史》第421页。

道，企图以牺牲捷克来换取希特勒进攻苏联。1938年五月英国政府向希特勒表示，德国的要求是正常的，愿意帮助德国满足要求，但必须通过在英国参加下达成国际协定的途径，并以德国进攻苏联作为条件。于是英法一起出马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并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它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美国则鼓动希特勒“修改”欧洲国界，同时派遣美驻德大使前往布拉格劝降。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激起了捷克人民极大愤怒，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和游行示威，高呼“我们不投降”的口号。苏联和世界人民坚决维护捷克的民族利益，苏联指出，只要捷克自己坚持抵抗法西斯侵略，并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请求，苏联准备给捷以军事援助。但是捷克统治者害怕本国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宁愿出卖民族利益，向希特勒投降。9月，举行了德、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竟在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将苏台德区和其他日耳曼人占多数的边境地区，自10月10日起10天之内移交给德国。慕尼黑协定使捷克丧失1/3以上的国土、1/2的经济资源，并为希特勒侵略中欧和东欧扫清了道路。

慕尼黑协定是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大叛卖，也是帝国主义挑动反苏战争的最无耻的交易。但是，资产阶级硬把它说成是维护了欧洲和平，硬说它建立了“我们时期的和平”。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也尾随于其主人之后，为了欺骗人民而欢呼慕尼黑协定。法国社会党的头目勃鲁姆听到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消息时，高兴得流泪，说什么：“现在我们又可以高枕无忧了”，表示完全支持慕尼黑的基本政策。只有一个社会党人在法国国会中同七十三

个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波兰与匈牙利社会党也立即表示欢迎布特勒这个侵略行动。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慕尼黑协定。共产国际在1938年11月7日发表宣言，谴责了慕尼黑的背叛。它指出叛卖的主要责任在于英、法帝国主义，世界工人运动如果统一行动，是可以击败法西斯侵略的。宣言说：“这种力量是能够防止慕尼黑协定的，会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犯罪行为成为不可能，并能将毫无约束的法西斯强盗赶回去。”宣言还指出：自从1933年以来共产国际曾向第二国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共有十次，都遭到拒绝，虽然如此，共产国际还再次建议第二国际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世界大会，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法西斯侵略。同时，各国共产党相继对慕尼黑协定提出了抗议。欧美11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揭露了慕尼黑协定的反动实质，号召世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共同敌人而斗争。社会主义的苏联，坚决谴责了慕尼黑叛卖协定。英国共产党议员在英国国会议员大多数都为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而欢呼的时候，毅然起来谴责这一协定，认为它“可耻”，“意味着战争”。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慕尼黑阴谋，毛主席指出：“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志。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①

^① 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43—544页。

毛主席的谈话有力地揭露了英、法“不干涉”政策及慕尼黑阴谋的叛卖性质。

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预见，慕尼黑协定不仅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反而大大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1939年3月，德国法西斯破坏协定，吞并了整个捷克，接着又武装干涉西班牙，并向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同时发出最后通牒，从立陶宛手里强夺了克来彼达港，迫使罗马尼亚附属于德国。不久法西斯匈牙利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从而变成了希特勒德国的附庸国。4月，意大利武装侵占阿尔巴尼亚。至此，法西斯德国的势力扩展到半个欧洲。

美英法帝国主义出卖了捷克以后，又积极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他们打着“调解”中日战争的旗号，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坚决斗争，东方慕尼黑阴谋遭到了破产。

英法帝国主义面对着德国法西斯的势力迅速扩大，迫于本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不得不公开表示响应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于1939年4月15日开始与苏联进行谈判。但同时，英国又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同德国进行了谈判。英法派赴莫斯科去与苏联谈判的，都是些没有实权的不重要的人物，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而它们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安全，为的是留下缺口，便于德国法西斯挥戈东进入侵苏联。总之，对苏谈判中，英法并不想真正达成协议。可是，在英国政府与德国法西斯秘密谈判中，英

竟向德建议缔结互不侵犯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并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给予波兰的保证而将波兰拱手交给希特勒去任意宰割。英还表示愿意在经济方面和殖民地方面向德让步，给德大量借款，以换取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最后，进行了四个月之久的苏、英、法谈判终于破裂了。

德国法西斯从英法的“不干涉”政策中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软弱可欺，同时也估计到苏联力量的强大，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决定以先进攻英法来着手发动重分世界的全面战争。所以，1939年8月德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当时充分估计到德国法西斯最终是会进攻苏联的，但是，当与英法的谈判破裂以后，为了打破美、英、法企图将法西斯进攻矛头引向苏联的阴谋，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反苏包围圈，推迟苏德战争的爆发，赢得时间进行战备，苏联政府接受了德国的建议，于8月23日在莫斯科与德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它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孤立苏联的企图，标志着英、法慕尼黑阴谋的破产，它是正确运用列宁策略原则的一个范例。列宁曾经说过：“……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

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①毛主席曾经科学地评价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②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从此在西欧爆发了全面的战争，通常把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希特勒进攻波兰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的，他早已把军队偷偷地聚集到波兰的边界。8月31日夜晩，法西斯强迫一些囚犯穿上波兰军装去进攻德国电台，然后以此为借口，于9月1日凌晨，动用大批军队向波兰发动“闪电战”。英法是波兰的盟国，在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9月3日对德宣战。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帝国主义仍然贼心不死，企图牺牲波兰以换取希特勒进攻苏联，因此，他们除了一些不关紧要的空战和海战外，实际上所进行的是一种只宣不战的“奇怪战争”。而在国内，英法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

② 毛主席：《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43页。

反动政府却大肆迫害共产党人，施行一系列反动措施。自称中立的美帝国主义也宣布了全国处于“局部紧急状态”，展开了对工人阶级各种权利的进攻，废除了禁止军火输出的条例，向日本等国输出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支持反动势力的罪恶活动。

希特勒军队在灭亡波兰之后，并未立即向苏联发动进攻，而是向西欧长驱直入。1940年4月初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初又开始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很快占领三国。然后法西斯军队直逼英吉利海峡，英法联军36万多人被围于敦刻尔克海滨，在遭到德军猛烈攻击之后，英法联军大败，英军撤回英伦三岛，只是靠了英吉利海峡，才免于全军覆没。敦刻尔克之役以后，法西斯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向法国入侵，打得倚仗“马奇诺防线”而毫无戒备的法国资产阶级，完全措手不及。6月，法西斯意大利宣布参加对法战争，法国处于南北夹攻之中。6月14日巴黎陷落，法国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比害怕法西斯更甚，不敢组织抵抗，急忙投降。新上任的总理、卖国贼贝当于6月22日向德签署了投降书，24日又向意大利签署了投降书，法国落入法西斯之手。

至此，英法资产阶级才发现他们所获得的并不是什么苏德战争，而是“一种错误的战争”。毛主席曾经针对他们的这种政策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①

① 毛主席：《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44页。

二、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于1939年10月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指出：“这次战争是多年来资本主义阵营中帝国主义倾轧的继续。”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争夺世界资源“这是这次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真正目的所在。在这次战争中，应受谴责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不能支持这个战争。”^①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斯大林早就指出：“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个反对英法美资本主义利益的战争，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受到损害。”^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的，也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曾出现过一时期的暂时均势。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发展，帝国主义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因分赃不均而爆发的矛盾，日益激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战败国，在美、英资本的扶植下，迅速恢复了元气，1938年其工业产量已超过英、法而仅次于美国，对欧洲的煤炭输出量

① 转引自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第402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页。

为第一位，对拉丁美洲的贸易中，已占拉美各国进口总额的第二位，并在巴西等国排挤了美国而居于第一位。德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涨，必然要求扩张殖民地和 市场，以便称霸欧洲和世界，这就引起它和英法的矛盾加剧。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是战胜国，但因分脏太少，力图在地中海建立“大罗马帝国”，因而必然与英、法、美的利益相抵触，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日本也是战胜国，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膨胀，它就想在中国和东南亚排挤美、英建立自己的霸权，因此在争夺亚洲霸权的斗争中，他们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

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美英法的“不干涉”反动政策也是这次大战终于发生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中分析了这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目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争夺对世界人民的统治权。”①毛主席还分析了战争第一阶段的两

① 毛主席，《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

个特点。一个特点表现在由于英法的“不干涉”政策，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打仗，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却“坐山观虎斗”，出现了战争的片面性情况。另一个特点是除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之外，还有民族解放战争，即阿尔巴尼亚的抗意战争，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德意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根据这两个特点，这一阶段的革命政策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同时还不放弃组织苏联与各民族国家之间制止侵略进一步发展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战争的第二阶段，即英法参战以后按照战争的性质来划分，“（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①根据上述的特点，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国，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个交战国内，如果有共产党议员的地方，都要对于战争预算投反对票，决不应该拥护战争，决不应该使自己的面目同社会民主党混同起来；在各中立国内，如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并图在战争中大发其洋财的那种政策。反对在这些国家

① 毛主席《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77页。

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的扩大，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国），或者反对宗主国（如在印度），用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要反对这些国家内的民族叛徒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才能发展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在各交战国的殖民地内，必须反对民族叛徒们拥护宗主国战争的叛卖行为，反对动员殖民地人民参加宗主国的战线。

毛主席所阐明的这条路线，最具体最深刻地表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策略，它是各国马列主义者所坚持的路线。

当德国法西斯分子疯狂挑起帝国主义大战时，德国共产党在国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战斗争。他们向群众揭露希特勒分子所发动的这次战争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工人阶级及德国人民提出了采取一切措施使希特勒遭到军事失败并消灭法西斯制度的任务。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前夕，在巴黎举行了意大利北部主要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在决议中提出了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具体措施。广大党员在法西斯意大利野蛮镇压下，坚持战斗，使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日本的共产党人在日本法西斯侵入中国以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了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党提出了在自己国家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结束战争、建立民主和平的口号。

被法西斯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组织起人民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员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为组织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而斗争，如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就是这样。

共产国际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因此决定解散。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发表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建议书》，提交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批准。在这个建议书中写道：“早在战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家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底深刻差别，他们的社会制度之各不相同的性质甚至矛盾，它们的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和速率之不同以及工人们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之各异，决定了每个个别国家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底不同。过去二十五年的事变的进程及共产国际积累的经验已经明确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所采用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是符合于新兴的工人运动的初期需要的，可是逐渐地已经不能适应工人运动的增长和各个国家内日益复杂化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组织形式甚至已经变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之阻碍。”“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者底学说底指导下，从来也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了的组织形式，他们永远是使工人运动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服从整个工人运动底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任务。”^①

^① 见1943年5月27日《解放日报》。

因此，共产国际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就决定象第一国际一样把它解散了。

共产国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所糟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它还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

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

斗力量更加提高。”^①

1943年6月10日，根据各国共产党支部的一致决定，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历史的发展表明，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完全正确的，它使各国的工人运动进一步得到蓬勃发展，各国共产党能够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历史情况来解决本国革命运动面前的任务。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尖锐化起来，右倾投降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和美国共产党内的白劳德都是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方针问题。

白劳德修正主义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埃尔·白劳德（1891—）早年参加社会党，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30年任美共行政书记，1932年在福斯特同志患病后窃取了总书记职务。在面临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共采取了支持罗斯福、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策，借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是，美共在白劳德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中却未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弃了对罗斯

^① 见1943年月27日《解放日报》。

福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批判，使美共一步步地日益屈服在罗斯福纲领之下。正如福斯特同志所指出的，白劳德“被罗斯福迷住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逐步暴露和发展起来。1934年美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白劳德就提出了“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口号，当即受到批判。但白劳德仍然坚持着他的反动观点，胡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扩张的不断延续的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大谈继承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资产阶级革命传统。1938年5月美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白劳德宣称：“杰斐逊原则的充分的和完全的运用，民主思想按照今天的情况的一贯应用，这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党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达到美国经济的共有共营，为全体利益服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党的工作和工会中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34—1937年间，他在产联中取消了党组。1936—1937年间他改组了党的组织，取消了小支部，改为大支部，实际上等于开群众大会，致使党的组织名存实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发表了德黑兰宣言，确认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以及战后，一致行动和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使白劳德似乎从中找到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依据。德黑兰宣言说：“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要共同工作。”这就使白劳德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明智”推崇备至，沿着叛徒的斜坡继续滑下去，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德黑兰会议后，1943年12月，他在美国桥港发表演说，宣称德黑兰宣言“是在我

们的时代使文明继续存在的唯一希望”。如果美国大财阀摩根也拥护这个宣言，那他就愿意与摩根握手言和。他又说，现在“阶级的营垒或政治的集团，已经毫无意义”。1944年4月他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这本书充分反映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此后，他在一系列论文、演说中全面地宣扬他的修正主义反动理论，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效犬马之劳。

首先，他根本否认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宣扬《德黑兰宣言》的发表，是“整个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转折点”，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信任和合作”的新时期。

他认为德黑兰宣言的发表，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他说：“大资本家属于‘世界上的明智人士，英国、美国和苏联的联合的道德力量’的范围，他们在为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在大资本的行列中是有着这种有眼光和有理解的人们的”，只要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学会欢迎他们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将要增加，他们的主动性和领导作用将要变得更加强大”。在他的语言中，“帝国主义”一词已经消失了。

他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但不是最成熟的。”

第二、他根本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大肆宣扬阶级合作，宣扬和平过渡。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说：“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

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

第三、他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宣扬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宣扬和平共处。他诡称苏美英三国达成的国际协议是国际上的“阶级合作”，“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民的最高利益”。他胡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找到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共存和合作的道路”，“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线可走”，不走德黑兰的道路就只有“鲁莽地盲目地冲到灾难的悬崖绝壁下面去”。

第四、他宣扬战争恐怖，以反对革命战争。他说新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

第五、他积极维护殖民制度，宣扬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能够“共存”的。他大谈只有美国才能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废除殖民制度，而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统一的国家制度”。他鼓吹美国必须“率先提出一个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共同计划”，以保证给美国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

第六、他攻击马列主义为教条主义，妄图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他叫嚣“老的公式和旧的成见根本不能在这个新世界中引导我们寻找道路”，“彻底清除我们身上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最后残余。”

白劳德在思想上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政治路线上就

是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他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提出了“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的口号。由于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就导致取消无产阶级政党，他说：“必须准备牺牲我们的成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特殊的利益”，“甚至把共产党本身解散”。于是，1944年5月20日至22日在纽约召开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然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而代之以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者政治协会，这个协会则以白劳德修正主义纲领作为总纲。在工会工作中，白劳德竟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不许罢工，党员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

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的结果，广大党员离开了这个不革命的党，有1,5000名党员离党而去。而在南方则完全取消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个非党的共产主义协会与党员的关系松懈，至少有50%的党员与组织没有关系。协会在工人中没有威信，大多数工人不肯加入协会，有的协会成员向工人宣传白劳德那一套谬论，工人们不是不愿听，就是听了以后轻蔑地走开。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开始就遇到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国共产党的部分党员的反对，1944年1月20日福斯特在给全国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白劳德的言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现时在美国历史上最尖锐的一场阶级斗争中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些彼此敌对的力量，即绝大部分的大资本同全国的各个民主阶层，在现在以及在战后时期，都能够而且应当融洽无间地一道工作。”①福斯特针对白劳德对德黑兰会议的估计

① 福斯特：《给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14页。

说道：“德黑兰会议决没有消灭美帝国主义”^①，“在罗斯福当政的11年间，垄断资本自然仍旧居于统治地位，它的利润一直在上升，它的集中程度和实力也极大地增加了，特别是在战争时期”^②，“战后一届罗斯福政府将同现在一样，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略为受点自由主义控制的政府罢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强大的，贪婪的，侵略成性的”，“不会对人民的利益作出让步”^③，“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们浸透了……反苏的倾向。只是由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他们才勉强赞同德黑兰协议”。^④

1945年7月26—28日，福斯特又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上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福斯特同志指出：“白劳德带着他的修正主义，是在企图把一种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制度加在我们党的身上……这种修正主义完全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⑤

福斯特指出：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工人被剥削的理论，他对资本主义怀着巨大的信仰，他甚至超过了象蔡斯、汉森、约翰斯顿一流热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白劳德的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否认，他的阶级合作和资本与劳动间利益和谐的理论同伯

①②③④ 福斯特，《给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12、15、12、11页。

⑤ 福斯特，《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97页。

恩施坦、累琴和康帕斯的理论是用同样的机会主义材料制成的，不过白劳德的思想比起这些臭名远扬的过去的修正主义所曾经作出的任何东西来，是更加无耻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罢了；白劳德的路线是对工人阶级革命性和共产党先锋队作用的否认，在他看来，将是美国的财政资本家领导人民去实现一个和平、民主和繁荣的社会，工人和共产党只起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作用；白劳德的路线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理论的否认，他眼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并不是垂死的，而是生气勃勃的，进步的，各种阶级矛盾都将在美国垄断资本家领导之下，自发地得到调整，新的社会不必通过群众的阶级斗争而会和平来到；白劳德的路线是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否认，他散布一种仁慈的美国资本家能够领导社会，造成幸福的资本主义的进步世纪的幻想。从而他就抛弃了党的社会主义目标，抛弃了党纲。

因此，福斯特指出：“他是在对我们党作战，从而也是对他所称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作战。”^①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白劳德的斗争道路是艰苦、复杂而又曲折的。白劳德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对与他进行斗争的同志进行残酷打击，甚至开除党籍。比如有的党员就是以“写了一封对党的领导者含有种种诽谤控告的信给党员，企图在党内造成分裂”这样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实际上正是白劳德自己以排斥异己的卑鄙手段在党内制造分裂，因此，与白劳德的斗争开始时是很艰巨的。

^① 福斯特：《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100页。

1944年1月当白劳德全面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时，领导成员中只有福斯特一人表示反对。2月，在美共政治委员会扩大大会上，在宣读福斯特批判白劳德的信件时，也有一人投票赞成福斯特。5月，在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白劳德悍然不顾党员的反对，操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解散美国共产党，气焰嚣张到了顶点。

但是，修正主义尽管猖狂一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是一股逆流，它终究不能压倒革命的主流。仅仅过了一年，由于福斯特同志和其他马列主义者的斗争以及美帝独霸全球的野心日益暴露和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教育了人们，美共内部广大党员认识逐步提高，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谬论在现实面前遭到了破产。1945年5月，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政治委员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了白劳德路线。接着除白劳德本人外，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同年6月举行的美共第十三次紧急代表大会，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着手在党内认真清除白劳德的投降主义，正式决定撤销他总书记的职务。7月26—28日美共在纽约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总结了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教训，重新恢复了美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美共福斯特等同志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还为此专门给福斯特同志发了电报。中共党报在社论中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指出：“白劳德所有错误都环绕在他那种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为中心的错误纲领上面”^①。“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①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日社论。

者看不见：在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阶级的成份是站在自己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参加的，因此，除了反法西斯这个共同的纲领之外，它们还各有其他不同的纲领，因此，在如何战胜法西斯的方法上，也各有不同的路线。在战胜法西斯之后，有的主张这种胜利的果实应当归于少数人之手，由少数人去垄断；有的则主张它应当归于绝大多数人民之手，由绝大多数人所共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者看不到统一战线中这些根本的东西，就不愿意，也不能够在统一战线中对于各种违反人民利益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东西实行斗争，就会把无产阶级变成大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极有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极有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现在和将来。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便是这种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一种最显著的典型”①。社论还指出：“白劳德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源就是“平衡论”，“这种平衡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完全相反的，毫无相似之点的东西，而且从来是各种机会主义者一种主要的思想方法论。在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革命时代的陈独秀投降主义，不论抗战时期所出现的新陈独秀主义，它们对于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投降政策，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政策，它们的主要思想方法论也即是这种平衡论”。②

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毛主席在美共决定解散“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重建美国共产党的第二天（1945年7月29日）给福斯特的祝贺电报中

①②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日社论。

指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①

福斯特同志指出：“白劳德的惊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是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对我们党所加压力的屈服。”^②美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横财，掠夺了大量财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因此，他们得以散布所谓美国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幻想，鼓吹“美国例外论”。1943年，当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进入争取最后胜利阶段，美帝企图窃取胜利果实而独霸全球的野心毕露时，“美国例外论”又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掩饰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麻醉欺骗工人阶级的鸦片烟。他们还侈谈什么资本主义乌托邦来使工人看不见社会主义的前途，以雇主们在战后时期会自动增加工资的许愿来诱骗工人放弃阶级斗争。白劳德修正主义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反动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所以福斯特同志说：他的路线同我国大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统治世界的计划是完全吻合的。

白劳德修正主义得以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还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增长，他们带来大量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

除此以外，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得以统治美共全党的其他原因是：

1、党的领导机构由于胜利而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

^① 毛主席：《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毛泽东选集》第1016页。

^② 福斯特：《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100页。

而在争取动员一切力量击败法西斯这一目标时，反对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而忽略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警惕。

2、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美共总结中指出，对“非劳工同盟者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毫无警惕的态度，我们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轴心部分的影响。对罗斯福总统以及同他联合一道的那些资本部分，尤其是这样”。把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没有对罗斯福的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进行批评，反而在工人和黑人斗争中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3、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很低。

4、党内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的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脱离党员群众，官僚主义严重，独断专行，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

为了清算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美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下的战斗任务：

1、进行一切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运动。2、重建美国共产党。3、刷新和加强党的领导。4、重新树立民主集中制。5、统一战线中加强党的独立作用。6、改进党的社会成份。

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不仅在美国国内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白劳德曾给许多国家的党写信贩卖他那套货色，因此有些党感染了取消主义毒素，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党影响更为普遍。因此，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

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①

白劳德被美共开除以后就直接投靠资本家，担任了资本家的《共产主义研究》的私人顾问。但是，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影响远远没有肃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这种思潮总是会在新形势下不断出现。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陶里亚蒂、多列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就是白劳德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所以，无怪白劳德在1960年不为无因地说：“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1945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 “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为新的正统了。”

① 毛主席：《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毛泽东选集》第1016页。

第三节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党内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伟大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制定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方针

从1937年起，中国人民开始了长期的、艰巨的抗日战争。战争进行了八年，1945年胜利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遇到的是强大的敌人，面临的是极复杂的情况。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绕过了一块块的暗礁，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主席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马列主义，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的许多新的课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普遍的意义。

1931年，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趁英美等帝国主义忙于应付本国经济危机而无法与其争夺中国和蒋介石正加紧进行反革命内战而不敢抵抗其侵略的时候，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

侵略中国的华北，由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反共、独裁、卖国的政策，继续进攻红军，加紧与日寇妥协，终于同日本签订了丧失中国在河北、察哈尔大部分主权的“何梅协定”。

此时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为此，必须彻底批判王明一伙长期以来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观点，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充分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指出在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完全是可能的，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也是会分化的，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明争暗斗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主席在报告中还深刻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同时，毛主席又提醒全党要防止重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着重强调了必须坚持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以后，为了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党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在我党正确方针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加剧分化。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接受了我党共同抗日的主张，和红军停了战，并发动了有名的

“西安事变”。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并在1937年2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至此，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得到实现。

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新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由于长期的扩军备战而更加尖锐化了。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实行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迷梦，日本帝国主义便趁英、美正忙于应付希特勒在西方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无暇东顾的时候，利用国民党的卖国反动政策，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狂妄计划。

同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的芦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从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全面开始了。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号召抗战的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政府、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7月15日，我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抗日的基本主张，并派出代表同蒋介石谈判。由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和日寇的侵略危及它自己的利益，蒋介石才不得不于10日表示对日抗战，但同时却与日寇继续进行谈判。直到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才被迫发表了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口头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抗日战争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国内就存在着两条指导路

线的斗争。一条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片面抗战路线，一条是共产党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二者争论的中心是如何抗战这一问题。

国民党的抗战路线，要求抗日战争的全部活动要服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切足以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政策、主张和行动，都必须加以限制、取缔。抗战中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开放人民民主，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它的政府和军队一手包办，人民不能过问。这是片面抗战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则是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民族独立和冲破蒋介石反动统治争得政治自由的路线，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这是坚定不移的立场。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充分估计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险，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心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受蒋介石国民党的任何限制和阻碍，放手大胆地领导革命和发展革命。毛主席说这是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洛川会议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抗战路线，向华北华中进军，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在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上，则是一溃千里，丢掉了整个华北，上海、南京也相继陷落。

随着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拚命叫嚷“再战必亡”，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度幻想依靠外援取得速胜，但当军事上溃败以后，又重弹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老调。

此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轻视我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幻想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王明曾在文章中鼓吹四年就可取得抗战胜利，并且不赞成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同时，他们还存在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看不到抗战的艰苦性和持久性。在这种情况下，“亡国论”和“速胜论”就成了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极大障碍。究竟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胜利？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1938年5月，毛主席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发表了《论持久战》。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毛主席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并且指出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明确途径。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主要阐发了以下几个基本思想：

首先，毛主席深刻而精确地剖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结论的全部根据在于，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

决死的战争”。①

从这个总根据出发，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这些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这就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

第二，由于日本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内外矛盾使之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它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乃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则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在战争性质上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和中国必然胜利的主要根据。

第三，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则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第四，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则是得道多助的。

毛主席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亡国论”者夸大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当作全部问题的根据，而无视其他矛盾。“速胜论”则相反，夸大了其他几个矛盾，当作全局的条件，而无视敌强我弱的矛盾。“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只看到全部矛盾

① 毛主席：《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15页。

中的一个或几个，并把它夸大为全部的或主要的矛盾。这反映了他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基于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毛主席论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此阶段我应采取的战争形式是：主要的是运动战而辅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中我应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辅以运动战。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此阶段我应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运动战，但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辅以游击战。

其次，毛主席深刻地阐发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只有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以及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所以，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加，乃是保证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毛主席还痛斥了“唯武器论”，指出：“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②

最后，毛主席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系统地

^{①②} 毛主席：《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8、437页。

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

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因此对游击战必须从战略地位来考虑，以制定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队必须建立根据地，随着根据地逐步扩大，直至最后收复全部失地。随着战略反攻阶段到来，游击部队将逐步发展为正规军，使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毛主席还制定了具体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①

《论持久战》是马列主义宝库的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它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规律，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军事上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彻底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舞鼓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毛主席所阐明的关于战争发展的规律、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对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毛主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

^① 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76页。

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革命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局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因此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取消阶级矛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统一战线的发展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这是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一切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

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党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并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拱手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他们还胡说什么统一战线“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领导权不为谁专有”，应是“共同负起责任来”，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这样，王明又回到了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① 毛主席：《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1192页。

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①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②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他在长江局主持工作（书记）的时期内，整天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拉关系，到处作演说，攻击毛主席的报告。1938年1月，王明还抛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文件《挽救时局的关键》，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①②}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61、364页。

1938年5月党中央曾在几次给长江局和东南局的指示中，反复指出党在长江流域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本游击队与游击区”，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指示并没有被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接受。同年秋武汉失守，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投降主义发展得更加严重。当时毛主席对华中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要长江局准备在武汉失守以后，发动华中的游击战争，开创华中解放区，以便和华北联成一片；要长江局把工作中心立即从城市转向农村，立即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王明拒不执行，并回电表示工作中心应是保卫武汉，不在农村，战略方针应是正规战，“建议”华北八路局集中起来攻城市。

王明的错误路线造成了严重损失，长江流域的群众没有很好发动，丧失了时机。同年10月，党在延安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和“统一战斗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中的根本问题。毛主席首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①

①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86页。

毛主席针对国民党阴谋排挤我党领导权和党内存在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险，着重论述了如何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他指出“只有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高度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与先锋作用，照顾多数，善于与同盟者一道工作，并保持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实现对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责任。

毛主席还进一步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统一性与独立性、让步问题、战争指导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毛主席指出，党的正确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毛主席的这一方针是立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思想基础上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在党的方针上的客观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斗争是主要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需要，因此，党派的独立性，应以不破裂统一战斗为前提。但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各阶级之间还有不同的利益，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时刻阴谋剥夺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统一战斗中，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调整统一战斗中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更好地去进行民族斗争，它和民族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便有绝对必要。

毛主席还具体阐明了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问题。这就是：在统一战斗工作中，竭力巩固和扩大党的力量，巩固和

^①毛主席：《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5页。

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坚决反对顽固势力的反动政策；在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拒绝国民党派他们的党员来当干部，拒绝国民党提出的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无理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在敌人占领区，必须不管国民党允许与否，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毛主席还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统一战线中的无原则让步，指出：我们的让步必须是“积极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决不可作纯消极的让步，消极的让步只会牺牲革命的根本利益。右倾投降主义者迁就和迎合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其结果必然是葬送无产阶级的事业。

毛主席还着重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轻视人民武装和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的错误思想。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②

①②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8、509页。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详细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粉碎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及其意义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以其主要军事力量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从此，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大举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声言要和国民党谋取妥协的和平，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取消“反蒋”口号，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就可以撤出华中、华南，华北也可以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同时，日本政府还努力策动英美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对日妥协。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日本向华中华南的进攻，损害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而进一步加深了同日本的矛盾。但是，它们既期望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北进去进攻苏联，又害怕日本协同希特勒德国一道来反对自己。因而在1938年到1939年间，它们曾几次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压迫中国对日投降，企图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就是所谓“远东慕尼黑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迅速地增长了。亲

日派的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寇。英美派的蒋介石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其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将重点由对外转到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接着国民党又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文件，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同时加紧了“军事限共”。同年4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山东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惨杀八路军干部四百余人；6月和9月，又分别在河北深县和湖北东部，围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方机关，废杀我党干部和战士。同时，在湖南和河南发生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

同年冬，随着英法和德国之间战争的爆发，英美帝国主义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加紧，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就达到了高峰。1939年12月到1940年2、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很快就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发动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思想上对我党也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高呼“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口号，叫嚣“一切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共产主义应该“收起”，共产党应该“取消”。他们大谈“基马尔主义”和所谓“一次革命”的反动滥调，以掩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民族资产阶级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又惧怕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他们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在抗战胜利后出

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在党内也还有一些人对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缺乏正确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以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谬论，打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引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此，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这本书以及同时期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毛主席详细透彻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必然破产和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胜利，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路线和纲领，并且规划了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过程的基本战略方针。

第一、毛主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革命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它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革命阵线来说，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并且开始

崩溃，只有更加依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才能过活。所以它是反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正处在向上高涨的兴盛时代。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日益觉醒的各国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就不为帝国主义所允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允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主席在观察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它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从反帝斗争的全局去看待。他指出：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无产阶级，而不能属于资产阶级。这个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工农联盟。

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后，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它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就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解决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任务不能不落在

无产阶级肩上。

毛主席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结成了坚固的联盟，就能造成反帝反封建的强大力量，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根据对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的科学分析，毛主席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是处于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这一时代条件出发，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绝不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力量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以后，就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即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既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区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是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基本部分，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基马尔主义”的反动谬论。

根据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毛主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第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①所以这种革命又恰恰是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更为广阔的道路。

毛主席反复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从而对“一次革命论”进行了彻底批判。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是一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著作。它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的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在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追随者的反动梦想。同时，它彻底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扫清了思想界的迷雾，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毛主席的这些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主席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条件下，大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其伟大的国际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走向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5页。

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它是无产阶级战胜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伟大思想武器。

1940年7月，当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清算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后，当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党中央为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针对国民党加紧防共、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及时地号召全国人民加紧团结，为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而斗争。就在这时，刘少奇一类骗子却写了一篇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涂脂抹粉的文章。在这篇名为《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文章中，无耻地称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要“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胡说国民党统治区的独裁政权是“政治制度民主化”，“中国人民和它的政府”是一致的，等等。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早已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吹鼓手和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了。

四、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党的思想建设和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

1941年1月到1942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刻。

在西方，希特勒德国侵占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

在东方，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

港一带的美国海军根据地，击毁了美国主力舰多艘，同时，进攻太平洋上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到了1942年4月，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属地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以及荷属东印度都被日本所占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日本的势力范围便扩大到东起中途岛、西迄印度东岸，北邻西伯利亚，南至澳洲北岸的广大地区。英美法荷四国过去一百多年在这一片海洋大陆和岛屿所侵占的殖民地，全部落入日本之手。

这段时期内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暂时胜利。在此种形势下，日寇的政策是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以便扩大它的侵略计划，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所以，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极其野蛮残忍的大扫荡。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顽固派继续采取以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为主，以军事威迫为辅的方针。

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时机一方面用大军包围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地区，另一方面又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指使其部队投降日寇，以便明目张胆地打起反共的旗帜，协同敌人进攻解放区，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曲线救国”。为了削弱和扑灭共产党的力量，1941年1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我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揭露了蒋介石的全部罪恶阴谋。结果，孤立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自己。

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队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

夹击下，八路军从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3万3千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也缩小了，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1941年和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解放区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政策，展开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对敌人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高潮，不少部队、机关、学校做到了基本上自给或大部自给，这就为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

同时，为了克服那种曾经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妨碍党员贯彻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全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要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1937年毛主席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曾深刻地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开展“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更具体地提出了“反对主

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①的斗争任务。此后，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揭发了当时党内流行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他指出，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其表现形式虽不相同，但二者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都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在认识论上都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这是因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最本质的对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对立。如果不反对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党内就不会真正确立。

针对教条主义在党内为害严重的情况，毛主席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着重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同时，毛主席对经验主义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了剥夺教条主义者的“资本”和纠正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主席对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克服学风不正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针对党内不注重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的偏向，毛主席还向全党特别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① 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0页。

言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主席这些论述，为全党掌握马列主义者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报告中对宗派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①。毛主席举出了张国焘在党内搞宗派主义，闹立独性，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的事例，告诫全党同志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克服宗派主义。

毛主席还指出了宗派主义的思想本质是个人第一主义，这种人“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②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党八股。毛主席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③，他们为了要强行推行其主观主义政策，因此，在宣传工作中就必然产生罗列现象、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蛮横武断的党八股，这种八股文风，既不能反映客观实践、又没有生动活泼的气派，而只能使革命精神窒息。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党八股。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的产生决不是

^{①②③} 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集》第779、779—780、796页。

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改造，就会产生上述三股歪风。

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极为深刻的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主席为整风运动规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成效。它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大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了路线觉悟，进一步学会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时也帮助了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立场，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从而保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在各方面贯彻下去。

不仅如此。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方面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党的历史特点和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在指导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因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同时，解放区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满怀革命激情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革命根据地，但他们中许多人的世界观并未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感情还是旧的，有的人不愿与工农兵相结合，有的宣扬“人性论”。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则利用文艺形式公开发表反党文章，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加突出了。因此，在毛主席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学习，1942年5月毛主席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告。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这部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批判了轻视实践、轻视工农兵、轻视群众的观点，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兵中去，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作了彻底地批判，要求全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对一切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言行，坚决斗争到底。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①。这是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世界观的核心。毛主席教导全体党员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要认真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毛主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②

毛主席还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③

文艺路线的斗争经常尖锐地反映着这个时期政治路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因此，必须经常地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根据地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取得了胜利。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全党整风运动使党能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战胜抗日时期的极端困难，为党的“七大”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1943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终于渡过了难关，逐步扩大了解放区。在苏联军队胜利地反击希特勒军队的同时，从1944年起，

①②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4、833、822页。

中国抗日根据地也开始了局部的反攻。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一年。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打击人民力量，准备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从而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要作舆论准备，蒋介石在同年3月，出版了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历史，贩卖反革命的法西斯毒素，并扬言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他们趁着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指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假冒民主团体的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调动了大量军队，企图侵占陕甘宁边区。最后，由于共产党的斗争和揭露，这些阴谋均未能得逞。

此时，苏联在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使东方的日寇处于不利地位。英美已有可能抽调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方面来，发动对日本的越岛进攻。日寇当时企图打通从北京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一方面，把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于南洋的日军，联络起来，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将来在中国大陆上和人民军队作战，因此，1944年3月日寇重新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国民党军队遭到空前的大溃败，使人民遭受空前的大灾难。

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在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反动、军事的大溃败，再也不能忍受了。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民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都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英明地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的危险，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对国民党反动派放松警惕，不去揭露它的准备内战的阴谋，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毛主席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可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或者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旧中国。

为了反对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前途，毛主席为我党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同机会主义长期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全党经过1942年整风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结果。

党的“七大”，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团结方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同年5月，德国法西斯被击败，宣告无条件投降，欧洲

^① 毛主席：《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1001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5月至7月，我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夏季攻势，消灭了大量敌人，打通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为全面大反攻打下良好基础。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主席号召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在毛主席的号令下，人民军队向日寇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毛主席抗战路线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八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政策的结果，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奋斗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人民革命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的胜利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党在战争中经受了严重考验，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今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援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毛主席指出：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

将影响到整个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进步。

第四节 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一、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德国法西斯在迫使法国投降以后，几乎独霸了整个欧洲。它利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全部资源，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并于1940年12月拟订了进攻苏联的“巴尔巴罗斯计划”。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开会，缔结了柏林会议协定。在协定中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建立“新秩序”的特权，德意则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特权。此外，还达成了德、日瓜分苏联的协定。后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也参加了这个协定。次年4月，德军侵占希腊、南斯拉夫，于是德国法西斯建成了一条欧洲十四国的反苏战线。

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用190个师团的兵力，18,000辆坦克，25,000架飞机，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德国及其仆从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的军队侵入苏联领土，希特勒的空军不断地轰炸苏联的工业中心和运输中心，法西斯指望利用突然袭击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用“闪电战”的方式在大约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进而征服全世界。

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以及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奋起自卫，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苏德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①

战争爆发的当天，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以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军队及全体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6月30日苏联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全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集中领导机关。该委员会由斯大林担任主席，莫洛托夫任副主席。

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与苏联军队发表了广播演说，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动员令。

斯大林的演说，成为动员苏联人民为粉碎法西斯而斗争的一个战斗纲领。苏联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军队和经济各重

①毛主席：《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764页。

要部门的工作。在敌占区，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有效地打击和破坏着敌人的后方。在后方，全部国民经济都按战时需要进行了改造，受敌人威胁的地区的工业企业实行大规模的东迁。在东方地区增加煤炭、石油和矿石的开采量，扩大了电力、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生产，新建了许多国防工厂。在前线，苏联军队英勇战斗，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战争开始时，德国法西斯曾疯狂一时，侵占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苏军在战争初期受到暂时的挫折，原因就在于法西斯早已把一百多个师团秘密集结在苏联边境并举行了强盗式的突然袭击，而苏联军队还需要向边境调动。当时德国法西斯集中了全欧洲的资源 and 工业力量，所以在飞机、坦克的数量上暂时占优势。但是，希特勒很快就发现，他的在两个月内消灭苏联的计划，只不过是幻想。凡是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地方到处都碰到激烈的顽强的抵抗。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领导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积极防御与准备决定性反攻相结合的计划。即以积极的防御战，尽量阻挡敌人前进的速度，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争取时间，动员和组织自己的全部力量准备进行反攻和最终消灭敌人。仅在1941年夏秋的战斗中，苏军就给了德国法西斯以重大的挫伤，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200余万人，此外，还击毁敌军8000辆坦克、10,000门大炮和7,500架飞机。这就迫使敌人放弃了全线进攻的计划，而把主力分作列宁格勒、罗斯托夫、莫斯科三线，并以莫斯科为主，集中了苏德战场上3/4的战车与摩托部队，发动了猖狂进攻。

莫斯科的保卫战是1941年最大的战役。敌人从10月2日

发动进攻，曾经进到离首都只有25公里。斯大林在这期间在莫斯科亲自指挥这一伟大战役。苏军在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于12月6日发动了反攻，战斗一直继续到1942年的1月底。这一战役消耗了希特勒30多万军队和大量的机械化装备，并以敌人的完全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遇到的大失败，它埋葬了希特勒的“闪电战”战略，揭穿了法西斯军队“无敌”的神话，粉碎了希特勒的军事计划。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他们没有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没有估计到苏联后方的巩固，没有估计到苏联各族人民争取胜利的意志。这一战役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信。

苏军在莫斯科战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1941—1942年冬季攻势。在这一攻势中，解放了60多个城市，消灭了100万以上的德寇，在部分地区，苏军向西推进了400公里以上。活跃在敌后的游击队，给予德军以重大打击。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利用冬季喘息的机会，同时还消耗了敌人原来准备在1942年春季使用的预备队。斯大林在1942年2月指出：“现在，德国人已经没有他们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由于背信弃义突然进攻而造成的军事优势了。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后备力量的突然性和意外性的因素，已经消耗殆尽。因而，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衡现象也就消灭了。现在，决定战争命运的将不是突然性这种附带的因素，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军队的士气，师团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只要德国人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

素，德国法西斯军队就处于崩溃的边缘。”①

苏德战场在当时已成为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因为希特勒统帅部把德军的主力集中在苏德战场上，它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苏联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主力军。

美英统治阶级迫于人民的压力和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对他们本身利益的直接威胁和打击，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和第二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行为，同情苏联人民的抗德战争。基于这种情况，苏联共产党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即为团结一切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力量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1941年7月12日，苏联与英国签订了《苏英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之协定》；1942年1月1日，包括中、苏、美、英等26国公布了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合国家的共同宣言》；同年5月和6月，苏英、苏美分别签订了《苏英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和战后合作互助同盟条约》、《苏美关于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等。英美政府在上列的“协定”、“宣言”和“条约”中，都分别承担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务和责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但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是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的。美英等国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不得不参加到

① 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会》，《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91页。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来，然而，他们一方面希望在战争中击溃自己的主要竞争者——德、意、日，另一方面却仍然幻想在战争中削弱苏联，以便在战后建立他们自己的霸权。当时的美国参议员杜鲁门曾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说过：“当我们看见德国人会胜利时，我们就帮助俄国，而当我们看见俄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帮助德国。总之，要让他们去互相残杀，杀得愈厉害愈好。”英国当时的航空工业部长柏勒巴松也说，从大不列颠方面着想，东方战线上的结局最好是两败俱伤，那时英国就能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英美政府在签订协定以后并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对开辟第二战场一再拖延。虽然如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胜利地击败法西斯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联红军的胜利反攻

1942年夏到1943年春，苏联人民进行了震撼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德军在莫斯科城郊失败以后，由于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便得以从其全部的260个师团当中，抽出了240个师团投入反苏的战场上。1942年夏希特勒发动攻势，秋天敌人就近逼斯大林格勒，并侵入高加索山麓。其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然后从东面向北包抄莫斯科，向南出兵波斯湾，并会同日本从中国东北出兵，土耳其从苏联南面出兵，向西伯利亚进攻，打通德日土联系，灭亡苏联。再西进南进，对付中国和太平洋上的英美势力，企图实现其奴役全世界的幻想。因此，苏军

在斯大林格勒的胜负，不但关系到苏联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斯大林为首的苏军统帅部识破了敌人的战略意图，制定了在斯大林格勒近郊粉碎德军的计划。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消耗大量敌人有生力量，以赢得时间造成力量与技术上的优势，再转入反攻，包围并全歼敌人。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是极端艰苦的。敌人每天出动上千架的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炮弹和炸弹象暴雨一样数以万吨地倾泻而来，城市日日夜夜都在火海之中。但是，苏联军民却越战越强，越战越勇，每天打退敌人一、二十次冲锋。每条街道都成了消灭法西斯的战场，每座楼房都是不可攻克的堡垒。斯大林给红军的命令是“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耗敌人，歼灭其有生力量，消灭其技术装备”^①，“在敌人后方燃起全民游击运动的火焰。”^②苏军在大量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与装备后，11月19日斯大林发出了“前进，歼灭德国占领者，把他们从我们祖国赶出去！”的命令，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了决定性的反攻。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战斗，结果，被包围的两个精锐德国军团，连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军队共33万人全军覆没。残存的90,000名士兵、2,500名军官和24个将军（包括德军总司令鲍利斯将军）于1943年2月2日向苏军投降了。

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根本转变的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以后，法西斯德国已经再不能恢复元气了，从此时起，战略的主动权已经从德国陆军统帅

^{①②} 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斯大林文选》（上）第323页。

部转到苏联统帅部了。

斯大林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曾经这样总结道：“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改变了。法西斯德国日益势穷力竭而变得更加虚弱，苏联却日益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①“从此以后，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②

毛主席曾对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③

这次战役的胜利，动摇了法西斯侵略阵营，打击了希特勒德国在“中立”国家的威信，使德国与各“中立”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开始出现了裂缝。在政治上军事上孤立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支援了其他战场反法西斯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

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并不甘心失败，1943年7月又发动了“夏季攻势”，从哈尔科夫和奥疗尔两方包围库尔斯克的苏军，企图打通进攻莫斯科的通路。他们倚仗新式坦克和新式大炮发动进攻，但还是节节败退，仅三个月内，苏军将法西斯击退400多公里，解放了乌克兰等地。

在苏军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影响下，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为了缓和世界人民对他们的不满，更为了确保他们在北非和地中海的殖民地，1942年底乘德军被苏军追击而无力援助非洲的情况下，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

1943年初法西斯意大利的110个师的最精锐部队在苏军

①② 斯大林：《最高统帅命令》，《斯大林文选》（下）第335、334页。

③ 毛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841页。

的反击下，丧失殆尽。国内经济、军事生产陷于瘫痪，人民饥馑，反战情绪高涨。在这种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逼迫下，9月，意大利反动政府无条件投降。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情况下，1943年11月25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晤，这就是“德黑兰会议”。会后并发表了宣言，即《德黑兰宣言》。同时决定：第二战场的开辟不得迟于1944年5月1日。

德黑兰会议前夕，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并规定战后“使朝鲜独立”。

1943年，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增长，工业总产值比1942年增长了17%，农业保证了前线的供应。与此同时，苏军收复了2/3的沦陷区，歼灭德军400余万人，德军损失了14000多架飞机和25000多辆坦克，50000多门大炮，德军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1944年苏军发动了十次歼灭性打击，完全收复了被希特勒德军侵占的苏联领土，恢复了从黑海到巴伦支海的全部苏联国境线，并且配合中欧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解放这些地区的人民作出了贡献。

美英帝国主义眼见苏军迅速取得胜利并在不断解放欧洲国家，他们想要使苏联削弱两败俱伤的梦想破产了。为了抢夺欧洲领土，挽救资本主义势力，阻止民主力量的发展，于同年6月6日，美、英军队匆匆忙忙地开辟拖延两年之久的

欧洲第二战场，从法国北部和南部先后登陆。

第二战场的进展很迟缓。于是德军在12月在亚丁地区向英美发动了反攻。几天内，英美联军溃退百余里，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丘吉尔只好向斯大林求助。斯大林于1945年1月12日调动150个师团的兵力，提前发动了强大攻势，歼灭了敌人110多万，拯救了濒于覆灭的英美联军，解放了波兰和捷克的大部分地区，打开了向柏林进军的通道。

此时，胜利在望，美英力图抢夺胜利果实的野心越益暴露，同盟国内部矛盾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战后的一些重大问题，苏美英三国首脑又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会议是在1945年2月4日到12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的故称克里米亚会议。会议就一系列问题通过了决议：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肃清德国军国主义，惩办战犯，并使德国民主化的决议；德国赔偿被侵略国损失的决议；德国投降后将由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并在柏林设立由盟国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所组成的管制委员会共管柏林的决议。通过了《欧洲宣言》：宣布欧洲各国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民主制度。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波兰疆界的决议，规定波兰东部边界根据1919年“寇松线”划定（其西部和北部被德国封建主并吞的领土归还波兰）。克里米亚会议还决定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同时会议又通过了举行大国外长会议的决议，规定外长会议应定期召开并讨论战后和平调处的各项问题。会议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应于结束欧洲战争三月以后对日作战。并规定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

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宣告成立。

三、欧亚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法西斯 奴役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联盟的英勇斗争，同欧亚两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争是互相支援联成一气的。在亚洲，各被占领国家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复兴的道路。

1910年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30年代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与我国东北抗日联军并肩作战。1934年，金日成同志把游击队合并，组成朝鲜人民革命军。1936年成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化整为零组成军事小组，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在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炸毁军用列车、军需仓库等方面，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潜入朝鲜国内的许多政治小组，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并恢复和发展“祖国光复会”的组织，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活动，大大地鼓舞和加强了朝鲜国内人民的反日斗争。随着日本侵略军被击溃，1945年8月，金日成同志回到朝鲜，朝鲜北部得到了完全解放。

越南在东南亚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就把越南做为它向东南亚侵略的第一下目标。它利用法国在1940年6月投降德国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与法国维希政府于当年9月

以签订协定的方式使日军进驻越南。这样，越南人民便同时受着日、法两个帝国主义的奴役。越南人民从日军进驻的第一天起，就在共产党（1930年成立）的领导和号召下，展开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曾先后在北越和南越发动了几次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1941年5月建立了“越南民主同盟（简称“越盟”）”。“越盟”以胡志明为主席，它是越南各阶层人民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它以越南各界所组织的救国会为基础而又以参加各救国会中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员为骨干，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越盟”的纲领，提出了联合全国各阶层，各革命团体和各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使越南全境完全独立的目标。同时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在国际上提出了联合亚欧各被压迫民族共建联盟以反抗法西斯与帝国主义，实行华越友好政策。“越盟”用这个纲领团结了和组织了广大人民来反抗日法帝国主义。从1941年到1945年间，“越盟”成员发展到900万，深入到各阶层。印度支那共产党通过越盟这一组织，承担起领导全国一切反抗占领者的爱国力量的任务，成为争取独立的重要推动力量。它并且组织了游击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游击队从最初的12个人，150发子弹，逐步发展壮大，到1944年底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已经解放了七个省，12月22日游击队扩大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里粉碎了殖民统治机构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为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1945年8月“越盟”发布了总起义命令，人民军部队解放了越南

北部6个省——北越山区，建立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

1945年夏，“越盟”颁布了新纲领，指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越盟”要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同年8月13日—15日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九代表会议在北越解放区召开，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人民军开始向河内进军。8月17日—18日河内人民举行示威并转为武装起义，傀儡皇帝保大的城防军和警察转到起义者一边，8月19日晚河内解放。8月23日西贡解放，保大退位，越南革命胜利。

1942年3月，荷兰投降日本，印度尼西亚即为日军所占领。印度尼西亚人民从自己切身体验中日益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真面目，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从1943年起，印度尼西亚独立劳动党，组织群众，在爪哇、南安、美里达、西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地举行起义，在日本所征募的伪军中也爆发了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没有取得重大的胜利，但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942年日本占领了缅甸。1943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德钦丹东任总书记。游击队组织起来了，1945年3月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发动了总起义，5月，起义军占领了仰光，并解放了大部分领土。

在菲律宾群岛，共产党组织了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12月开始了游击运动，并在吕宋岛上组成了人民抗日军——“胡克·巴拉罕”，它为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改造事业而战斗着。到1945年2月，人民军连同后备兵员在一起已达70,000人，他们配合美军登陆发动了总反攻，在三个省建立了人民政权。

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成长起来了。马来亚华侨组成了“星洲华侨义勇军”,同人民抗日军并肩作战。人民抗日军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了祖国的一部分领土,于1945年8月解除了日寇武装,在中部北部建立了人民政权。

亚洲各反法西斯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以下共同点: 1、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掌握着领导权。2、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斗争相结合。3、普遍地建立起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切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都有直接的影响。

欧洲被法西斯占领国家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从1939年4月意大利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就开展起来。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宣告成立,抵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的纲领,纲领提出: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团结和组织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以便实现祖国的彻底解放和堵塞帝国主义在阿尔巴尼亚统治的道路;从根本上打碎法西斯占领者和剥削阶级的反人民的旧政权,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巨大的爱国和革命热情,响应了共产党关于对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不妥协的武装斗争的号召,纷纷参加游击队,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英勇的斗争。1942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了所有反法西斯人士的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和加强,解放的地区

一天天扩大，革命力量的团结不断巩固。党领导人民揭穿了阴谋破坏革命力量团结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建立的反动组织“巴里·康毕塔尔”——“民族阵线”。1944年秋民族解放军已解放了全国2/3的国土，并于十月开始进攻地拉那，经过19天战斗，终于解放了地拉那。11月29日北部最后一个大城市——什科德尔夺回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使祖国获得了解放。

大战前夕，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地主进行了国家法西斯化。1940年9月安东尼斯库仿照希特勒的榜样在罗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从而把罗马尼亚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仆从。战争期间，罗马尼亚的物资一列车一列车运出国支持希特勒的侵略战争，而罗国内从1941年便已宣布一星期有三天“吃素”，两天“无粮”。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941年罗共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各种民主力量齐心协力为恢复罗马尼亚的自由和独立，建立民主政府和制止反苏战争而斗争。1942年罗共在卡拉萨山、弗兰奇山和奥尔丁尼、巴纳特、沃耳特尼察等地区建立了武装战斗小组，展开积极的战斗活动。1943年初罗共建立了反希特勒的爱国阵线（包括共产党、农民阵线、爱国者联盟等）。在爱国阵线领导下，革命人民开展了反对希特勒占领军的斗争，以及在军火生产部门进行罢工等。

1944年4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北摩尔达维亚并逼近普鲁特河，大大促进了罗国内反法西斯运动。5月，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成立了民族民主联盟。6月罗共制定了推翻法西斯安东尼斯库的武装起义计划，成立了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夜，全国进行了武装起义，布加

勒斯特及国内其他地区相继解放，法西斯政府被推翻了。

罗马尼亚人民不仅参加了国内斗争，还在苏联建立了15个罗马尼亚师，与苏联红军一起进行反德战争。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反动政府即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人民对政府的这一行径极为愤怒，全国到处举行示威，要求废除条约。与苏联友好，使政府被迫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4月6日德、意、匈军队侵入南斯拉夫，4月18日南军队投降，南国土即被分割占领。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领导下展开了英勇斗争。4月初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南共中央委员会上，建立了军事委员会以领导国内军事斗争。6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南民族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7月4日南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展开武装斗争抵抗侵略者的决定，从此开始了武装起义。7月到10月在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斯洛文尼亚等地都先后爆发了起义。三个月以后游击队就发展到6—7万人，约64支队伍。同年秋，游击队解放了塞尔维亚西部的一大部分领土。

从武装起义的最初几天，南共就着手建立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并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2年底正规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组成，1944年南人民军和游击队已发展到接近30万人。1944年10月20日南在苏军配合下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1939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波兰，在波兰进行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专政。波兰人民组织了地下反抗组织“镰刀与锤子”，“苏联之友协会”开展斗争。1942年1月波兰工人党成立，1943年2月青年斗争同盟建立，这对波兰人民斗争的

发展都有巨大意义。在工人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近卫军，后来成长为人民军。到1942年底在波兰领土上已有10个以上的人民近卫军队伍在进行斗争。1942年夏——1943年初近卫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使占领军死伤了近2,000人，损失装备无数。

1943年在苏联境内，波兰人民组成了波兰第一军。1944年7月波兰人民军在苏军配合下开始解放波兰国土，1945年1月波兰完全解放。

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反动政府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军进驻保加利亚。12月13日保向美、英宣战，并参加了反苏战争。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民开始了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并着手组织游击小组。1942年组成了祖国阵线，1943年8月建立了祖国阵线委员会。同年春，保工人党把全国分成12个战区，每一个战区建立一个司令部，零散游击队编成了统一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几乎牵制了政府全部武装力量。1944年8月苏军进逼保加利亚疆界，8月26日保工人党发出非常指示，号召祖国阵线各党派和保加利亚人民和军队，掀起推翻法西斯统治的坚决斗争，争取政权归祖国阵线。

9月9日，索非亚、普罗夫迪夫、彼尔尼克等城市发动了反法西斯全民起义。法西斯统治被推翻了，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

匈牙利法西斯统治者集团是希特勒的同盟者，他们同谋侵入了南斯拉夫，又进攻了苏联，匈牙利共产党坚持不渝为反对法西斯统治集团、反对侵略战争而进行了坚决斗争。从1942年2月底，共产党就在布达佩斯秘密活动，出版“自由人民报”反对霍尔蒂政权。1944年10月苏军展开攻势，进入

匈牙利领土，匈牙利爱国者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并在苏军的配合下进行战斗，1945年4月4日匈牙利得到了解放。

1939年3月德寇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地广泛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1年秋成立了中央民族革命委员会，各地也成立了地方民族委员会作为抵抗运动的领导机关，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城市发动怠工运动，开展破坏军备的斗争。

在苏联境内，捷克人民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参加了苏德战场的战斗。

1944年8月斯洛伐克人民举行起义，起义席卷了中部和东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起义的人民击退了八个德国法西斯师的疯狂进攻。

1945年5月5日布拉格工人武装起义，5月9日在苏军的支援下起义人民解放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1940年5月希特勒侵入法国后，以贝当为首的傀儡政府在法国南部的维希城建立，成为偏安一隅的卖国政府。同年6月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起来抵抗法西斯。在国内，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阵线及民族抵抗委员会，委员会团结了法国境内一切抗战团体。到1944年，法共所领导的和在其影响下的武装力量多达50万人。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法共领导了全国的武装起义，解放了大片国土。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之后，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的同时，希特勒军队占领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意

大利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游击队和其他爱国战斗队，开展了武装斗争。1945年4月北意大利爆发了总罢工并转为起义，游击队和起义工人解放了米兰等城市，处死了墨索里尼，意大利得到解放。

德国共产党人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统治下，始终坚持了斗争。在希特勒发动了侵苏战争以后，德国共产党向工人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为瓦解和消灭纳粹制度而奋斗的号召。法西斯对德共及进步人士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野蛮迫害，无数德共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被杀害。但德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了地下斗争。在柏林组成了乌里希等反抗组织，它和慕尼黑、埃森及其他城市的组织都有联系。巴乌曼青年组织是十分活跃的地下青年组织，它曾在1942年2月组织了反苏展览会的爆炸，对人民斗争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3—1944年，德国人民反战斗争进一步发展，军事企业中怠工事件层出不穷，给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1945年5月8日希特勒法西斯投降，德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大多数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党人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与各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没有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广泛开展的人民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日法西斯，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加速德、意、日法西斯的崩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也大大鼓舞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使被奴役的国家和人民早日从法西斯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无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作用，一方面别有用心地吹嘘说苏联是“粉碎德国法西斯机器的唯一力量。”另一方面却无耻攻击我党，说我们低估了苏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毛主席在1945年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①历史充分证明，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担负了主要的战争重担，但是如果没有各国人民的人民战争，没有东欧人民的游击战争，摧毁法西斯是不可能的。苏修叛徒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恰恰暴露了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四、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1945年初苏军不顾天气的严寒，发动了强大的攻势，4月9日—13日苏军攻克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奥地利的维也纳，直通德国东部边界。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却同希特勒举行秘密谈判，企图单独媾和，而希特勒则企图在保存法西斯制度的条件下向英美方面投降。同时，希特勒又将大批军队从西线调到东线，妄图阻止苏军前进。而英美此时却乘机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渡过莱茵河，占领了鲁尔和德国西部，南部地区，并拟抢先进入柏林以便控制德国。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命令苏军迅速向柏林进军，4月25日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4月30日苏军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5月2日全部攻克了柏林，把法西斯消灭于它的战争起点，消灭于它的老巢。法西斯匪首希特勒自杀，法西斯制度在德国彻底崩溃。1945年5月8日夜，德军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德国法西斯投降以后，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第三次会晤，即波茨坦会议。会议重申了克里米亚会议的精神，规定了消灭德国垄断组织，消灭德国军事工业潜力，维持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彻底肃清法西斯，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使德国永远不能成为对邻邦的威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会议在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中，同意重新划定波兰国界，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的领土划归波兰。会议决定成立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与战败国签定和约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8月9日，苏军在外贝加尔、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沿海边区一带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也一起参加了战斗。8月19日，苏联红军击溃了日军的主力——关东军。

1945年9月2日，由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由于苏联的参加对日作战，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日本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斯大林在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在告人民书中说：“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胜利了。”^①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从战争爆发直到战争胜利，斯大林都是苏联军队和人民当之无愧的统帅。他制定了整个战争过程每一阶段的战略计划，指挥了重大的战役行动，组织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训练和提拔了大批指挥员和战斗员，这一切保证了战争取得胜利。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肆意歪曲历史，硬说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拒绝领导”“按地球仪指挥战斗”。他们在恶毒攻击斯大林的同时，却无耻吹捧自己，把在当时还只有中将军衔和少将军衔的政治工作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说成是卫国战争的“组织者”“鼓舞者”，多次作出比统帅部“更加合理的决定”，是“斯大林格勒的灵魂”等等。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可以任人雕琢的大理石，想歪曲它抹杀它都是办不到的。斯大林作为一个历史上人民群众的领袖，他是当时苏联人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代表群众，领导群众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苏修叛徒集团在斯大林在世时，把斯大林称作“天才的统帅”，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企图贬低斯大林，往自己脸上贴金，是绝不会得逞的。古往今

^① 斯大林：《告人民书》，《斯大林文选》（下）第439页。

来，凡是想歪曲历史的人，无不被历史作出公正的判决，而苏修叛徒集团也逃不脱遗臭万年的下场。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苏联人民在消灭法西斯的斗争中肩负了抗击法西斯的主要重担。苏联人民在同敌人的顽强斗争中，保卫了苏维埃祖国，捍卫了社会主义成果，考验和锻炼了自己。斯大林说：“战争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是一个考验和检查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①。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它表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东欧和亚洲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之久，先后共有40多个国家、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战。极端反动，极端残忍的法西斯强盗发动了这场战争，企图奴役全世界人民，但是战争的结局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②“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文选》（下）第443页。

② 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45页。

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表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宁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②这一点已经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所证明，因此，革命的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必须对此有清醒的估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百倍加强战备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能制止的，革命人民并不是只能消极坐待战争的爆发，只要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团结起来，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就可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③弱国、小国的人民只要敢于斗争，敢于拿起武器，开展人民战争，建立起国内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④战争的胜负，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武器装备

① 毛主席：《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1105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8卷，第182页。

③ 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声明）。

④ 毛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红旗》1960年第10期。

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时，几乎动用了整个欧洲的人力和物力，在军事装备上师团数量上均大大超过了苏联，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最终还是逃不脱复灭的下场。因此，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还要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也是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主要的历史经验。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的另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于大战的胜利，欧亚一系列国家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发展壮大，战前，世界上只有43个共产党，党员420万人，到了1945年共产党已发展到76个，党员2,000万。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党员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锻炼和考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一步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战后，亚、非、拉美地区人民，普遍掀起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德、意、日法西斯被击败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实力愈益下降，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成为世界反动中心，但是，它更加腐朽了。

毛主席指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①

① 毛主席：《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1250页。

